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西藏問題研究視野下的中國認識：

以印度與澳大利亞學界為比較對象

Civilizational China vs. Local China --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Tibetan Studies in India and
Australia**

吳宗翰

Wu Tsung Han

指導教授：石之瑜博士

Advisor: Chih-yu Shih, Ph.D.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October, 2010

目錄

口試委員審定書	I
謝辭	III
中文摘要	V
Abstract	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背景	4
一、西藏問題背景暨各方觀點	4
二、印度中國研究發展與印藏關係	8
三、澳大利亞中國研究發展與澳藏關係	10
第三節 問題意識	12
第四節 文獻檢閱	15
第五節 研究架構	17
一、研究方法	17
二、章節安排	19
三、資料選取與研究限制	22
第二章 西藏問題發展與印度和澳大利亞的對藏政策	23
第一節 前言	23
第二節 西藏問題形成的背景	24
一、兩套對立的歷史觀	24
二、主權觀念影響下的西藏領土觀	28
第三節 西藏問題國際化	32
一、達賴喇嘛流亡印度	32
二、分裂的西藏與中藏爭論的擴大	33
三、來自聯合國、美國與歐盟的關注	37
第四節 印度與澳大利亞的對藏政策	39
一、印度政府與西藏的來往：保護但不承認	39
二、澳洲政府與西藏的來往：在「一中原則」下對西藏人權 展開的關懷	43
第五節 小結	46

第三章 印度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及其視野下的中國觀	49
第一節 前言.....	49
第二節 印度西藏問題研究社群內部的組成	50
一、研究概況介紹.....	50
二、研究平台介紹.....	52
第三節 印度的西藏問題敘事.....	56
一、議題研究領域與方法論多元化.....	56
二、西藏問題研究論述特色.....	57
第四節 印度西藏問題研究視野下的中國認識	63
一、體系視野：國際政治結構下的中國	64
二、文明視野：文明政治下的中國.....	66
三、行動視野：政治互動下的中國.....	67
第五節 小結.....	70
第四章 澳大利亞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及其視野下的中國觀	73
第一節 前言.....	73
第二節 澳大利亞西藏問題研究社群內部的組成	74
一、研究概況介紹.....	74
二、學界人物介紹.....	77
第三節 澳大利亞西藏問題敘事.....	82
一、議題研究領域與方法論多類同.....	82
二、西藏問題研究論述特色.....	82
第四節 澳大利亞西藏問題視野下的中國觀	88
一、國協視野：多元主體構成下的中國	89
二、文明視野：國家體制與多元體互動下的中國	90
三、行動視野：從澳洲立場審慎看待下的中國	92
第五節 小結.....	93
第五章 綜合分析與比較：印度與澳大利亞學界的差異	95
第一節 前言.....	95
第二節 印度與澳大利亞西藏問題研究之比較	96
一、研究發展狀況的差異性.....	97
二、對西藏問題研究學科領域與方法論之辨識度有別	100
三、對西藏問題論述明顯不同.....	100
四、中國認識內涵大異其趣.....	102
第三節 印度西藏問題研究與中國研究之比較	103

一、印度中國研究發展概說.....	103
二、印度西藏問題研究與印度中國研究之關係	107
第四節 澳洲西藏問題研究與中國研究之比較	108
一、澳洲中國研究發展概說.....	107
二、澳洲西藏問題研究與澳洲中國研究之關係	107
第五節 小結.....	113
第六章 結論與展望：從西藏觀察中國（ See China through Tibet ）VS. 在西藏發現中國（ See China in Tibet ）	115
參考文獻	121
壹、中文部分	121
貳、西文部分	124
參、其他	129
附錄一 西藏流亡政府宣傳部長杜敦桑培（ Thubten Samphel ）訪談稿	133
附錄二 西藏流亡政府前安全部長久美倫珠（ Jigme Lhundup ）仁波切 訪談稿.....	137
附錄三 西藏流亡政府前宣傳部長久欽·圖登南嘉（ Thubten Namgyal ） 訪談稿.....	139
附錄四 澳大利亞政府在西藏問題上的位置以及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 係	143
附錄五 澳大利亞藏人社群的發展.....	145
附錄六 澳大利亞國會中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案	146
附錄七-1 對西藏的全政黨議會團體（ 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Tibet ）介紹	151
附錄七-2 西藏友好團體（ Tibet Friendship Group ）介紹.....	152
附錄七-3 澳洲西藏會議（ Australia Tibet Council ）介紹	153

表圖目次

圖一 研究架構簡圖	21
表一 印度學界與澳大利亞學界西藏問題研究之比較.....	96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西藏問題研究視野下的中國認識：
以印度與澳大利亞學界為比較對象
The Approach to Tibet Tell about China?
—Comparing Views from India and Australia

本論文係吳宗翰君（學號：R97322028）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99 年 10 月 1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石之瑜

（簽名）

（指導教授）

蘇嘉宏

林彤真

誌謝

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琢磨，論文終於完成，但心情卻有些五味雜陳。一方面喜悅自己在學術領域終於有些小小成果，另一方面則是有感於人類知識體系之浩瀚，而不禁反省到自己還有如此多有待加強的空間。從論文题目的選取、資料蒐集、到寫作期間的點點滴滴，真的很感謝師長們的鼓勵、朋友的支持、還有家人的陪伴，你們是提供給我源源不絕的動力來源。在此首先要感謝我的父母與所有的家人，因為有你們無怨尤在各方面的付出，我才能夠這麼安穩無負擔的念書與學習，希望這一份論文能夠回饋你們所給我的千萬分之一，並祝你們身體永遠健康。

其次要感謝的，乃是恩師石之瑜教授。如果不是石老師的引領入門，竭力提供資源，以及毫不厭煩的一次次地閱讀批改學生的論文，與學生共同討論其中的點滴，這份研究決不會如此順利就完成。老師在言教與身教各方面都影響我甚深，總是帶給我在課業或是人生態度上的諸多啟發，真的很謝謝老師！

論文過程中也感謝許多師長們給予的協助。蘇嘉宏與林照真兩位口試委員提供我關於這份論文在觀點上還有寫作上的許多建議，幫助我改善可能的不足之處，使論文在許多環節能更上層樓。在印度期間，就論文觀點多次於公開場合或是私底下閒聊詢問學者 Reena Marwah、Sharad Soni、Sangeeta Thapliyal、Deepak 老師等，他們熱忱的回應使我更能實際體會印度學者的觀點。澳洲學者 Colin Mackerras 在來台以及在印度相處的期間，每次就論文方面的問題請教也都獲得他極熱忱的回應。其他還有與 Simon Bradshaw、John Powers、Gabriel Lafitte 等學者多次以 e-mail 來往通信，也都幫助了我更能從澳洲學者的眼光來看待西藏問題。張登及老師與邵軒磊老師多次對我的論文進展表達關心，也給予了我許多寫作上的建議與幫助。另外在大學與碩士期間分別在台政大所修習過的許多老師的課程，包括孫善豪老師、江宜樺老師、吳叡人老師、陳思賢老師與黃長玲老師等，也都在課堂的修習過程中，無形地不一地影響形塑了我看待與解讀文獻的思想成長。

同儕的支持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非常感謝圭之學姊在行政業務上提供的協助，每次見面聊天總是歡樂無比。亮宇學長、姿潔學姊、禾田學長、含吉學長、絃麟學長、光頭學長、彥中學長、有形、厂川、妞妞、摩奇、佩鈞、子熠、厚穎、大雕、魏伯、依藤、政論組兼同門的容禎、政論組的同學羽球王子鏹鎰、智偉、元鴻、小蝦、靜儀、念群、卡拉、帛燦、瑞齡、青逸、宜芳、還有羽球團的大家、過去 110 研究室的學長姐以及其他石門團隊的同儕與學長姐學弟妹等；大學的好友與學長姐弟妹們，郁迢學長、盈瑞學長、小萬學姊、天寒與 Max 團的大家蒂蒂、俊甫、B 哥、愷興、小智、丁丁、亭文、酸酸等、劭昀、日翀、書豪、宗凡、士捷、昇洲、漢偉等室友、麒如、歆淳、小管、大仙、一三、蓓菁、奕聰、怡伶、世昀、思慧、世豪、大頭、孟翰等；高國中小的好友若伶、婉婷、石方、力行、小明、信評、宗伯、國欽、愿呈、宗碩、致佑、嫩宏、小白、愷哲、秉文、還有

好多朋友等等。謝謝你們所有人在論文撰寫期間給予的祝福與陪伴。

還要感謝室友翌綺總是主動熱心地為我的論文找尋資料，鄰居 Stefani Pfeiffer 指導我英文、也感謝小蓉、西藏青年議會台灣分會主席 Tashi Tsering、父親友人林金松師兄、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Dawa Tsering、Sonam Dorjee、此時在印度達蘭薩拉的 Sopa、羅桑、Dawa、桑杰嘉、Tenzin Namgyal、Jiumei Nyima、單增葛登仁波切、堪布丹傑以及中華民國駐印度代表處的方天賜老師與其他長官等，讓我在印度田調的時候能夠如此一帆風順；也感謝澳洲達賴喇嘛辦公室代表處的達珍小姐提供給我許多澳洲當地狀況的詳盡資料。也要感謝法王達賴喇嘛與大寶法王噶瑪巴鄔金欽列多傑在會面時給予本論文祝福。

其他還有在本研究期間提供不一協助的人們，都在此一併感謝。

最後，謝謝盈聰，妳容忍我許多個性上的缺點以及電腦文書能力上的弱勢，總是用甜美的笑容與溫柔伴我度過碩士生涯與撰寫論文時曾遭遇的困境。雖然未來的人生路途還很長遠，但在當下有彼此的陪伴，是一件幸福的事，讓我們一同繼續努力與珍惜！



宗翰

2010/10/07 於公館

中文摘要

本文旨探討對西藏的研究當中透露關於中國的認識，並選取印度與澳大利亞作為考察對象。本研究以文本分析法、比較文獻法、歷史分析法與訪談法完成，處理之問題意識有三項：一、從印度以及澳大利亞兩國的英語文獻中整理歸納關於西藏問題研究的狀況，以及其中國認識；二、比較這兩個時空條件互異下的雙方視野，並推測其中原因；三、將印澳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與其各自的中國研究對照，釐清其西藏問題研究與中國研究的關係。

經由對各面向的綜合考察，本研究認為受到在地理上與中藏距離的差異，以及本國歷史的發展經驗與和中藏來往經驗等共同影響，印度在論述上視西藏幾具有等同於印中地位的國家主體性，而澳洲則視西藏為中國內部具備地方主體性的特質。文獻當中透露出存在於印、澳兩地認識中國的角度各有三種：印度分別是體系視野、文明視野與行動視野；澳洲則分別為國協視野、文明視野與行動視野。

整體言之，本研究認為印度學界與澳大利亞學界的情形所帶給中國研究的啓示是：印度早已在歷史的經驗中形成對中國的認知，其對西藏的研究使其得以透過西藏觀察中國（See China through Tibet）；而澳洲則視中國為一個具多元主體構成的國家，其是在西藏研究當中發現中國（See China in Tibet）。

關鍵字：西藏、西藏研究、西藏問題、中國觀、印度中國學、澳洲中國學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aims to research the ‘image of China’ from Indian and Australian studies viz-á-viz the Tibet issue. This dissertation is based on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nd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subjects: firstly, analysing the Tibet issue research and ‘image of China’ in Indian and Australian literatures; secondly, comparing and explain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thirdl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a Studies and Tibet Issue Studies of the two countries. Overall, we can panoramically examine how India and Australia consider Tibet and China.

What the author found was that Indian academia perceives Tibet as an individual subject like China and India, whereas Australian academia regards Tibet as a local subject in China. Furthermore, there are three ‘images of China’ from Indian scholars: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civilizational politics, and of interrelational context. There are also ‘three images of China’ from Australian scholars: regarding China as a commonwealth, exami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state and ethnicities, and focusing on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reasons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geological distance from Tibet and China, bilateral contacts with them in history and self-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India and Australia.

All in all, the inspirations can be brought to the Sinology from Indian and Australian on Tibet issue studies. India mainly held as ‘See China through Tibet’ as she forms the perception toward China by its history experience. Australia regards China as a state of multiple entities and she ‘Sees China in Tibet’.

Keyword: Tibet, Tibetan Study, Tibet Issue, image of China, Indian Sinology, Australian Sinology.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本研究一改中西學界習慣從中國看西藏的視野，嘗試透過西藏研究，反向梳理出有關中國的認識。近代中國與西藏之間交錯糾葛而從中衍生的「西藏問題」，複雜地令人難以用簡短的字句闡述之。議題不但延燒國際場域，而且更隨著「意識形態」以及「如何因應中國崛起」等思維而產生了兩種完全對立的觀點(Norbu, 2001: 1)。北京主張所有對此的討論都要站在這是中國內政的立場，而在西藏流亡政府(Tibet Government In Exile, TGIE)方面，即便達賴喇嘛已經多次強調西藏的未來可以在「中國」的框架下討論，也始終認為問題的起源屬於國際範疇。自 2002 年以來的幾輪中藏談判，雙方對於該問題的解決始終沒有達成任何共識。對於研究者而言，要探討這個問題，無法不先對「西藏」史與「中國」史建立自己的看法，而且還不能迴避「中國應是什麼」、「西藏應是什麼」、「雙方關係應為何」等問題，而這些問題都具有高度政治性。

西藏流亡政府迄今未獲任何國家正式的承認，但其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卻屬世界級的宗教領袖，而極受到敬重。他出訪各國時總是引起當地以及國際媒體的注意，也均受到元首級的接待，並經常有機會會面國家元首等重要人物。而且，1989 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無疑顯見國際社會對他頗為支持，且西藏問題總是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然而，隨著「中國崛起」，中國在國際上整體政經實力的逐漸強大，各國政府在該議題的發言與立場也逐漸趨於保守謹慎，甚至是被視為最早引發西藏地位爭議的英國也在 2008 年透露出不尋常的妥協訊息。¹這些隨著中

¹ 關於英國與西藏問題的關係，可見本章第二節。英國政府長期以來主張中國對西藏具有宗主權(suzerainty)而非主權的地位，然而在 2008 年英國外相米勒班(David Miliband)的「國會聲明」中宣示「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讓人感到英國的西藏政策已有轉變。見(Written Ministerial Statement on Tibet, 29102008)英國外國與國協事務，網址：

國崛起印象而發生的調整，說明「西藏問題」同時是「中國問題」，故每當探討到西藏時必然無可避免的會探討到中國，而進一步透露出「中國」是什麼。簡言之，西藏認識的文本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對中國的認識。

近五十年來，在西藏學、中亞學、中國學等領域都有人對當代西藏問題不斷進行研究。他們彼此切入點不同，但正好提供後來者可以互相參考的多種角度。其中涉及中國研究面向的探討迄今缺乏有系統的整理比對，亦即各種對西藏問題的看法分別影射了或預設了關於中國是什麼的假設。由於「西藏問題」可以說是當代中國在國際上最受矚目，也是讓中共在道德層次、人權議題中備受困擾的主要課題之一，因此以其作為切入點相當適合。

從台灣學界的文獻來看，以往對此議題的探討焦點大都著重在中共研究的一環，或是從台北官方立場探討中藏關係（或漢藏關係）的發展。專題討論者或多專注在藏人抗暴的部份，²而少有對其他國家觀點的介紹，若有也多集中於英美大國的態度。³這樣的研究觀點受限於台灣或冷戰以降美英對中國大陸的認識角度，連帶使得對西藏研究有關文獻的視野也受到侷限。本文試圖跳脫以冷戰格局或內戰為基礎的在地框架，而以探究其他國家對西藏問題的看法及其所反映的中國認識。

本文以澳大利亞與印度的西藏問題研究作為對話的對象。為何選取這二者，以及這樣比較的意義與基礎為何，可分為以下幾點說明：

一、回溯西藏問題的緣起，學界多以大英帝國於 19 世紀末以來與西藏的接觸為起點。而印度與澳大利亞兩者過去俱為大英帝國殖民地，在許多方面深受影響。直至今日，雙方不但同採用西敏寺模式的民主政治，同是大英國協的一員，其國內主要通用語言以及學術界文獻的主要語言也仍是以英語為主，且均不視自己為

<http://www.fco.gov.uk/en/news/latest-news/?view=PressS&id=8299838>，檢索日期 2009/10/15。

² 有多探討藏人文化、社會與宗教者，如張駿逸、林純瑜等。也有著墨於西藏歷史或流亡政府方面者，如楊嘉銘、蘇嘉宏、林照真等。也有較從兩岸政治面向或國際面向作切入者，如楊開煌等。

³ 謝劍曾以「中國」、「西方」兩種觀點探討雙方在西藏問題認識上的衝突。見謝劍，1999，《自決抑整合：中、西對西藏問題觀念的衝突》，台北：蒙藏委員會。而張駿逸則曾專文分析美國政府在西藏問題上的角色。見張駿逸，1990，《美國在西藏問題上的角色分析》，台北：蒙藏委員會。

西方主流國家。他們是否各自發展出外於殖民母國的能動性，這是雙方可作為比較的第一個基礎。

二、印度與澳大利亞兩者都有接納西藏難民，但接納的論述有所不同。印度以文化歷史相近、接納客人為名義，不但收容了十餘萬的藏人，⁴更默許了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而澳大利亞則是以西方主流論述的人權為名，目前約有千餘名藏人定居澳洲。⁵

三、從移民數量與在地化情形來看，在印度並無明顯在地社會生根的華人社群，而多屬商人與留學生。1962年中印戰爭後華人更形同被隱藏的一群人（潘美玲，2009：103-106）。但藏人不但數量多，在印度各地也有眾多的藏人社區，雖然法律上有所限制其權利，不過基本上都無礙於在印度社會求學與生活；另一方面，澳大利亞在民間已有明顯的華人社群，而且皆有一定的社會水平，學界中也有華裔學者，他們在經貿、政治上有一定影響力。相較之下藏人人數較少也較無影響力。

四、印度儘管收容大量的藏人難民，又曾與中國發生過戰爭，視中國為其安全上的威脅，但長期以來相對謹慎，很少發表關於對中國治藏政策的看法，國會也很少有關於西藏的決議。即使在2008年「314拉薩事件」發生時官方也是呼籲雙方應和平理性，並反對所有的「暴力」，包括藏人與中共。另一方面，澳大利亞在經貿關係上與中國往來密切，社會上又存在不少的華人社群，但國會卻多次通過決議譴責中共在西藏的作為。至少在90年到96年之間，澳洲就分別於1990、1991、1994、1995、1996通過八項這類決議。⁶「314事件」發生後，澳洲政府也立刻在隔天就發表譴責中共的武力鎮壓。

五、從中國研究發展來看，印、澳有各自的脈絡，而且脈絡也影響了對西藏的看

⁴ 據2008年西藏流亡政府發佈的統計，目前在印度的藏人約有101242人。見外交與新聞部，2008，《西藏流亡政府簡介》，印度：達蘭薩拉。

⁵ 根據西藏流亡政府澳洲代表處提供的資訊，至2010年止在澳大利亞的藏人約有1000人。資料來源見本文附錄六。

⁶ 可見西藏之頁，網址：<http://www.xizang-zhiye.org/b5/world/guoji/tdguoji01.html>，檢索日期2009/10/30。

法。印度近代的中國研究由泰戈爾一脈開啓，視中國爲曾深受印度影響，如今共同遭帝國主義侵犯的悠久文明。印度獨立建國後，到 1962 年與中國發生戰爭，甚至當前的印中關係發展，都與印度的西藏認識相關。相形之下，澳大利亞從原本自居亞洲之外排華，到後來追求全球性而力圖加入亞洲，對中國從視爲異端，到深入中國基層找尋在西方價值下所重視的在地主體性，西藏則成爲其中的一個案例。⁷

透過比較分析這兩個自居邊緣的亞洲英語社群，本文將整理分析他們對西藏研究的觀點如何反映對中國的認識。

第二節 研究背景

一、西藏問題背景暨各方觀點介紹

西藏問題的文獻往往從歷史背景討論西藏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然而，中藏雙方的說法顯然差異甚大。⁸中國觀點的主張是，傳統的中藏關係是臣屬關係，當代中國既然繼承了過去王朝時期的固有領土，因此中國的主權當然及於西藏。然而站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觀點，卻主張西藏長期以來自成一個國家，中國主權並不及於西藏。傳統西藏與中國王朝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私人的、宗教的、本質上模糊的，而並非現代主權國家的模式。西藏觀點從宗教定位中藏的歷史關係，認爲雙

⁷ 關於國內目前探討澳洲中國學發展爲研究的文獻，可參閱陳姿潔，2009，《南方的中國學？從費約翰到澳洲特色的中國學研究》，台北：台灣大學政治所碩士論文。曾彥中，2009，《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以安戈及何包鋼的學思歷程爲例》，台北：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黃有彤，2010，《在整體中發掘個體：馬克林與他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台北：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⁸ 有許多關注中藏對話的文獻都發現到中藏觀點的差異，可參閱王宗安，2008，〈達賴喇嘛與中共談判之癥結分析〉，《中國大陸研究》，Vol.51(1)，頁 103-117。謝劍，1999，《自決抑整合：中、西對西藏問題觀念的衝突》，台北：蒙藏委員會。Dibyesh Anand. 2004. *Geopolitical Exotica: 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65-69.

方是一種屬於佛家與儒家混合的「供施」(Choe-Yon)關係與進貢關係，達賴喇嘛在精神上對世俗的滿清皇帝有影響力，而滿清則供養喇嘛，因此西藏雖然是滿清的一個進貢國，但實質上滿清也形同對達賴進貢 (Anand, 2004: 78-79)。

從西藏的近代史來看的話，一般多認為近代西藏對外開放的關鍵點在西方的出現 (王力雄, 2009: 64)，而這個西方指的就是在當時已經殖民整個印度次大陸的 (英屬印度 British India) 的大英帝國。自十九世紀中後期開始，英國就不斷派遣探險隊試圖與拉薩直接接觸，過程中間引發了一連串的衝突，最後由清王朝出面，與英帝國簽署貿易協定，並同意其能以貿易名義直接派遣官方人員直接進入西藏 (Goldstein, 1999: 22-23)。之後，英國在這段與西藏直接接觸的時期，逐漸的把「主權」的觀念「移植」給了西藏 (蘇嘉宏, 2005: 70)。

西方的主權概念介入，導致了清朝對於邊疆地區的治理與對西藏的政策轉向積極，而這又反而進一步導致北京的清王朝與拉薩之間發生衝突，使得達賴喇嘛政府欲擺脫中國 (王力雄, 2009: 85)。在辛亥革命之際，十三世達賴喇嘛傳文全藏驅逐漢人。此後直到中共出兵之際，中間從 1912 (3) -1950 年期間的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均未能實質控制拉薩政府管轄的地區 (蘇嘉宏, 2005: 70-75)。而西藏也在這段期間持續地與英國接觸，並在 1913 年參加中英藏西姆拉會議，其後也與蒙古國簽約往來。1947 年西藏甚至派出商務代表團並獲得簽證而得以拜訪印度、英國、美國、法國等，⁹也參加了同年於印度德里舉行的亞洲國家會議，有人因此或謂在這段時期的西藏事實上 (de facto) 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60: xii; Smith, 1996: 263; Norbu, 2001: 84)。

1951 年，解放軍出兵入藏，西藏地區完全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但是

⁹1913 年中藏英三方代表於印度召開西姆拉會議(The Simla Record)，就西藏的政治地位以及劃定漢藏邊界作出決議；並就印藏邊界劃定「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此會議規範了英藏之間的交往，然而中國政府並未接受決議，也否定了代表的簽字。見 M.Goldstein 著，杜永彬譯，2005，《喇嘛王國的覆滅》，北京：中國藏學，頁 26-43。而在會議期間，西藏政府也在英國默許下從英屬印度購買彈藥武器等。同年，也與蒙古簽訂《蒙藏條約》並向其購買武器。西藏政府不斷試圖開拓國際空間，終於在 1947 年派出訪問團出訪各國。見 M.C.Praag 著，達瓦才仁譯，2008，《西藏的地位》，台北：達賴喇嘛宗教文化基金會，頁 111-133、152-153。

雙方也很快地因為作為與理念上的差異而爆發衝突。在 1959 年 3 月的拉薩動亂後，達賴喇嘛與其追隨者流亡到了印度，隨後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並且控訴中國共產黨的暴行與毀壞藏人文化。而中國政府也在達賴喇嘛流亡後立刻宣布全面推動土地改革，並於 1965 年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區」，同時確立與其周圍省分的行政疆界。之後的數十年間，雙方關係雖然幾次看似改善，但整體來說仍是零和的局面，而且還因為長期的相互醜化而使得有效的溝通無法展開。並且，這個情形隨著國際大國紛紛開始關注西藏後情勢更為複雜。後冷戰時期西方社會對宗教、文化的多元性與未開發地帶的憧憬，有助於提升達賴喇嘛的道德聲望，另一方面，中國專制壓迫西藏人權的形象與在西藏進行大規模的現代化工程，以及其在國際上日益成長的政經角色，更導致了西藏問題的中外對立，而儼然成為「中」「西」的對抗。

整體言之，當論者在探討「西藏問題」時，由於自身所處的時空脈絡、對中藏態度認知的差異，以及論者的自我認知與決斷，往往帶來對問題不同的討論方式。一般說來，文獻中大致有以下幾種不同的切入點：

一、帝國主義侵略的遺留：持中國立場者多屬此類觀點。其主要從維護國家主權的觀點出發，主張中國是多民族國家，認為在西方帝國主義介入中國之前，西藏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問題的產生源自於帝國主義意圖分裂中國領土而未成功的遺緒。¹⁰

二、現代化的悲劇：例如王力雄《天葬》就屬於此種觀點。此主張大致上同意當代西藏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但認為傳統的中藏關係並不能武斷套用主權概念。《天葬》一書承認中藏各自具有王朝與王國歷史，其雙方的互動關係乃是一種傳統上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體系」與「朝貢體系」。由於西方的侵略，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對勢力範圍內各地採取積極作為並同時轉型成為現代的民族國家，進而刺

¹⁰ 例如，王家偉等，2000，《中國西藏的歷史地位》，北京市：五洲傳播。伍昆明編，2006，《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廈門市：鷺江。張永攀，2007，《英帝國與中國西藏(1937-194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張雲，2008，《西藏歷史問題研究》，北京：中國藏學。解放西藏史編委會，2008，《解放西藏史》，北京：中共黨史。謝彬等，2009，《西藏問題》，鄭州市：大象。

激影響西藏原有的社會體系並反抗中國。此種觀點對中藏雙方多採取同情與理解的態度。

三、後殖民觀點：可以 Anand 的討論為代表。此種觀點同意不應該用現代主權觀念理解傳統的中藏關係，也同意是因為西方的介入而導致了中國的轉型，但更加以延伸探討這些要素如何刺激影響西藏的轉變。換言之，此種觀點採取後殖民的角度，主張中藏皆因為面對一個巨大的「他者」而試圖凝聚建構「自我」的主體性。中國以西方為他者，而西藏則以西方與中國為他者。凝聚的過程伴隨著論述不斷的互動與再造。

四、人權：這類的討論基本上較不太碰觸主權問題，而多以現狀事實為出發點，關懷的對象是中國在解放軍入藏後破壞藏人的語言、宗教、文化、人權，包括強迫同化與種族滅絕，乃至於環境維護等種種議題。此種切入的角度主要將焦點放在質疑中國的作為，並認為中國應正視並改善這種情況。¹¹

五、領土控制的問題：可以 Goldstein 為此種觀點的代表。他認為，西藏問題的核心就是在「誰統治、誰居住以及誰決定這塊土地的歸屬」，因而衍生種種爭端並各自建構論述。因此，即使今天西藏地區並不存在著迫害人權的事實，西藏問題也仍然會存在，達賴喇嘛與中共之間也仍然會繼續對立。影響所及，雙方甚至把歷史書寫作為鬥爭場域，包括對雙方關係的描寫，以及大西藏的存在與否等（Goldstein, 1999 : x-xii）。

精確地來說，近代之前的「西藏—中國」關係確實不是在現代國際法的框架中安排的，蓋傳統亞洲的國際體系並不同於現今國際體系。然而，情況之複雜卻又在於中藏雙方都圍繞著「主權」概念打轉（Anand, 2004 : 65 ; 王力雄, 2009 : 117）。當下主流的國際體系就是「主權國家體系」，而現實世界又參雜了經濟、安全、戰略、政治與人權等議題，以及各自對中藏史的認識差異，和對現代主權國家概念的理解等因素，這些都造成對「西藏問題」的認識複雜而分歧。

¹¹ 例如，Pierre-Antoine Donnet, translated by Tica Broch. 1994. *Tibet : Survival in Question*. London : Zed Books Ltd. 蒙藏委員會於 2008 年出版的研討會論文也有多篇屬此類觀點，可參閱蒙藏委員會藏事處編，2008《西藏人權問題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蒙藏委員會。

二、印度中國研究發展與印藏關係

印度與中國雖然有長久來往的歷史，然而如果要論到雙方近代交流的起源，則不可不談泰戈爾的中國行，該次訪問不但轟動中國知識界，也開啓了近代印度中國研究的淵源。1918年，加爾各答首先成立了中國語言與文學的課程。1921年，泰戈爾成立國際大學，並從法國聘請研究中國佛學的專家前往印度。當他1924年訪問中國後更是結識了一批中國學者，而於30年代逐步成立了印中學會、印度中國學院等。這些都在語言、佛教、藝術以及中印歷史等研究領域都打下了良好的發展基礎（郁龍余，2000：120-123）。

1947年印度獨立後，開國總理尼赫魯認為印度要以成爲大國爲目標而要有大國精神。他主張，印度命中注定要成爲世界第三或第四大的國家，印度不應該跟巴基斯坦來比較，而是應該跟蘇聯、美國、中國那樣的國家來比較。印度本身就代表一種文明，而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光就這一點對世界的貢獻就值得世界各國對它予以尊重（亢升，2009：154-156）。尼赫魯對中國相當友好，儘管當時已有人提出中國威脅論，卻不爲尼赫魯接受；1951年¹²、1956年¹³當時達賴試圖向尼赫魯求援也得不到回應。他的政策使印中關係維持了一段友好的時期，也影響到學術方面印度中國研究的發展。1948年印度國際學院東亞分部成立，1958年德里大學的佛教研究系也開始中國研究的計畫（Tankha 著、張燕暉譯，2007：75）。然而，尼赫魯的中國政策以及與中國研究相關的這些學術交流最終還是因爲「西藏問題」衍生的邊界爭議，在1962年雙方爆發了一場邊境戰爭後近乎中止。

¹² Rajesh S.Kharat 探討印度不願援助西藏的原因，除了不結盟政策，不願被視爲介入冷戰，最主要的是尼赫魯對中的傾斜立場。見2003.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New Delhi: Kaveri.p.49.

¹³ 達賴喇嘛曾利用訪問印度機會向尼赫魯求援，尼赫魯卻主張達賴應該回去中國。見達賴喇嘛著，唐鼎譯，1990，《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台北：聯經，頁139-146。

這是一個極大的關鍵點。自此之後，中國成爲印度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並被設想爲印度國家發展上的假想敵，在份量上完全堪比美國與俄羅斯（蘇聯），在研究議程上也多充斥著以外交、政治、安全等爲主的課題，兩國此時的關係在政治上陷入膠著，學術交流上被嚴格限制。而隨著 80 年代後兩國外交關係的改善，特別是在印、中分別於經濟方面的改革後，雙方開始加強在經貿關係上來往與合作，在各方面也逐漸恢復交流，而有對於國家發展與貿易的研究，但早期對於中國思想，文學、佛教等研究仍然持續著。1991 年，「中國學研究所」成立，並結合了從過去 50 年代以來研究中國的學者群而形成了一個非正式的討論群體，該群體長年透過《中國述評》（China Report）發揮作用。目前，許多研究機構都會另外設置關於研究中國的部門（Tankha 著、張燕暉譯，2007：78）。

因此，從印度的中國研究發展可以找出至少三條脈絡，一條是源自於泰戈爾所奠基的精神文明的路線，關懷的是中國與印度可以相互比較的特色，以及關懷中國與西方的普遍發展模式如何不同，多關乎文史哲宗教方面。一條則可溯源於甘地反殖民的民族主義傳統，邊界戰爭後並形成以中國的國防與實力及可能對印度造成的影響爲課題。這兩條認識途徑各自孕育出「親中」、「反中」兩種傾向（石之瑜等，2009：123）。第三條路線則與印度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研究有關，雖然屬新興的研究，但也逐漸卓有成果。

而從印度以及直接接壤的西藏地區的關係來看，雙方兩地人民的交往也是源遠流長。佛教自印度傳至西藏而發展爲「西藏佛教」，藏文也是以梵文爲基底而創造，雙方因此在文化上的聯結淵源頗深。而且因爲這個淵源，印度在看待藏人時不但不會感到隔閡與陌生，達蘭薩拉一地更常有不少印度人前往朝聖。從政治事務來看，印度也是長期關注西藏的事務。1959 年達賴喇嘛出走中國後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並在印度政府的協助下將行政辦事處遷往喜馬偕爾邦達蘭薩拉（Dharmśāla）一地。五十年來印度已經收留了眾多藏人，目前統計的在印藏人人數已至少十餘萬人。印度政府雖有法令限制卻也容許藏人保持文化獨特性以及紮根印度，流亡藏人對此相當感激，並每年舉辦「謝謝你！印度」節（Thank You

India) 感謝印度的援助。

在地緣政治與宗教文化歷史上的中印藏三方來往，以及爲了區域和平與經濟發展的國家方向中，究竟印度的學術界人士眼中的「西藏問題」有何面貌，與中國研究的關係爲何，「親中」、「反中」的傾向以及在地化的印度籍藏人學者有無產生影響，不同時期的文獻有無不同觀點，而這些與印度的經驗又要如何聯繫起來？這一系列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三、澳大利亞中國研究發展與澳藏關係

澳洲的中國研究發展與澳中關係相關，整體來看，澳洲的中國研究主要由傳統漢學演變成更全面的社會科學領域，而澳中關係也從初期的零星貿易往來逐漸擴大到全面性的交流。依據胡再德（2005）的研究，澳洲的中國研究可以劃分成從 1918 年雪梨大學設立東方研究開始，1918-1949 爲「傳統漢學」時期，1950-1960 「初步確立」時期，1970-1980 「繁榮」期，以及 1990 之後至今的「持續發展」等四個時期。他並以「『借鑒』國外中國研究的發展」、「『引進』國外中國研究的人才」、「培養『本土化』帶有澳洲特色的中國研究」加以描述。

二戰以前，澳洲的外交政策往往習慣於與英國取得一致，並視自己爲西方的一份子。對於亞洲的態度，甚至是中國的態度，基於種族文化觀的黃禍論、地緣政治的理解，以及懼怕亞洲移民的心理等三種原因，是既輕蔑卻又感到威脅。它主要以貿易的考量爲主，既視亞洲爲一個具有潛在力的市場，但又隨時注意國際動態的發展（張秋生，1999：6-17）。當 1918 年雪梨大學東方語文學系成立時，儘管當時主要針對日本，但已經開始了第一個大學中文計畫，而且是沿襲自牛津與劍橋大學的漢學發展模式（胡珀著，詹烟譯，2001：83）。

二戰之後，冷戰格局形成，澳洲雖然在外交路線上轉而追隨美國，以防堵共產勢力爲主，但澳中之間仍有來往。50 年代後澳中的經貿易量逐漸增加，澳洲

的中國研究也持續發展。1953年澳洲國立大學成立遠東歷史學系，以長年居留中國的費子智（C. P. Fitzgerald）教授為系主任，而奠定了澳洲國立大學的中國研究基礎。費教授退休之後，王賡武教授進一步承繼發展之（何漢威，1983：185），並在1970年創辦《東亞歷史》。同年澳大也成立了「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該中心以49年後的中國為主要研究對象，並創辦《澳洲中國事務期刊》（The Australia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5年改名《中國雜誌》，The China Journal）而享譽中國研究領域（劉寬，2006：359）。雪梨大學也在1961年創辦《澳大利亞東方學會雜誌》，其中中國研究佔有相當比例（胡珀著，詹烟譯，2001：84）。

70年代後，隨著亞洲經濟的快速成長與澳中正式建交，雙方的經貿更是日趨密切，持續至今。白澳政策廢除後，澳洲逐漸轉型成一個開放多元的亞太國家，整個國家在90年代後的趨勢更是如此，1988年澳洲政府在白人赴澳兩百年紀念會上的聲明¹⁴以及1999年霍華德政府所舉辦的公投中的《憲法宣言》，¹⁵也都彰顯出類似的精神。這一時期的中國研究逐漸開創出具有澳洲特色的中國學。例如1998年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與雪梨理工大學合辦的「中國省份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Provincial China，UNSW-UTS）就試圖發展以「省」為單位的中國研究以及建立直接與中國各省接觸的管道，它並有《省級中國》（Provincial China Journal）刊物。劉寬認為，「澳洲對當代中國的研究代表了澳洲中國學研究重點的轉移，而專注於各省的研究則體現了澳洲中國研究為其國家政經利益服務的原則與特色」（劉寬，2006：360）。

澳洲的學科訓練源於歐洲卻有別於歐洲的傳統漢學路線，而多偏向美國式的研究方法，並多在社會科學的領域從事當代中國的研究，不過並不刻意尋求用理

¹⁴ 澳洲政府在其聲明中描述澳大利亞為：一、是一個誠摯的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國民之間尋求和解的國家；二、一個多元、而非單一文化的國家；三、一個公共生活中很少男女差異的國家；四、由民族的網絡所建構而成的國家，而非截然的邊界和領土主權界定的國家；五、是個泛太平洋的國家，而非一個西方國家；六、是個具有高度文化意識的國家，並藉由文化想像形成的共同體。轉述楊聰榮，2006，〈當本土成為主流價值—借鏡澳大利亞國家認同的發展〉，網址：<http://www.tisane.org/activity/20060610/conference/2-4.pdf>，檢索日期2010/08/04。

¹⁵ 其內容寫到「以來自各地的祖先形成的澳洲人共同體為榮…堅持自由、容忍、個人尊嚴與法治…以原住民為榮…肯認歷代的移民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可參見澳大利亞國會圖書館，網址：<http://www.aph.gov.au/library/intguide/pol/polcon.htm>，檢索日期2010/08/03。

論套用中國以達到了解中國的目的（曾彥中，2009：97-116）。根據學者韋立德（Tim Wright）的研究，中國研究近年來的成果頗為豐碩，¹⁶這反映了澳洲走向開放後，來自世界各地學者的貢獻。雖然澳洲曾經經歷很長的時間在探索自身究竟該立足於西方還是東方，但目前似乎已經有了方向。它不只試圖在國際亞太事務上逐漸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而且在中國研究的議題與研究者的組成上都遠較過去開放與擴大。

因此，早期自居於西方的澳洲關注的焦點，是亞洲是否可能威脅到自身的存在，但西藏並非其主要關懷的亞洲事務範圍。然而，隨著國家逐漸面向亞洲與趨於開放多元，澳洲不但開始重視亞洲，更把自己視為亞太的一份子，著重參與亞太事務。1970 年代開始，澳洲政府接納流亡藏人移居澳洲；達賴喇嘛也在 80 年代後多次訪問澳洲，並受到熱烈的歡迎。如今，澳洲人不但關心西藏事務，甚至多有起而行之組織志工團體前往西藏地區服務或是支持西藏政治運動者。整體言之，澳洲歷經如此劇烈的身分轉型，其不同時期的西藏問題研究文獻是否可能有不同的面貌，而又反映了什麼樣的「中國」，這與澳洲經驗（包括中國研究發展）能否連繫，是本文想要在澳洲的部分探討的。

第三節 問題意識

自 1951 年中共出兵西藏以降，1959 年十四世達賴喇嘛及大量藏人流亡至印度與尼泊爾等周邊國家，而後在這些地方又各自衍生之種種交錯複雜的議題，學界對「西藏問題」的研究始終不曾停止。時逢中共整體國力與在國際政經辦演的

¹⁶ 1997-2001 年間於澳洲中國研究學會(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CASS)發表的論文數量與種類為 274 篇，其中 45.3%為社會科學領域；與 1989-2002 英國漢學研究學會(British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BACS)的 91 篇與 17.6%，歐洲中國學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EACS)1998-2002 的 454 篇與 18.5%，對比之下澳洲在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的領域表現驚人。見韋立德著、劉霓譯，2004，〈澳大利亞與英國的中國學比較〉，《國外社會科學》2004 年第六期，頁 64-68。

角色日益重要，而又使得情況更為複雜（何包鋼，2007：5-9）。北京始終強調問題源起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並採取西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¹⁷的立場，完全不容他國干涉。但實際上這個問題其所牽涉的對象已是跨國界的、多地區的，而形成是一個區域性與國際性的問題。若追問中共為何要出兵西藏時，則將論及中藏近代歷史的發展，而這又與十九世紀列強在中亞南亞地區的勢力角逐以及近代中國自身之歷史發展過程有關。學者 Anand 總結認為「西藏問題」能夠提供給我們探討的課題至少有「主權、宗主權、帝國主義、人權、認同、民族主義、跨國民族主義、流亡…等」（Anand，2004：xiv）。

西藏問題的複雜就在於涵蓋範圍極大，很難經由精確地理論化全面解釋，也似乎無法以某個當代的單一主權國家內部發展來闡明，以致於其議題的邊界與範圍都不容易被劃定出來。質言之，西藏問題的核心源起與近代中國發展密不可分，但其議題的發展卻已跨越中國達至周邊國家，甚至是全世界。可以說，西藏問題是牽涉中國極深卻又常可跳脫以主權中國為框架而探討的一個重要議題，是時空上源起於主權中國境內卻不斷地進出遊走這個框架內外的一個發展中議題。而且，研究者不論直接以現今中國境內的藏人為探討對象，或是以流亡藏人為探討對象，最終，都不可避免的談到西藏與中國的關係，而這同時意味著這探討西藏同時也探討著「中國」，而這時候就從中可以看出研究者顯露出「中國是什麼」的預設角度。

本論文選取兩個國家作為探討對象：澳大利亞與印度，兩者過去都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但後來走上分殊的發展道路。一方面，澳大利亞是既有西方傳統也有東方文化的多元文化融合，當其帶著這樣的經驗背景面對西藏問題這同樣牽涉人權價值、少數民族政策、文化包容、主權國家內政等多方面的議題內容，以澳洲這樣的背景究竟會發展出什麼觀察視角，對於理解世人眾說紛紜的西藏問題的

¹⁷ 中共始終維持一貫立場。例如在 2009 年 3 月 13 日全國人大會議結束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回答《費加洛報》記者時「西藏領土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藏問題屬於中國的內政，不容他國干涉」。見西藏信息中心，網址：http://big5.tibet.cn/news/xzxw/szfl/200903/t20090313_460174.htm，檢索日期 2009/10/15。

性質必能有所啓示。故我們可設想除了因為澳大利亞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密切，因此在對西藏問題的探討上應多會有與經濟議題有所結合之外，是否也會就自身的大英國協經驗與聯邦經驗，乃至於澳洲學術社群是來自多國學者共同開展的社群經驗，而能對中國同樣做為一多元文化的結合體，有超過其他地區的敏感度？

另一方面，同樣是多民族與多宗教的印度，歷史上作為一個與中國相鄰的古老文明，雙方在歷史上的文化交流互動源遠流長，印度知識界對於印度影響中國的哲學宗教思想總是津津樂道。在近代從事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進程中，雙方在心理上產生自然共鳴，相互聲援。¹⁸但是，西藏與印度的關係也極為密切，從文化上來看，雙方享有某個程度上的共通精神文明，¹⁹彼此視對方為具有高度的文明，西藏的邊界並不侷限於中共的西藏自治區。而儘管印度在 1947 年獨立建國後，尼赫魯政府對外關係採取的是不結盟政策，而實質立場較為傾向中共。不過 1962 年的中印邊界戰爭使得印度體認到，中印之間的關係並未如尼赫魯所認為的如此樂觀一致。而使印度官方所支持的中國研究議題轉入一個以外交和安全議題為主的領域。這樣的與中藏交往的歷史背景，又能帶給我們什麼樣的西藏問題視野與對「中國」的認識，值得我們探究。

印度與澳洲知識界所各自具備敏感度的西藏問題研究議程應會呈現顯著的不同，而這同時又能進一步反映出這些研究背後的中國觀。本文處理以下問題：一、從印度以及澳大利亞兩國的英語文獻中整理出它們西藏問題研究狀況，並從其觀點中推測出它們如何預設中國；二、比較這兩個時空條件互異下的雙方視野，並推測其中原因；三、將印澳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與其各自的中國研究對照，釐清其西藏問題研究與中國研究的關係。

另外，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本文並非預設澳大利亞學界與印度學界對西藏問題會有一致的立場或是中國觀，而是試圖將各別的學界討論放回知識社群的脈

¹⁸ 可參閱譚中，2006，《印度與中國：兩大文明的交往和激盪》，北京：商務。在該書中，其以充滿和樂與期許的角度介紹雙方長遠的互動歷史。

¹⁹ 石泰安指出，西藏人認為自己是居住於喜馬拉雅山脈北方的蒙昧人，而且印度有許多地理名詞都被移用到西藏；另一方面，印度人認為天神居住在北方喜馬拉雅山區，因而認為西藏一帶是聖地。見石泰安著，耿昇譯，1999，《西藏的文明》，北京：中國藏學，頁 40。

絡，認識其合理性，並不因此否定個別學者的開創性與能動性。如此既可以比較澳大利亞與印度的視野，也可精緻化補充學界西藏研究與中國研究文獻，更可以記錄爬梳出具有脈絡開展過程中的能動性與多元性。

第四節 文獻檢閱

過去討論西藏問題的文獻多半是從肯定或否定中國主權的前提而開展，進而聯結到對中藏關係、中印關係、中國外交以及中國與冷戰時期事務的討論等。而此類的研究實在不可勝數，國內外的數量都極為驚人。國內的文獻可以參考張駿逸（1994）〈中國歷朝主權在西藏的承繼及確立—由行政觀點看〉、楊開煌（1999）《達賴喇嘛『西藏問題』國際化之策略分析》等著作。也有從西藏抗暴的角度與心理層次面向來探討藏人抵抗的中國行動者如林照真《喇嘛殺人》（1999）的著作。蘇嘉宏《流亡中的民主》（2005）以西藏流亡政府如何在印度發展與實施民主政治的歷程為討論對象，則可以說是相關研究議題上的突破。

而中國大陸方面的研究文獻不論探討為何，卻幾乎必須先站在肯定主權的立場開展。例如伍昆明（2006）主編的《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張永攀（2007）《英帝國與中國西藏 1937-1947》等。不過王力雄（2009）《天葬》一書並不如此立論，而且本書也是了解西藏問題相當值得參考的著作。他從西方現代化壓力介入古老中國傳統國際體系而引起的中國轉型來探討西藏問題，並詳實的用這個理論檢討過去中西方對西藏問題研究觀點可能面臨的謬誤。可以說，他的研究已經涉及到本文探究的中國視野，即如何認知中國。

本文進一步整理探討澳大利亞與印度學界眼中的西藏問題，並從中得出各自對中國的認識視野。如此，將可以得到兩個學界對此議題的看法，有助於拓展現有的討論視野。

印度方面的西藏研究數量頗多，而且由於過去與中國曾經因為邊境問題發生

過戰爭，因而對這方面的討論在在中國研究的文獻中也常見到。比較早期對於整個印度的西藏研究作出回顧文獻的至少有 1972 年 V. V. Gokhale 的〈印度的西藏研究〉(Tibet Studies in India (A Brief Survey)) 與 1983 年 Nirmal C. Sinha 的〈現代印度的西藏研究〉(Tibetan Studies in Modern India) 兩篇。V. V. Gokhale 的文章詳細的介紹西藏研究在印度的發展，並說明，在現代西藏學發展以前，印度與西藏已經有長遠的往來歷史。而西藏學作為一門學科被確立後，印度的西藏研究還有兩個發展脈絡，一個主要關乎對佛教的探討，這與傳統西藏學的研究路線較為接近，也與泰戈爾以文明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傳統契合；另一條脈絡則是與英印殖民政府時期所帶入的現代學科研究方式有關，主要偏重在社會科學領域，並著重在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背後帶有相當強的戰略意義，整體言之，可以說是契合現代主權國家對於所處環境與戰略需求的研究。Nirmal C. Sinha 的文章基本上是對印度西藏學的一個回顧。在該文中，他整理了印度西藏學的發展，以及有哪些研究單位、期刊、學者著作等等，並非常詳細的介紹了錫金地區的研究成果以及印度鹿野苑的「中央西藏研究院」等兩個非常重要的西藏研究單位。他並且認為，西藏學具有獨特的地位，雖然與印度學、中國學都有所重疊之處，然而並不能簡單的就將其視為其中的一部分。

由於西藏問題在印中關係中的敏感性地位，因而西藏足以發揮影響印度中國研究的效果。達瓦諾布 (Dawa Norbu) (1997) 的〈中印關係中的西藏〉一文就提到了西藏問題是影響印度中國研究的一個要素。龐恰克 (Phunchok) (2009) 在〈西藏狀況的一個印度觀點〉也有同樣看法，認為西藏問題足以影響中印雙方在互動上的信任。2010 年 Sharad K. Soni 與 Reena Marwah 兩位學者站在 V. V. Gokhale 與 Nirmal C. Sinha 兩篇文獻的基礎上，發表了一篇〈影響中印關係的西藏因素〉(Tibet Factor in India-China Relations : Some Reflections) 論文。該研究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將印度的西藏研究與中國研究的關係作了闡釋，並具體的指出，儘管西藏研究與印中關係看似沒有關聯，但在當前西藏問題的發展與印中兩國因為西藏問題與邊界爭議的聯繫下，印中關係實質上會因為「西藏」而有所影

響，反之亦然。因而，當代印度的西藏研究必然會與印中關係的研究有所對話。

澳大利亞從事西藏研究的學者人數不多，關於整個澳洲的西藏研究文獻數量也比較少。澳洲格爾非思大學(Criffith University)國際商業與亞洲學系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siness and Asian Studies) 榮譽教授馬克林 (Colin Mackerras) 曾經運用訪談與文本分析，針對學者自我認知以及分析學者的著作文獻，於 2009-2010 年期間作出關於澳大利亞、新加坡、香港等地的西藏研究者等地區的西藏研究的特色。該文有極大的部分處理澳大利亞方面的學者，是本文研究時一個相當良好的參考資料與文獻。馬克林訪談了對漢藏對話頗有研究的澳洲國立大學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 的 John Power 教授，以及深入中國為藏人從事非營利事業 (NGO) 服務且同為澳洲國立大學的希爾曼 (Ben Hillman) 教授，以及同為格爾菲斯大學的 Gerald Roche 教授，狄肯大學 (Deaken University) 的澳洲籍的華人學者何包鋼 (He Baogang)，詢問他們「西藏是什麼？」、「為什麼研究西藏？」、「西藏研究與中國研究的關係？」，以及「對中國政府的看法？」等問題，兼以分析他們的學術著作文本。研究發現，在澳大利亞從事西藏研究的學者大致上可分為兩種研究取向，一者偏向傳統藏學的研究途徑，一者則是偏向以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方式，後者並且多與中國研究有關，方法論上也多採取田野調查的方式。馬克林認為，儘管澳大利亞民間討論西藏問題非常熱烈，但在學術上澳洲的西藏研究成果尚難以與美國、英國、印度等地區競爭，而且對於西藏的研究並不容易跳脫中國研究的脈絡背景。

第五節 研究架構

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採質性研究，而對印度與澳洲從事西藏問題研究的知識社群論述作出比較。具體的研究途徑則使用到文本分析法、比較文獻、歷史分析法，以及深入訪談法。

在本研究中，印度與澳大利亞的西藏問題研究文獻主要被作為研究對象而要加以探討。研究者事先並不預設任何立場，藉由深度的閱讀與分析，而進入文獻主體的脈絡中，從中解讀作者的論述、問題意識，甚至包括對篇章結構的安排。從個別的文本到全面的文本群中，逐步形成歸納出兩地學界社群對於西藏問題的共通論述，以及透露的中國觀。

在比較文獻法的部分，則是立基於大量而深度的對作為研究對象的文本作出分析後，歸納其論點，進一步與另一個對同樣主題有作出研究，卻可能有截然不同論述的文獻群作出比較。經由這樣的過程，本研究得以明顯地發現印、澳學界在議程開展與論述特色等各方面的差異性，並進而釐清與解釋，這種情形形成的可能原因。

在歷史分析法部分，其主要是一種藉由記錄與陳述來發掘過往事件的方法，可供建立後續研究的基礎，發展相關的參與觀察或是訪談，多用於同本論文的質性研究。在運用上並特別適合用來探索過去未曾檢視之領域，以及重新檢視某些尚未獲得解答的問題。在這種研究途徑中，由於特別重視當代思想與歷史社會的張力辯證，研究者因而需要敏感的省視他人的詮釋（Catherine Marshall、Gretchen B. Rossman 著、李政賢譯，2006：155-156）。本研究運用這種研究方法，而把探討的對象放在印度與澳洲學界兩個知識社群的西藏問題論述與其國家的中/藏經驗的背景上，對於提供理解印、澳學界論述的形成以及其差異性有極大的幫助。

在深度訪談法部分，筆者於台灣先後訪問過西藏流亡政府駐台辦事處達賴喇嘛西藏宗教文化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Dawa Tsering,2009/10/06）、西藏流亡政府議員凱度頓珠（Khedroob Thondup,2009/10/12）、西藏青年議會台灣代表札西慈仁（200/11/23）等，以增進除文獻之外，看從藏人觀點對西藏問題的理解。澳洲學者馬克林來台進行口述歷史時（2009/08）筆者也曾經就澳大利亞的西藏問題

研究與其交換意見。2010年4月筆者參加一場位於印度新德里舉行的「西藏研究」研討會（AA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ibetan Studies），該場研討會除了印度各重要單位（包括尼赫魯大學 Sharad Soni、Sangeeta Thapliyal、德里大學的 ReenaMarwah、防衛研究與分析機構 IDSA）的學者，也包括馬克林等外國學者，從會議期間與學者交換意見中逐漸觀察到印度觀點與澳大利亞觀點之間的差異。會議結束後，筆者前往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Dharmśāla）作田野調查，一則瀏覽其圖書館檔案室，蒐集相關資料，另外也與（前）現任流亡政府政府官員會面，包括現任流亡政府外交部長杜敦桑培（Thubten Samphel）、前宣傳部長久欽·圖登南嘉（Thubten Namgyal）、前安全部長久美倫珠仁波切（Jigme Lhundup）等，並分別作了訪談。他們不吝提供印度、澳洲與西藏往來的資訊，對本研究的貢獻甚多。²⁰（可參閱附錄一至三）

在上述之外，在撰寫本文的研究期間內，筆者還與流亡政府駐澳洲坎培拉處取得直接聯繫，不但有多次的通信來往問答當地的情形，更獲得他們所自行整理的澳洲與西藏來往的相關資訊，是本研究另外一個補充了解澳洲與西藏來往情形的重要資料，其中詳細度並不亞於直接訪談所能獲得的成果。（可參閱附錄四至七-3）

二、章節安排

本研究預計分成六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在此章，將闡明本文研究主旨，說明研究動機、以及研究問題背景，包括西藏問題緣起暨各方觀點的介紹、澳大利亞與印度個別的中國研究發展等。並進一步闡述問題意識與研究架構、篇

²⁰ 筆者在達蘭薩拉的期間本還擬訪問前流亡政府駐澳洲坎培拉代表、現任另一外交部長丹增·阿提夏（Tenzin P. Atisha），然而時正因公務繁忙，無法完成，但獲其邀請參與「謝謝你喜馬偕爾邦」活動，而見到當地邦首長與地方官員及許多當地印度人出席活動，因而更得以體會在印度流亡藏人與當地社會的結合。另一方面，在與現任流亡政府駐澳洲代表處直接取得聯繫後，也獲得了許多極為寶貴的資料，而彌補了這部分的缺憾。

章安排、與預期成果。

第二章則首先從中藏兩套歷史觀與戰略地緣觀的影響等不同面向介紹西藏問題形成的歷史背景，接著闡述問題發展過程及國際社會對此的關注，最後將焦點轉入印度與澳大利亞，詳述印、澳在政府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與對藏政策。

第三章印度中國學界眼中的西藏問題。首先介紹該章論述架構，並介紹印度學界研究概況與研究單位，包括期刊等。接著討論印度學界眼中的西藏問題，整理歸納後深入探討分析，「西藏問題」在印度學界如何被看待，而它背後又反映何種中國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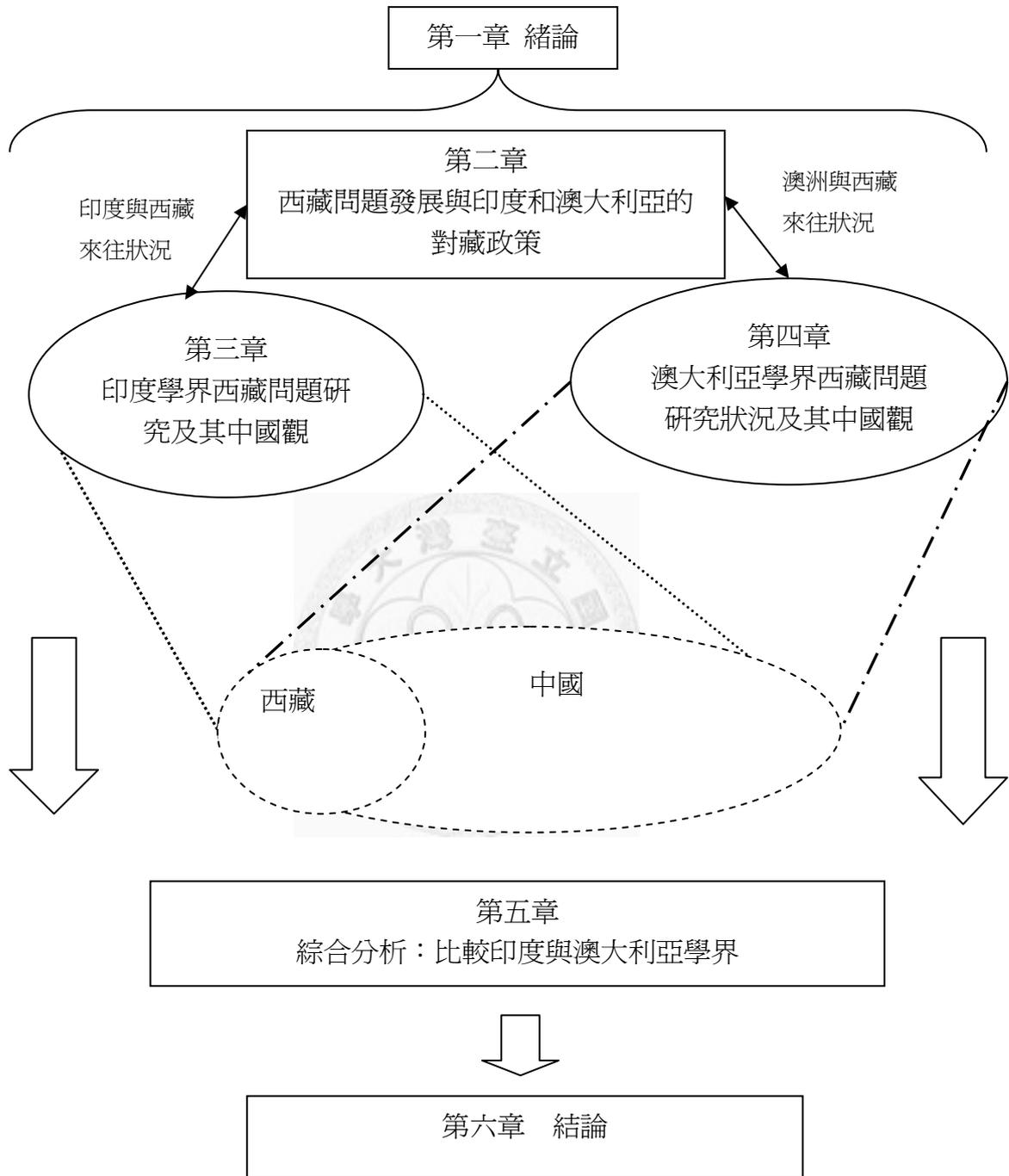
第四章則進入澳大利亞中國學界的眼中的西藏問題。論述方式如第三章，首先介紹論述架構，並介紹澳洲研究概況。此處並以個別學者為單位介紹學界情形。接著整理歸納學界文獻如何探討西藏問題，及其中國觀為何。

第五章則是綜合分析與討論，將前述兩章得出的印、澳西藏問題研究在觀點、特色、「中國」預設等各方面作一完整的比較，而在大脈絡的宏觀面向與微觀層次方面皆有觸及。並同時個別處理比較印度與澳大利亞西藏問題研究與其各自的中國研究關係為何。在過程中，將逐步釐清印澳的研究與其本身學術環境的結構型因素有何關聯，包括其與中國之間的地緣位置，或是本身的歷史傳統等。

在第六章結論，將綜合回顧討論本研究一開始提出的三個問題。第一、印度與澳大利亞可以提供給我們什麼「西藏問題」的視野，其預設的中國又是什麼。第二、比較其視野，並探究其形成原因。第三、將其西藏問題研究與各自的中國研究發展脈絡作出對照理解。最後，整合性提出西藏對印度與澳洲的中國意義為何，並提出未來展望。

整體研究架構，主要是整合過去的西藏問題研究文獻，以及印度和澳大利亞各自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與政策作為知識背景，進一步探討印度與澳洲學界西藏問題研究的狀況，並從其對西藏的知識視野中，再整理出文獻透露的中國觀。比較印、澳學界的部分則偏重在三方面，包括雙方對西藏問題的論述，中國觀的認知差異，以及各自西藏問題研究與其中國研究的關係。其框架簡圖，可以下圖示

之：



圖一：研究架構簡圖

來源：作者自製

三、資料選取與研究限制

在文獻資料上，印度學界的部分主要從發表探討過西藏問題研究的專書以及期刊論文為主，其中包含以西藏問題為名或是以印中關係為題，卻有專論西藏問題發展的研究。在印度學界一個值得注意的情形是，有部分探討西藏問題的學者本身就是藏人，例如達瓦諾布（Dawa Norbu）²¹等。期刊方面的資料也有直接以西藏為主題的期刊，如《西藏期刊》（Tibet Journal）、《西藏再覽》（Tibetam Review）等，都屬本研究文本出處的來源範圍。在必要時會請教原作者，以避免對文本過度解讀。並另外搭配研究期間進行的田野調查與訪問，以及「中國學知識社群研究計畫」印度中國研究的相關成果等。

澳洲學界的部分則多以主要在澳洲發表探討的西藏問題研究專書以及期刊論文為主，以及在研究期間獲得的澳洲與西藏關係或是其他相關資料等。並也參考台大政治學系「中國學知識社群研究計畫」澳洲中國研究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

研究限制的部分，首先，由於本文主要處理的議題為西藏問題，並且主要探討與政治領域相關的文獻，故在內容上純粹僅探討歷史、文學藝術、宗教等的文獻難免較容易忽略；第二，本文文獻以英文為主，故以其他語文寫作者則只好忍痛捨棄不為分析。第三，本研究在範圍上僅選取印、澳西藏研究文獻為探討對象，故在關於中國觀的結論上並不敢妄自稱呼本研究為兩地完整地圖像，但能宣稱至少是存在的對中國認識。

²¹ 教授出生於西藏，但在印度德里大學完成學士學業，而在美國柏克萊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同時也是《西藏再覽》（Tibetan Review）的創刊人。

第二章 西藏問題發展與印度和澳大利亞的對藏政策

第一節 前言

當前西藏問題形成的重要關鍵，在於中共建政後曾幾度用兵西藏。北京方面的立場是要「和平解放西藏」，完成國家統一，亦即主張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相對應的，來自西藏社會則存在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張。然而，西藏成爲政治議題的遠因，實可追溯到更早之前。西藏問題的理解可來自於兩種方面，一方面是對歷代中藏關係的看法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則是借用主權觀念後而對西藏領土的掌握產生的不同目的。前者關乎對歷史的態度，後者則關乎戰略價值。這兩者共同構成了西藏問題發生的背景。

儘管 1951 年中共進入西藏後，與拉薩代表在北京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點和平協議 17 points Agreement），但西藏地區的情勢仍未穩定下來，藏人居住的局部地區也持續不斷的有小規模的衝突發生，直到 1959 年更爆發成全面性的動盪，解放軍全面進入拉薩，達賴喇嘛出走而流亡印度至今。

自此，「西藏」分裂成兩個西藏：西藏流亡政府（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TGIE）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自治區（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AR）。當今國際關懷的「西藏」，有時候雖然同樣一個字，但指涉的對象卻不一定是相同，它可能是指流亡的藏人社會，但也可能對象是北京政府統轄的「中國」境內部分。

本章將依序於第二節介紹西藏問題發生的背景，包括兩套不同的歷史觀與戰略政經等原因；第三節介紹西藏問題國際化，包括分裂後的西藏發展與國際社會

當前態度的概述；第四節則專論印度、澳大利亞與西藏之間的來往過程。

第二節 西藏問題形成的背景

當前西藏問題的重要核心之一，在於「西藏是不是中國一部分？」，而論者所持不同的歷史觀，決定了是如北京至今宣稱中國擁有西藏主權，或是如反對者主張西藏是一個獨立但卻處在被非法佔領狀態下的國家。另一方面，由於現代主權國家觀念的影射著對國家利益與戰略考量的追求，因此百年來各國乃至於歷代北京政府皆試圖控制此地，也是導致此地紛亂不已的原因之一。

一、兩套對立的歷史觀

(一)「中國」觀點

採取此派觀點者把西藏視為中國的一部分，並引用大量中國歷代官修史書中記載的雙方互動關係為證明。在這類的觀點中，雙方的互動關係究竟何時才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則仍有不同的解讀。例如，有學者以為，藏（時稱吐蕃）雖然在中國唐朝時雙方多有來往，不過當時它仍然要被看作是一個與中國相對等的國家；直到元朝才能開始算是真正把它納入中國的版圖中；且要能真正確立對西藏的主權則應該等到清朝時期才能算起（吳敬恆等，1933：1-15）。然而，也有學者主張中藏關係應該放在現代中國的發展過程中理解。他們認為，「中國」其實是一個從歷史上不斷發展出來的概念，並在形成的過程中不斷擴大內部的民族組成，版圖也隨之有所變動，而最後終於成為一個當前的「多民族國家」。據此，在各時期各地人民來往的文化、經濟、政治活動，都應視為是這個過程當中的一環（王貴等，1995：2-14）。因此，儘管歷史上有許多中原王朝，有些朝代還與

其他「國」並存，例如戰國時代的七雄、或是宋朝與西夏、契丹等，但是都是共同構成現代「中國」形成的要件（張雲，2008：29-30）。因此，西藏儘管常在歷史上是與中原王朝平行存在的「國」，但也僅能視為是「中國」歷史上存在的地方民族政權而已。

論者依照史冊回溯，唐朝之時，儘管雙方尚未有明確的行政隸屬關係。然而藏王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藏王赤德祖贊與金城公主之兩次先後的聯姻，促進了雙方在文化與經濟上的交流。唐太宗卒、高宗即位時，松贊干布也派使致哀，高宗更因此封藏王為駙馬都尉、西海郡王、賓王等稱號，並刻其石像立於皇陵。唐穆宗（821年）時期雙方更曾訂立「甥舅碑」，一方面確立兩國邊界，一方面也表示了雙方的名分等級。這些事件顯示，彼此實質上實難盡以平等的國與國關係視之。北宋朝之時，儘管各地紛亂，而宋之武功也不如唐，但當時版圖仍到達今日甘肅、青海一帶，藏人也仍有入朝為官者（王貴等，1997：37-59）。

元朝可以當成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因為西藏（當時稱烏斯藏）已經明確的被納入帝國版圖中。儘管忽必烈與巴思八兩人之間具有宗教上的「檀越關係」；但是在世俗關係上他仍然在行政體系中設置了總制院（後改為宣政院）負責處理藏地之事務。而且在整個元朝期間，西藏還同步與中原地區進行清查全國戶口，建立驛站系統，並在衛藏地區劃分十三萬戶行政區（呂秋文，1999：5-16）。論者均指這些措施明顯證明雙方已有中央與地方的臣屬關係。明朝時期朝廷較不主動介入藏地事務，當時採取的對藏政策是「因俗以治」，亦即按照原有當地的政教狀況，由朝廷大肆分封僧人、俗官，但是職位仍須經朝廷認可才可承襲下去。清朝以後雙方關係更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密切。達賴喇嘛五世曾經進京謁見順治皇帝，返藏時獲得皇帝賜「西天大善自在佛統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但喇達賴喇嘛」印信，用於處理藏內事務的公文。此後歷任的達賴喇嘛也都有皇帝所賜之印信，而印文的開頭總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以表示權力來自於朝廷；清廷雖在初期基本上不干涉西藏事務，但在幾次因故而對藏用兵後改變了政策，包括雍正年間設立常設的駐藏大臣，並於乾隆年間先後頒行《欽定西藏善後章程》與《欽定

二十九條章程》，以制度化噶廈制度、治藏事務等內容，以及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的認證程序等（張駿逸，1992：387-401）。

凡此種種，皆為此派論者視為足以證明，西藏早已在歷史上逐漸發展成爲中國一部分，而中國也在這過程中確立了對藏的主權。儘管滿清末年乃至於民國時期西藏地區的情勢變得紛雜，但那是因爲西方帝國主義入侵使然，在中共建政後出兵趕走了帝國主義，解放西藏，而使中國得以恢復在西藏的主權後，已終獲解決。以上是從「中國」觀點看到的中藏關係。

（二）「西藏」觀點

「西藏」觀點則幾乎針鋒相對於「中國」觀點，其中雖然引用中文方面的史料，但也輔以其他史料與研究而得出不同的結論。此派論者認爲「中國」自古以來就存在，並視爲是漢民族所建立的國家，歷史上漢藏雙方的關係也一直是平等的狀態。儘管在元朝時期與清朝時期西藏確實與蒙古、滿洲的關係較爲密切，但這是基於宗教上「檀越關係」的互動，而不能看作是行政上的統治與被統治關係。更何況西藏與蒙（元）滿（清）的接觸皆早於當時的「中國」，所以並不能主張西藏在這些時期成爲中國的一部分。而且，相較於中國觀點把清末到民國這段時期視作西方帝國主義的介入而導致的紛亂不定，西藏觀點則非常明確地主張這段期間西藏已經成爲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並提出諸多證據。如此，在此觀點的認知中，中共自 1950 年起訴諸的解放與統一祖國的軍事行動完全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非法佔領。

夏格安的《西藏政治史》以及達賴喇嘛的《我的土地，我的人民》、《流亡中的自在》等可被視爲是這類觀點的代表作。從後兩本書中可以看到達賴喇嘛如何以一個當事人的立場描述西藏從一個自由國家成爲「中國」一部分的經過。而夏格安更是在該書中整理了西藏從早期王朝到中共入侵與 1959 年 314 抗暴的過

程，並相當著重西藏佛教發展的面向。依照夏氏的整理，松贊干布是早期王朝中武功最為顯赫的藏王，他一統整個西藏，使其成為七世紀左右中亞地區最為強大的帝國，其勢力堪與東邊的大唐並立，甚至有時候還超越之。松贊干布前後迎娶了來自尼泊爾與大唐的公主，一方面促進彼此的交流，一方面也與周邊國家保持穩固的關係，更開啓了西藏與佛教的接觸，並逐漸成為西藏的主要重心。在吐蕃王朝中後期乃至於元朝建立的期間，西藏陷入小王國林立的分裂局面，夏格安此時主要著重在西藏的佛教發展而非與中國的關係（Shakabpa，1967：23-60）。有學者更進一步直言在這段期間（約五代到宋朝）西藏與中國根本沒有實質上的來往。²²

至於在元、清等朝代的蒙藏與滿藏的關係上，西藏觀點認為雙方的關係不能把重點放在政治，而必須從宗教上的連繫來理解彼此的互動。

西藏與蒙古之間的來往早於元朝的建立而始於蒙古的三次西征期間。1207年西藏聽聞在東北方的西夏被滅，隨後蒙古就派人來主張和平並要求西藏納貢；1240年統治青海一帶的成吉思汗孫闊端（Godan）邀請當時的宗教領袖薩加派的貢噶嘉措（Kunga Gyalsten）前往說法，並宣布將整個西藏的政權獻給他，這被看作是「檀越關係」的建立。這到了忽必烈時期得到更進一步發展，他邀請了貢噶嘉措的弟子八思巴前往蒙古說法，並尊稱他為「帝師」。基於對八思巴的尊重，蒙古帝國即使日後滅掉南宋建立了元朝，西藏地區實質上仍維持完全由藏人自行管理，元朝廷只是間接上的統治。明朝時期，「中國」與藏雖然都已不在蒙古的統治之下，然而蒙藏之間以及中藏之間以佛教作為紐帶的聯繫仍未斷裂，「達賴喇嘛」之稱謂更是由蒙古人俺達汗（Altan Khan）獻給當時格魯派的宗教領袖索南嘉錯（Sonam Gyasto）的敬語而來（Shakabpa，1967：93-95）。

在大清帝國崛起之前，雙方也早就藉由宗教的關係而有了互動，原因來自於

²² 例如 M.C. Van Praag 著、達瓦才仁譯，2008，《西藏的地位》，台北：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頁 4；Goldstein, Melvyn C. 1999.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34.

滿蒙的聯盟關係而使得西藏佛教傳入了滿州。²³1639年在滿清尚未入關前，清太宗已派出使者邀請達賴喇嘛五世訪問盛京。雖然沒有成行，達賴喇嘛仍然在回覆的信件中接受了滿清皇室作為佛教徒。論者指出，1644年滿清入關後，達賴喇嘛訪問了北京，並受到極為尊崇的禮遇，雙方「互贈名號」，而非冊封。後來清朝雖然有幾次出兵西藏，但這些都是收到西藏的求援而進行的干涉，並且清兵也都在事後撤出西藏。乾隆年間雖然設立了《欽定善後 29 條章程》，但在實際情況中駐藏大臣均須要尊重達賴的意志而不能肆意干涉到西藏內政。直到滿清末年雙方的關係破裂之前，達賴喇嘛始終是西藏的政教領袖，而西藏也是一個實質上的獨立國家。儘管清朝末年曾試圖改變這個情況，但辛亥革命的暴發則扼殺了這個可能。1912年，達賴喇嘛十三宣布西藏獨立，並於隔年與外蒙古簽訂「蒙藏條約」互相承認獨立（Praag 著、達瓦才仁譯，2008：15-69）。1914年，英藏雙方自行簽訂「西姆拉條約」，就印藏邊界劃定「麥克馬洪線」，將西藏劃分為「內藏」與「外藏」，並承認中國具有內藏管轄權，而在外藏則俱有宗主權。²⁴日後英屬印度也就根據此條約內容與西藏互動（Goldstein，1999：34）。

此派論者認為，西藏在 1912-1950 年這段時間事實上（de facto）是獨立的，二戰期間也嚴守中立。1947年更躍上國際舞台受邀參加印度德里舉行的「亞洲關係會議」（the Asia Relations Conference）而讓「雪山獅子旗」飄揚在會場，並且在印度同年獨立後雙方仍保持密切來往。1949年前後國民黨政府代表離開西藏後，獨立之勢更形明顯，一直維持到解放軍的入侵國家被侵佔為止。

二、主權觀念影響下的西藏領土觀

²³ DIIR. 2001. *Tibet and Manchu*. Dharamsala, H.P., India: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p.1.不過，也有論者以為滿州是為了加強鞏固對蒙古地區的統治才接受西藏佛教，見許嘉裕，1997，《西藏地位問題爭議之研究》，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8。

²⁴ 但此條約未受到同時參與會議的中方代表同意，中華民國政府也從未承認，不過由於此時的中華民國疲於應付其他內外紛爭而也無力處理。

各界對於傳統藏中關係的理解產生截然不同的結論，其間另一重要原因在於，西藏的歸屬並不適合只以現代主權觀念理解之。然而，近代的國際關係卻又已經成爲以主權國家組成的體系，面對這股浪潮，中國、西藏都無法置外，在這個轉變過程中，被迫將原來的非領土主權的關係，重新用「主權」看待自身與其周遭的環境（王力雄，2009：56-60）。故在立論上除了來自於歷史的依據不同，往往更不能忽略西方主權觀念帶來的壓力，例如對領土的重視。這同樣是構成西藏問題發生的重要背景。在以下的論述中，西藏有時被當作是地理領土的概念，有時則指達賴喇嘛的政府；而從行動者的角度而言，出於中國立場者，西藏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而立於西藏立場者，則將中國視爲是與西藏平等的另一個國家。

西藏位於素有「世界屋脊」(roof of the world) 之稱的青藏高原，地理位置上不但是世界最高處，而且還有多條亞洲重要的河流，包括：長江、黃河、印渡河、恆河、湄公河等均發源於此；而境內的冰山、冰川、豐富的礦產資源以及獨特的野生動植物等，更是關乎全球生態環境的重要自然資源。其南邊的喜馬拉雅山區域（1500 哩）接壤印度、尼泊爾，與不丹等國，其東邊相接中國（Gupta，2005：29-31）。雖然在地勢上如此高聳，又被眾多的高山環繞，而形成相對封閉的狀態，可是高山之間的谷地河流仍可在部分時節通行，其北方可通過阿克賽欽地帶與崑崙山等進入新疆，再往西可進入克什米爾、帕米爾高原等地（陳繼東，2003：3-7），往東南則可進入雲南、緬甸等。如果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西藏的位置自不單純只是世界最高處，而更是亞洲戰略的心臟地帶，對周遭國家的領土安全有決定性的影響，這也是開啓近代西藏問題發生的重要因素。論者雖以各種名目關懷此地，然而不少敘事的字裡行間多次提到此地的戰略意義，就可見其整體動機不單純僅是文化或歷史的。

大英帝國是西方首先對此地發生興趣的。在十九世紀控制全印度次大陸後（the Raj），爲了鞏固殖民利益，它不斷地防範任何可能出現的挑戰，而挑戰最可能來自北方的俄國與東方的中國。因此了解與掌握與印度接壤的西藏，就成爲英國必須要努力的目標。1861 年與 1865 年，英國先後攻打原來西藏勢力範圍內

的錫金與不丹，將其強行納入控制範圍。1888年，英藏因爭奪錫金而發生衝突，藏軍落敗，清廷出面調和，與英國於1890年簽訂「中英藏印條約」正式承認錫金為英國保護國。1893年又簽訂「中英藏印續約九條」許諾開闢藏內的亞東（Yatung）為貿易區，並接受英國人前往貿易。但西藏並不承認條約成立。²⁵

錫金、不丹等地陸續落入英國勢力，而傳統盟邦清廷更與其簽定條約而非替西藏出面爭取權利，這不禁讓西藏思索是否該擺脫清廷而重新尋求另一倚靠對象。此時藉由相當受十三世達賴喇嘛信任的俄羅斯籍蒙古人道爾傑夫（Dorjiev）的運作，沙皇也逐漸注意到西藏。1899-1901年間道爾傑夫率領從拉薩出發的代表團前往聖彼得堡試圖遊說沙皇取代清廷的地位，從而建立俄藏之間的聯繫

（Kuleshov，1996：1-10）。但這件事已被英國方面知曉。自1899年以來，英屬印度總督寇松（G.N.Cnrzon）即採取「前進政策」（the Forward Policy）試圖直接與達賴喇嘛十三世談判而未果，1903年決定派兵前往「溝通」。當時領軍的是榮鶴鵬（F. Younghusband）上校，當他一路進攻到拉薩時，達賴喇嘛十三世已經流亡青海，最後由三大寺（甘丹、色拉、哲蚌）代表出面與他簽訂「英藏條約」（又稱拉薩條約），時為1904年。由於該條約無疑使西藏成為英國殖民地，清廷在知道此事後表示無法接受，經過談判，雙方在1906年重新訂立「中英新訂藏印條約」，並將「英藏條約」作為附約。條約中表明除中國外，他國不得干涉西藏內政的權利。因為英國如此的行動引起俄國的關注，經過協調後，中英俄於1907年訂立「中英俄條約」，共同承認中國在西藏的宗主權。²⁶至此，英國排除了俄國介入西藏的可能。

經過英國的多次進攻以及俄國在蒙古與新疆等地勢力的逼近，這時候的西藏處於「大戰略」（Great Game）中的一環，清廷也意識到不能再用傳統的方式與西藏互動，而決定實施「改土歸流」直接管理西藏。換言之，清廷這時候已經以戰略的眼光來看待西藏。而曾經因為英國的入侵而流亡外地的十三世達賴喇嘛，

²⁵ 外交部檔案叢書—界務類第五冊西藏卷(一)，2005，台北：外交部，頁60-63。

²⁶ 外交部檔案叢書—界務類第五冊西藏卷(一)，2005，台北：外交部，頁63-65。

也在 1904-1908 年的蒙古與北京之行中，意識到西藏自己也必須要改變。當他返回西藏後看見清廷新的對藏政策，清藏雙方之間因而爆發衝突。1910 年清兵攻進拉薩，達賴十三世再次流亡，此時他改前往印度尋求英國的支持以對抗清廷。隨著辛亥革命的成功，1912 年達賴喇嘛十三世自印度返藏並號召起義驅逐漢人，宣布西藏獨立，並在這之後獨立從事一系列外交活動。

Goldstein 審視清末至二戰這段時期的西藏問題發展有獨特的看法。他認為英國自清末以降在介入西藏事務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它既試圖使西藏成爲中印之間的緩衝國，卻又爲了避免在國際上遭到批評而未能在「西姆拉條約」時從名義上解決西藏的歸屬。而中國又認爲它的領土概念乃是承襲自清朝的勢力疆域，因此不斷試圖控制此地。另一方面，達賴喇嘛十三世儘管在西藏推動現代化，卻也遭遇到保守人士的阻撓，同時又缺乏向西方世界宣傳自身地位的機會，這些因此導致了西藏問題的延續（Goldstein，1999：30-36）。

隨著二戰後出現的冷戰格局，情勢又變得紛雜。1947 年到 1949 年間印度雖已被視爲是西藏事務最重要的介入者（Yang，1987：407-420），但面臨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0 年開始的「解放西藏」行動，印度似也不敢貿然行動，而袖手眼見 1951 年解放軍將西藏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不過，1959 年達賴喇嘛因拉薩動亂而流亡印度後成立流亡政府，卻依然引發了印中之間的爭端，隨後 1962 年雙方也因爲印藏領土邊界問題的延續而爆發邊境戰爭（陳牧民，2009：86-100）。另一方面，西藏問題的國際化也使冷戰格局下獨霸一方的美國決定介入（張駿逸，1990：12-14）。整體言之，西藏問題與中印雙方的邊界問題至今仍然是該區域的隱藏性危機。

回顧起來，爭奪領土控制權始終是西藏百年來歷史的主軸，這是因爲其地緣的特殊性，而使得從戰略上而言成爲必要控制之地。不論最早的英屬印度、俄國，或是後來相繼成爲現代民族國家的印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體認到這一點。儘

管達賴喇嘛不斷呼籲西藏可以作為一個印中之間的和平緩衝區，²⁷但只要出於主權國家戰略利益的考量，實現這個主張的道路顯然還很漫長。

第三節 西藏問題國際化

一、達賴喇嘛流亡印度

1950 年中共解放軍展開進攻後，面對現代化的部隊，西藏軍隊幾乎無法抵抗。由於它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因此僅能透過一些國家向聯合國求援。英國在接收到求援訊息後，聲稱西藏在實質上雖可稱的上是一個「國」，不過英國的動向要取決於印度；而印度爲了保持與中國之間的友好，對此卻僅表達口頭遺憾。最後英國與印度提案延緩討論西藏議題；而同時期於聯合國推動韓戰議題上的出兵的美國也無意此時表態視西藏爲一個獨立的國家（Goldstein，1999：46-50）。在無外力支援下，戰事的結果，西藏與中共雙方的代表簽下《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17 條協議）後，中共保證西藏當地的傳統與自治狀態。解放軍從此即進駐西藏（Donnet，1994：15-22）。

在 1951 到 1960 年中共統治的第一個十年期間，中共確實促進了當地農業的發展，在當地的現代化工程中完成了諸多鐵路與公路建設，其中包含了多條連接其他省分到拉薩，以及到克什米爾、亞東等邊境地帶的公路；也在 1953 年完成了北京—拉薩的電話線與 1956 年北京—拉薩的廣播。這些均有助於北京排除原有外國勢力的影響，以及希望從經濟面轉而加強對西藏政治面的影響力，然而其他若干政策施行的不良，卻引發了西藏地區發生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一般人民生活水準反而下降的情形，遭受民怨（Gupta，1960：102-109）。

²⁷ 自 1987 年於美國國會發表「五點和平計劃」以來，達賴喇嘛就不斷推動這個主張。

達賴喇嘛一開始尚以與北京合作能共同推動藏人進入現代化，接受北京的邀請而與班禪喇嘛共同訪問北京，並從中認識了馬克思主義中追求人人平等的精神。他曾多次表示此行帶給他的收穫，使他思索馬克思主義與佛教之間的共通性（Dalai Lama 著、唐鼎譯，1997：108）。然而，中共反宗教的「無神論」及蔑視僧侶的行爲，與藏人重視宗教的傳統格格不入；另在西藏東部（安多、康等地）持續推動的社會主義「民主改革」、「階級鬥爭」，也與當地藏人引發諸多衝突；1955 年以降確立「西藏自治區」的設立，更顯示了 17 條協議的承諾破滅。²⁸這些種種最後都使得一開始零星地在安多、康等地的衝突演變成爲 1959 年整個藏人居住區域估計約有 8 萬人涉入的大規模衝突（Patterson，1960：87-102）。

1959 年 3 月 10 日，駐藏解放軍在接連多日邀請達賴喇嘛前往軍營看戲未果後態度趨於強硬，而民眾也因擔心達賴將被軟禁而阻止其前往；3 月 16 日，隨著多日衝突的擴大，以及神諭的指示，達賴喇嘛於夜晚假扮成小兵與部分隨從離開羅布林卡王宮，並在得知解放軍於 20 日開始砲轟王宮後決定前往印度，從此展開流亡生涯（Dalai Lama 著、丁一夫譯，2010：173-224）。另一方面，當中共確認達賴喇嘛離開後，也隨後下令全面進行社會主義改革。「西藏」的歷史自此進入近代最大的分裂局面。

二、分裂的西藏與中藏爭論的擴大

位於印度北部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與當今中國境內的「西藏自治區」這兩個西藏幾乎是走上了不同的發展。西藏流亡政府在達賴喇嘛的帶領與來自國際的援助之下逐漸站穩腳跟，儘管並未得到印度政府名義上的承認，但確實得到其實質上的幫助。而且達賴喇嘛對過去政府體制進行的「民主化」改革以及與國

²⁸ 17 條協議中表示西藏原有的社會狀態並不會被改變。然而由於雙方對於「西藏」的範圍認知有所不同，中共在安多與康等地推動社改，以及西藏自治區行政體系的確立，這些均被拉薩解讀爲中共無意遵守協議內容。

際媒體的友好相處，更成功的凝聚了全體西藏人的身分認同與贏得了國際社會對他的評價。反觀西藏自治區的狀況，在經歷土改、文化大革命後，雖然改革開放帶來了龐大的經濟援助與快速的現代化，但長期以來藏漢之間的衝突仍不斷。國際社會與媒體普遍認為當地人權紀錄不良、傳統遭到破壞與宗教信仰上並不自由，數十年來一次又一次的爆發動亂與中共的刻意封鎖媒體報導，西藏自治區幾乎被視為成為新的「鐵幕」。

達賴喇嘛在抵達印度後，隨即否認 17 條協議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他並且表明「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目前被「紅色中國」給佔領了。當他與尼赫魯會面時，他表達成立「流亡政府」的意願。然而，尼赫魯也基於自身外交政策的立場表示儘管他很同情西藏，但絕不可能承認西藏流亡政府。這直到今天仍是印度在官方上奉行的政策：保護，但不會給予承認（蘇嘉宏，2005：122）。儘管如此，達賴喇嘛還是在 1959 年 4 月 25 日宣布成立流亡政府。

由於達賴喇嘛認為西藏之所以會被北京所佔據的重要原因，就是西藏過去過於封閉，以及內部過於腐敗等問題。因此，流亡政府在成立之初就決定對傳統的政治制度作出改革。對外方面，達賴喇嘛個人努力奔走國際社會之間，除了一方面宣揚佛法，另一方面也努力的將「西藏問題國際化」，引起世人更多的重視，²⁹因此，外交部（宣傳部，現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IIR）的功能為之擴大。在對內方面，則由上而下的推動民主化，取消了貴族頭銜、頒布憲法草案，並建立人民議會。這對傳統的藏人來說簡直是前所未有的體驗，因為達賴喇嘛居然試圖在憲法草案中主張，「如果須要罷免達賴喇嘛，則根據憲法和議會的章程決定之」。儘管未被藏人接受，但達賴喇嘛推動的改革無疑將傳統的西藏社會逐漸轉變成為一個具有「政教結合」特色的民主政府。1991 年「流亡藏人憲章」更是將流亡政府與人民議會的職責規範化，人民議會成為經由選舉產生的最高立法機構（蘇嘉宏，2005：152-159）。

²⁹ 楊開煌認為達賴喇嘛是有其策略性國際化西藏問題，見楊開煌，1999，《達賴喇嘛「西藏問題」國際化之策略分析》，台北：蒙藏委員會。

此外，流亡政府相當成功的保護了西藏宗教文化傳統以及凝聚藏人的意識，其流亡初期獲得印度提供「達蘭薩拉」作為流亡政府所在地，至今已有「小拉薩」之稱。達蘭薩拉以及達賴喇嘛的存在，凝聚了所有藏人對鄉土、民族、自我意識的認同，同時吸引了西方的目光。這些都是達賴喇嘛流亡之後逐步與各方互動而所建立的。³⁰在地主國印度以及國際社會的救難幫助之下，以及流亡政府與藏人自身不斷努力，流亡政府得以站穩腳步，不斷擴大其內部職能，也更有自信面對來自中共方面的宣傳挑戰。

而在達賴喇嘛離開西藏後，北京政府立刻大力推動改革，並全力推動班禪喇嘛接管原先由達賴負責的一切政務，直到 1963 年由於他的「萬言書」觸怒了北京而遭到冷凍。

1959 年 3 月 28 日周恩來宣布解散原來以達賴喇嘛為領導的噶廈政府，改由西藏自治區籌備會行使其職權，並全力推動班禪喇嘛接手處理一切西藏政務。首先，請班禪喇嘛抵達拉薩，代理原先達賴喇嘛擔任的籌備會主席職務，並在這之後陸續發表《關於貫徹執行國務院 328 命令的決議》、《關於建全和加強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各部門組織機構的決議》等。同年的 4 月 18-29 日人民代表大會也通過《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以及提名班禪當選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由他主持西藏改革事務以及發表「我們西藏永遠是中國的西藏」等文（范明，2009：421-443）。當聯合國於 1959 探討「西藏問題」以及 1962 年中印邊境發生問題時，也都由班禪出面駁斥聯合國與印度在該議題的正當性角色（范明，2009：452-463）。

1965 年，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雖曾經大舉破壞傳統文化與寺廟，但隨後在鄧小平主政中國的改革開放後，已政策指示大力復興之，並著手邀請達賴喇嘛共同討論西藏問題的解決。然而，由於流亡政府代表團拜訪西藏時引起廣大騷動引發中共疑慮，使得雙方交流後來始終沒有更進一步的進展。80 年代後西藏議題在國際上大幅提升其能見度，也影響到雙方的談判互

³⁰ 可見 D.Anand.2004. *Geopolitical Exotica :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其中有詳細的探討流亡期間流亡政府與西方互動而建立形象的過程。

動。90年代後，由於一連串的事件，包括1995年在第十一世班禪喇嘛轉世人選上的爭議，終導致雙方關係正式破裂，中共全面禁止西藏境內存在達賴喇嘛的照片，也全面性的抵制任何對達賴喇嘛的正面評價，直到至今。

而中共自70年代重返國際社會後，許多國際人權NGO組織以及歐美國家也開始對中國民主化與人權議題投入相當大的關注，這同時又與西藏問題聯結起來，而達賴喇嘛的頻頻出訪曝光於國際媒體前更是提升了這個氛圍。1987年與1989年藏人於拉薩的示威，以及北京的天安門事件，國際社會對中共的鎮壓高度反感。但北京一方面投入相當大的遊說能力，另一方面也大力提出不同於西方普世人權的另一套人權論述為自己辯護，再加上全球商業貿易往來日益密切的大環境也使得各國外交政策與人權議題日益脫勾，面對外界的質問中共有退讓也有堅持，在國際場合並不迴避相關議題，這也同時顯示中共認為自己在國際上足以穩得住立場。2008年北京奧運前夕，拉薩發生前所未有的流血示威，北京再度強力鎮壓，各國政府不如天安門事件之時的反應就可見一斑。

2002年-2009年之間，中共與流亡政府舉行會談9次，但始終沒有取得具體的成果（王小彬，2009：417-428）。今（2010年）1月30到31日兩天期間，達賴喇嘛代表甲日·洛迪與格桑堅讚再次與中共統戰部長杜青林舉行最新的一輪會談。在有關領土與主權的相關議題上（大西藏、高度自治權）雙方也仍然沒有達成任何共識。³¹然而，在稍早之前的2010年1月初所舉行的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中，中共在檢討改善藏人經濟議題時首次將四川、雲南、甘肅等地的藏區納入討論範圍，則被部分媒體認為中共的對藏政策可能有所改變。³²整體而言，西藏問題國際化後，幾乎雙方在各種場域之間都在鬥爭，雙方也各擁有不同的支持媒體與管道相互攻訐與批評，而使得問題日益複雜。

³¹ 可參閱新華網的報導，網址：http://tibet.news.cn/xwzt/2010-02/02/content_18939045.htm，檢索日期2010/08/12。

³² 可參閱BBC新聞網址：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0/02/100201_tibetchina_envoysreturn.shtml，檢索日期2010/08/12。

三、來自聯合國、美國與歐盟的關注

相較於 1950 年西藏向外求援無門的困境，1959 年達賴喇嘛的流亡引起了世界各國對西藏的關注，大批的國際媒體報導此事，而聯合國也隨後就「西藏問題」作出討論與決議。這包括了 1959 年 10 月 21 日的 1353 (XIV) 號決議。在該次會議中，聯合國強調必須要遵守「聯合國憲章」與「世界人權宣言」，呼籲重視西藏人民的宗教傳統與人權；1961 年 12 月 19、20 則通過了 1723 (XVI) 號決議，這一次不但呼籲重視人權，還強調了民族自決權的部分；1965 年的 2079 (XX) 號決議則再次確認前兩次的會議結果。³³可以看到聯合國在這三次的決議中，已經從過去不探討西藏的地位而轉而隱含賦與其「獨立」的可能性。不過就當前的國際情勢以及流亡政府目前的政策來說，這個路線發展的可能性並不高。

個別國家及國際組織對於西藏問題越趨重視，部分西方社會的公民團體對於西藏問題的探討與參與，也更加廣泛，具備普遍的草根性。國際社會如何看待西藏問題，可以從美國與歐盟近幾十年來對西藏問題的態度變化來看。

美國各界對西藏議題的態度主要表現出兩種面向，即政府低調而國會積極。政府低調指的是多年來華府始終把達賴喇嘛訪美定調為宗教領袖的訪問，而國會積極則是國會多次通過法案譴責北京違反人權，也持續要求政府關注西藏問題，甚至引發中共強力反彈。以政府層次來看，美國最早開始實質性的與西藏接觸，主要是為了冷戰的戰略布局。為了圍堵共產主義的擴張，除了以東亞作為防堵線外，西藏、印度等南亞也是美國極力要介入的重點。由於印度在外交上奉行不結盟政策，美國無法全面性的與之合作。因此，早期多以資助游擊隊、訓練游擊隊，以從內部騷擾為主。而當與中共的關係逐漸改善，在「聯中制蘇」時期，儘管美

³³ 會議內容可見西藏之頁「西藏與世界」、「西藏人權」部分，西藏之頁網址：<http://www.xizang-zhiye.org/>，檢索日期 2010/3/19。

國已經逐漸以「人權外交」作為外交主軸，因而前後批准了達賴喇嘛 1979 年、1981 年、1984 年的首三次訪美，但是整體來說政府的態度仍相當低調。柯林頓政府時期初曾一度強硬，但後來也轉變政策。而在國會方面，自 1983 年開始討論西藏問題以來，1987 年眾議院通過的「1988-1989 年財政年度外交關係授權法案」(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s 1988 and 1989) 卻是由總統簽署通過的關於西藏問題的第一個法案。在該法案中強烈譴責北京在西藏違反人權與大舉移民等，並呼籲釋放政治犯，另一方面也讚揚達賴喇嘛在保存西藏宗教與文化的努力，並請國務院撥款協助藏人與成立獎學金。1988 年又通過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犯西藏人權案」(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Tibet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將內容首次擴大到要求中共改善西藏人權作為美國授予最惠國待遇的條件等。³⁴整體言之，即使到現在，美國總統與達賴喇嘛會面仍都定調為「私人會晤」，並把達賴喇嘛訪美視為「宗教之行」。美國的大原則是把西藏視為既定中國的一部分，再由對人權的關切來探討西藏問題

歐盟開始關注西藏問題的時期晚於美國，但由於「人權政策」是其共同外交的一環，程度上也絲毫不遜色，而且更多結合美國國會、聯合國等管道共同關注西藏人權與呼籲中藏之間的對話。歐盟更在每半年舉行一次的中歐機制對話中關懷中國的人權狀況，一方面增進雙方了解，一方面歐盟也希望提供自身的經驗使中國在司法改革、少數民族政策等部分作參考。在這個過程中，北京雖然時常強力反駁，但也為了回應而不斷的謀求自身的改善。

歐洲議會作出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始於 1987 年對拉薩示威抗議而造成傷亡的注意，此後幾乎年年都有對於西藏問題的決議，並且也不斷要求中共與流亡政府方面展開會談。歐盟歷次重要的決議者有包括，1989 年譴責中共鎮壓示威民眾；1992 年首次關注西藏自然環境的破壞問題，並要求中共與流亡政府雙方應該就民族自決展開對談；1995 年對達賴喇嘛認證的 6 歲 19 世轉世班禪喇嘛失

³⁴ 關於美國各界對西藏問題的立場，以及美國西藏政策的主要演變過程，可參閱楊以彬，2001，《中共對外關係中「西藏問題」之研究》，政大外交系碩士論文，頁 122-139。

蹤的關注；1998 年指派一位歐盟代表負責處理西藏事務；2000 年後更把西藏人權、新疆情勢與法輪功的鎮壓狀況等加以並列聯繫，要求中共改善人權狀況。最為激烈的一次是在 2008 年，由於不滿拉薩的動盪形勢與北京的鎮壓封鎖，歐洲議會主席宣布不會參加北京奧運開幕典禮，並希望聯合國出面對拉薩事件作出獨立的調查。不過，儘管歐洲議會作出整體多次的決議，但在歐洲個別國家與北京接觸時，以及歐盟其他兩個主要單位「部長理事會」、「執行委員會」面對北京政府的人權問題時，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大部分都把人權問題與政治、經貿問題分開來看，因而實際上歐洲議會的決議並無法完全有效的影響到北京的西藏政策。³⁵

整體言之，在各國官方的政治實踐中，基於中國政經實力的強盛以及彼此雙方來往的密切，幾乎都是同意其「一個中國」政策，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然而，也可以看到，在國內立法層次，或是公民間團體部分則未必如此，因而學術界也當然有所反映。本研究探討印度與澳大利亞學術界對於西藏問題研究的狀況，以下針對雙方各自對該議題與西藏來往關係的背景作介紹。

第四節、印度與澳大利亞政府的對藏政策

一、印度政府與西藏的來往：保護但不承認

不論從哪一個面向來看，印度都可以說是西藏流亡政府最重要的支持來源。根據本研究期間進行的訪談，西藏流亡政府前宣傳部長形容雙方的關係是「同難同當」，也表示過去自己在任內時常與印度政府官員不定期就西藏議題等交換意

³⁵ 關於歐盟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可參閱張靜宜，2009，《歐洲聯盟對中國人權政策之探討—以對「西藏問題」之政策為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頁 103-138。

見。³⁶前安全部長與現任宣傳部長兩者都證實印度確實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給西藏，也都同意印藏雙方往來關係友好的說法。甚至在最敏感的麥克馬洪線議題上雙方的立場也頗為一致。³⁷同時流亡政府也整理出版了自 1950 年以來印度國內政府官員與政黨等曾經在各場合中公開支持西藏的談話。³⁸然而，我們也發現，除了 1965 年印度政府曾經於聯合國發表支持 2079 號決議之外，³⁹絕大多數的時候無論在國際場合或是國內，它的姿態似乎較其他歐美國家來的低調。而且根據流亡政府的整理，1959-2004 年間就各國曾經在西藏議題上作出的任何決議統計，印度竟然完全沒有紀錄可循。⁴⁰這樣的「保護但不承認」的兩面性較之許多國家（例如美國）行政與國會的「兩面性」似乎更有其特殊性。

在 1947 年印度獨立到達賴喇嘛 1959 年流亡期間，中國的政權也從國民黨易手中共，而印度尼赫魯政府在大方向上則逐漸往共產中國靠近，並刻意保持與西藏的距離，但仍然追求保障印度在西藏的利益。譬如，1947 年於印度於獨立前夕在新德里召開「亞洲關係會議」時，尚邀請西藏代表團參加會議。印度獨立後，也立刻發出要求西藏確認雙方關係不變的承諾，並且表明印度政府繼承了從殖民時期的所有權利。隔年也接受了西藏派出的貿易代表團（Dalai Lama 著、丁一夫譯，2010：79-80）。然而，當 1949 年中共建立後，印度不但極快的承認中共，1950 年當中共入藏時印度還與英國共同提案擱置對西藏問題的討論。1954 年中印之間更簽訂「關於中國西藏地方與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中印協定，Panch Sheel Memorandum），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並撤出了在亞東、江孜地區的印度部隊，將印度經營的郵局驛站等折價交給中共，同時也重新確立中

³⁶ 請見附錄三。

³⁷ 請見附錄二與一。

³⁸ 可參閱 DIIR. 1998. *Indian Leaders on Tibet*. Dharamsala, H.P., India: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³⁹關於印度於 2079 號決議的發言，可以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savetibet.org/policy-center/remarks-india-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resolution-2079-xx>。印度當時強調自 1950 年以來西藏議題不斷的被討論，而中國也一再保證會和平改革。然而如今(1965 年)局勢更為混亂，印度決定出面支持西藏。檢閱日期 2010/05/12。

⁴⁰ 可參閱 DIIR. 2005. *International Resolutions and Recognitions on Tibet(1959-2004)*. Dharamsala, H.P., India: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印雙方的邊境貿易市場（孫克信，1997：101-102）。同年尼赫魯訪問北京時，儘管當時人也在北京的達賴喇嘛試圖與他多談論一些，但卻得到冷淡的反應（Dalai Lama 著、唐鼎譯，1997：112）。這時期印度的政策立場連達賴喇嘛也會在其自傳中表示「自從印度獨立之後，西藏與印度在政治上的連繫漸漸消失了」（Dalai Lama 著、丁一夫譯，2010：145），可見當時印度的態度。在這之後，除了 1965 年於聯合國的支持之外，印度政府對於「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政策始終沒有改變過。

不過，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之後，印度政府雖然公開宣示不會承認流亡政府，但是卻不斷地提供實質的援助，包括協助難民營成立與建立屯墾區。在流亡政府的部會中，其「內政部」與「教育部」印度政府更是佔了重要的角色。前者與印度政府共同協助流亡藏人的安置與就業，而後者則與直屬印度政府教育部下的西藏教育委員會（Central Tibetan School Administration, CTSA）配合，該委員會由三名印度官員與三名流亡政府官員組成，負責贊助所有藏人學校教材與資金費用。同時，駐新德里的達賴喇嘛代表處也作為印藏之間的溝通管道，時時協調與保持雙方的聯繫。⁴¹

教育堪稱是印度政府提供西藏最大的協助，因為這直接的幫助藏人得以維護自身的文化宗教認同與身分意識的建立。上述提到的「西藏教育委員會」⁴²不僅負擔管理直屬的藏人學校，也積極補助其他國家或單位成立的藏人學校，例如曾多次協助「西藏兒童村」度過資金缺乏的難關。⁴³同時也協同流亡政府成立「西藏家園基金會」（Tibetan Home Foundation）協助藏人兒童教育、唐卡藝術等職業訓練，甚至還提供留學等，而且尼赫魯的女兒、前印度總理印地拉·甘地（Indira

⁴¹ 達賴喇嘛陛下宣傳部(即 DIIR)，1983，《流亡藏人》(1959-1980)，成都軍區政治部群聯部，頁 4-5、13。本書 DIIR 原本有英文版，在原版佚失、且外流至中共處被翻譯後又傳回 DIIR。本書由 DIIR 處提供。

⁴² 關於它的介紹，可參閱其網址：<http://www.ctsa.nic.in/index.aspx>，檢索日期 2010/05/12。

⁴³ 達賴喇嘛陛下宣傳部，1983，《流亡藏人》(1959-1980)，成都軍區政治部群聯部，頁 54-55。

Gandhi) 夫人就是其創始人之一。⁴⁴而在高等教育方面，爲了培養藏人學者，1966-1967 年印度政府與流亡政府經過一連串研議後也在鹿野苑 (Sarnath) 成立瓦拉納西大學分校，1977 年改爲中央高級西藏研究院，成爲一個從事西藏宗教與文化的學術機構，而且經費仍然主要由印度政府所提供。⁴⁵

另外，印度中央政府與各地邦政府也提供了許多土地建立難民營與西藏村，範圍遍佈全印度。並協助成立了許多手工業工作坊。工作坊的成立往往伴結了傳統文化藝術的傳承與當地經濟活動的促進，同時又會反饋使得這一個連結更爲加強。例如位於達蘭薩拉的「羅布林卡」機構 (Norbulingka)，不但設有教授傳統文化與技藝的學校，其精美的手工產品更吸引了大批旅客，當它設置了旅館後更結合了附近的「上密院」而成爲著名的景點。而這個情形又反饋使機構得以蓬勃發展。

爲了感謝與回饋印度政府的援助，流亡政府每年也都會舉辦「謝謝你印度」(Thank you India) 與「謝謝你喜馬偕爾邦」(Thank you Himachal Pradesh) 等大型活動。依照慣例，中央政府成員雖然不會參加，但國會議員以及邦政府首長參加者卻在所多有。⁴⁶就其舉辦的次數與參加者的層級來看，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流亡政府已與當地社會結合爲一體。

而多年來國際局勢雖然歷經改變，自 1988 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 (Rajiv Gandhi) 訪中以來雙方的關係也逐漸改善，同時印度政府也一再重申它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但是根據藏人自己的描述，儘管每當國際局勢改變藏人總會憂慮印度政府的態度會否隨之變化，但直到今日印度政府事實上不曾限制過達賴喇嘛個人的言論以及出訪行程，印度政府還主動負擔其安全護衛費用與諸多各項支出，雙方也會不定時會面。⁴⁷同時印度政府也完全沒有限制藏人的行動，「藏人除了投

⁴⁴ 達賴喇嘛著、唐鼎譯，1997，《流亡中的自在》，台北：唐山，頁 212。

⁴⁵ 達賴喇嘛陛下宣傳部，1983，《流亡藏人》(1959-1980)，成都軍區政治部群聯部，頁 195-200。

⁴⁶ 請見附錄一。

⁴⁷ 請見附錄二。

票之外幾乎就像個印度人一樣」。它相當一貫的在政治上聲稱「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在社會的層次上則給予完全的自由。⁴⁸這種說法再次證實了印度「保護但不承認」的立場。

本文根據訪談資料以及文獻對印度政府的西藏政策考察，發現自 1959 年前後印度逐步確立了對西藏問題立場的兩個面向。這種政策的形成原因或許與印度政府始終試圖在傳統的印藏友誼以及與主權中國的交往間試圖取得平衡有關，然而這種氛圍在學術界文獻中如何看待，值得進一步探討。另一方面，與西藏相距遙遠，又非如英美等「大國」的澳大利亞，究竟它與西藏如何開啓接觸，而雙方的互動往來情形又是如何，則是本文接續要介紹的。

二、澳洲政府與西藏的來往：在「一中原則」下對西藏人權展開的關懷

相較於早期就介入西藏事務的印度，澳大利亞政府與其民間團體開始與西藏來往的時間比較晚近，並大致符合西藏議題國際化發展的趨勢。從時期來區分的話，雙方交往的起源主要始於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80 年代初步成長，90 年代以後至今則快速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與民間兩者相互影響並且使得西藏議題得到更大的關注，許多藏傳佛教中心也於此期間前往澳大利亞設立，無形中更提高了「西藏」在澳洲的能見度。

最早的民間團體是創於 1968 年的「澳洲西藏友好團體」(Tibet Friendship Group)，⁴⁹從流亡政府提供的資料顯示，70 年代有不少關懷藏人狀況的澳洲醫療

⁴⁸ 請見附錄一。

⁴⁹ 它的創立與印度政府有所淵源。1959 年達賴喇嘛以及大批的藏人流亡印度後，尼赫魯指示當時的外務部長(Indians for External Affairs)Freda Bedi 研議相關處理辦法，她隨後並成立了西藏友好團體(Tibet Friendship Group, TFG)協助處理難民事宜。1968 年她在錫金東北邊境特區卡門司前政治幹事(Political Officer of Kameng Frontier Division)Singh 安排下結識了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澳洲分會會長 Peter 及其太太 Valerie Grogan，後者在其邀請下組織了澳洲西藏友好團體。關於這段過

援助團都是經由它而前往印度。⁵⁰另一方面，澳洲政府也在 1972 年與中共建交時就已經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接受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但它隨即就在這個「框架」下展開它對西藏議題的關心，尤其是西藏境內的人權狀況。

70 年代到 80 年代初之間，澳洲政府官方比較少對該議題發表意見。1982 年達賴喇嘛初次訪問澳大利亞時除了民間團體之外也並未與任何官方人物會晤。⁵¹不過到了 80 年代末期，不論在民間或是政治人物對於這個議題的注意都已經較之前更為廣泛，尤其是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獎與中國同時在天安門廣場和拉薩都發生事件後更是如此。1988 年澳洲成立了其至今最大的民間支持西藏團體「澳洲西藏會議」(Australian Tibet Council, ATC)，象徵了澳洲社會對此議題關注進入一個新進程。⁵²

1992 年當達賴喇嘛再度訪問澳大利亞時，不但該次訪問的陣容盛大，達賴喇嘛也同總理基廷 (Paul Keating) 舉行了正式的會面，並獲得他承諾設立西藏流亡政府在澳洲的代表處，即現今的澳洲西藏資訊辦事處 (Tibet Information Office Australia)。而在國會方面，1993 年也開始設有專門討論西藏議題的研究小組 (Australian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Tibet)，部分國會議員與政黨更聯合組成「對西藏的全政黨議會團體」(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Tibet) 提供政府在西藏議題政策上的建言與協助處理在澳流亡藏人的事宜。⁵³1990 年代以來，澳洲參眾兩院更已經主要針對西藏境內的情勢發展通過十多次的決議，特別是 2008 年爆發了拉薩事件後，參議院在一年內就作出三次相關的決議。⁵⁴1997 年澳洲政府與中共開始舉行每年一次的「雙邊人權對話」(Bilateral Human Rights

程可參閱附錄七-2。協會網址：<http://www.tfg.org.au/>，檢索日期 2010/05/21。

⁵⁰ 達賴喇嘛陛下宣傳部，1983，《流亡藏人》(1959-1980)，成都軍區政治部群聯部，頁 206-208。

⁵¹ 達賴喇嘛歷次訪問澳洲情況，可參閱澳洲達賴喇嘛小組(His holiness of Dalai Lama in Australia) 網站：<http://www.dalailamainaustralia.org/pages/default.aspx?ParentPageID=3&PageID=5>，檢索日期 2010/05/23。

⁵² 該團體不但在設立後長期推動對西藏議題的認識，也不斷邀請流亡人士訪問澳洲。在政治上更頗有影響力。詳情可參閱附錄七-3。團體網址：<http://www.atc.org.au/>，檢索日期 2010/05/23。

⁵³ 1993 年 ATC 直接促使澳洲部分國會議員成立久永性的國會西藏小組。該小組後又成立「對西藏的全政黨」。詳情可見附錄七-1。

⁵⁴ 西藏流亡政府駐澳洲代表處提供，參閱附錄六。

Dialogue)，西藏境內的宗教自由、文化認同、言論自由等諸多人權議題也是雙方必談的項目之一。⁵⁵

另一方面，在澳洲國內藏人社群的成長也與澳洲政府提供的協助有關。1973年開始有藏人或喇嘛因為依親或弘法等原因移居澳洲，但人數相當的少，幾乎不能稱之為社群。1982年達賴喇嘛首次訪澳時，整個澳洲的藏人僅有約20餘人左右。1992年當達賴喇嘛再度而設立了辦事處後，辦事處代表即開始與澳洲政府討論移民事宜。1996年開始，經過辦事處代表 Chhime Rigzin Chhopenakpa 與魯達克 (Phillip Rudduck) 的反覆討論，澳洲政府運用其已經行之有年的特殊人道計劃 (Special Humanitarian Program, SHP) 開放藏人難民移民，而且逐年增加。1997年首批開放了12人，2005年時已經達100人，到了2008年時全年更有300人進入澳洲。根據統計，目前已經至少有1000位藏人移居澳洲，並且在國內各洲中都成立了各自的社群協會。⁵⁶

就此上述所言，澳洲政府似乎在關注西藏議題後與西藏流亡政府相當友好，然而並不能就此就輕易的下結論。事實上，至2010年5月為止達賴喇嘛一共訪問過澳大利亞7次，分別為1982、1992、1996、2002、2007、2008與2009年。儘管每次訪問總引起民間極大的迴響，但在這幾次的訪問中真正與總理舉行正式會面的只有第二次與基廷、第三次與霍華德、第五次與陸克文，其他時候不是沒有與任何政治領袖會面（例如第一次、第四次）就是只與反對黨領袖會面（例如第六次）。會有這樣的情形就必須要考量到自正式建交以來不斷發展且越來越密切的澳中關係。澳中兩國當前的來往非常密切，而且還不斷的在增長這之間密切性，特別在經濟關係上。目前中國已經是澳洲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出口市場，而且幾乎就要趕上後者。同時，從移民數量來看，澳洲華人群體的成長也是所有移民群體中最快的。⁵⁷但從整體狀況言之，澳洲政府除了在與達賴喇嘛會面這一點因局勢會有所變化之外，大體上對西藏議題的關注依然是日益提高的。

⁵⁵ 西藏流亡政府駐澳洲代表處提供，參閱附錄四。

⁵⁶ 西藏流亡政府駐澳洲代表處提供，參閱附錄五。

⁵⁷ 例如，僅2004年華人移民佔了全體總移民的一成以上。可參閱附錄四。

因此，澳洲政府對西藏議題的關注起步雖發展較晚，但積極程度上卻絲毫不落後於其他國家。儘管西藏議題在澳洲的發展與國際脈絡是較為同步的，但如果考量到澳洲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而澳洲就更顯得具有特殊性。在澳中關係發展如此密切的前提下，澳洲民間與政府層次上對西藏議題仍然如此熱烈，這無論如何都是很值得去細究的。

比較印度政府的對藏政策與澳洲政府的對藏政策中關注的焦點與實際作為，兩者同樣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也同樣關心西藏議題的發展。但印度政府主要著重的是印中邊界的動態以及與西藏流亡政府的互動，包括印度境內的藏人的生活狀況，整體言之有相當大的程度帶著以「印度」為中心的思考模式出發。另一方面，澳大利亞政府除了關懷流亡藏人之外，更多的部分是強調西藏境內的藏人宗教、文化、言論自由等人權狀況，而更具有有一種由外部看中國的視野。會出現這兩種不同的差異，其中原因可能就在於對於印度來說西藏在地理上實質的與之接壤，因而西藏議題是一個關乎印度自身的問題；而對澳洲來說在地理位置上它並未與中國或西藏相鄰，就自身國家發展經驗出發它並且是以關懷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境內的少數群體權利的視野來切入這個議題，因而更顯現出一種似乎是由外部看中國的特色。這毋寧是本文的一種設想。然而，如果之後進一步對各自的學界研究視野有更深入的探索，或許將有助於理解這樣的差異。

第五節 小結

本章主要介紹西藏問題的形成原因，並闡述在問題發展的過程中，由於中藏之間爭端的擴大，達賴喇嘛出走流亡印度，並在達蘭薩拉主持流亡政府，以及聯合國與美國等國際社會開始涉入該議題而使得情勢更為複雜。並帶出印度與澳大利亞這兩個本研究主要的探討對象，整理出兩國政府與民間在近數十年來與西藏流亡人士互動的情形，兩國的中國政策，以及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

西藏問題的形成實可從兩種面向來理解，一者是出自於中國與西藏兩種不同而且幾乎對立的歷史觀，一者則是從當代主權國家的地理戰略位置的考量出發。無論站在中國立場的歷史觀或是西藏立場的歷史觀，論者均是從史料回溯，用當代主權國家體系的概念去套用理解過去中藏之間的互動究竟為何，因而從純粹行政治理的角度看，西藏早在多次的王朝冊封中成為了中國的一部分。但若從宗教面向來看，西藏喇嘛與王朝上層統治者之間的互動則又有使西藏的政治地位有了不同的解釋。另一方面，由於西藏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了百年來列強均試圖控制此地，這個情形即便到了印中各自建國後，冷戰結束，基本核心也都沒有改變。儘管當前世界各國政府多承認中共在西藏的主權，但任何發生在該地的軍事行動都特別的受到關注。

西藏問題的複雜還來自於它的高度國際化，達賴喇嘛的高知名度，以及中共人權紀錄普遍被視為不良，幾乎所有國家均有對該議題表達立場與程度不一的和西藏流亡人士互動都是其中的要素。北京與達蘭薩拉雙方各自宣傳，相互詆毀醜化對方，是數十年來多次會談始終沒有具體成果的關鍵。而中國在政經實力方面的崛起，更是影響各國政府與民間團體在思索如何面對中國與提供藏人援助時難以迴避的核心，依據普世人權價值或是其他理由展開的關懷也在原有的國際政經脈絡與各別和中國的關係下因此顯得詭譎。

在第四節中，本研究分別介紹了印度與澳大利亞各別和西藏的來往。在印度方面，從其諸多政策中可見其為西藏流亡政府最大的支持來源，這一點也經由西藏流亡政府官員的口述獲得證實。並且，儘管在邊界問題上印度與中國多次處於緊張的狀態，但無論在政府的公開言論或是國會的表決中，關於西藏問題的討論卻始終顯得低調少見，因而，印度的西藏政策可謂是「保護但不承認」的忠實貫徹，並且帶有濃厚以印度為中心的思維。不過，印度學術界究竟如何認知西藏問題，實還須進一步深入細究，在下一章將為文探討之。

而在澳大利亞方面，其與西藏開始有所接觸則是晚於印度，大面向而言上更可說一開始就處於「中國」框架下，其關懷的焦點也多是西藏境內的人權狀況。

在政府的公開言論與國會的表決中，以及包括為數眾多的民間團體，對於中共在西藏文化傳統與宗教信仰自由的相關議題均顯現出熱烈討論與積極參與的態度，不但在國會中有專門的研究小組，在每年與中共舉行的「雙邊人權對話」中，西藏境內的情勢更是必談的項目。對比於澳中近年來在經濟方面的緊密聯結，澳洲學術界如何探討西藏問題值得關注，本研究將在第四章探討之。



第三章 印度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及其 視野下的中國觀

第一節 前言

「西藏問題」研究發展至今，已不再侷限於原本長期關注西藏文化與政治社會等的學者專論，而已經在國際關係或中國研究的討論中，開始有了一席之地。有學者以為，這其實與「改革開放」後中國在世界的能見度趨大，以致與西藏之間的糾纏難解問題，也就成了重要的研究議程。⁵⁸Sharad K. Soni 與 Reena Marwah 兩位學者觀察到，在印度除了「西藏學」會從事西藏研究，印度的「中國研究」中也會有對此的探討（Soni & Marwah, 2010）。尤其，在印度的「印中關係」的探討文獻中，西藏問題更往往成爲其中必要討論的一環。這個情況形成的原因是，由於過去殖民時期的英印政府與西藏代表之間曾經劃定「麥克馬洪線」，然而中共取代了噶廈政府統治西藏之後，卻完全否認這條界線的合法性，因而產生了中國與獨立後的印度之間的領土爭議。這在 1959 年後越演越烈，甚至引爆了 1962 年雙方的一場邊界戰爭。自此之後，西藏地區的情勢演變就成爲了印度的中國研究中一個必須要特別關注的地方。故爲了介紹印中關係研究的概況，「西藏問題」成爲一個必要回溯的背景。因此，西藏既成爲一個研究對象，有時候也被當作一個被接受的預設背景，因而可以從這些西藏問題的研究文獻字裡行間，推測出所影射的中國究竟有何面貌。

傳統上印度與西藏文明就具有共通性，何況隨著藏人流亡印度的時間越長，更逐漸成爲了印度社會的一份子。許多藏人雖然成長於難民社區，但也有不少人

⁵⁸ Amar Jasbir Singh. 1992. "How the Tibetan Problem Influenc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hina Report*. vol. 28. p. 261-289. 與 K. N. Ramachandran. 1980. "Tibet in Focus." *Strategic Analysis*. vol. IV. no.3. p.101-106. 都有類似觀點。

後來進入了印度的高等學府而結識了學術界的研究人才，甚至自己就成爲了其中的一員，這些因素是否會對印度學界的觀點產生影響值得進一步觀察。而由於如今藏人活動範圍已不限於地理上的西藏地區，因此許多關於「西藏」的文獻探討也同時超越了地理上的界線，這在印度學界也相當明顯。整體看來，印度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內容範圍涉及了國家戰略利益以及對歷史文化的探討，而受到其本身的地理位置、不同時期的官方政策定位以及藏人參與學界組成等等因素的共同影響，印度的西藏問題研究顯現出相當多元與特殊的解釋方式。

本章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整理出印度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概況，並試圖推測出這些文獻背後可能影射的中國觀。從第二節開始，說明過去至於今印度的西藏問題研究概況，並依序介紹除了學者的專書之外，也觸及印度的西藏問題研究至少有哪些重要的發表平台；第三節則是印度學界的西藏問題敘事，從其文獻的論述當中綜合整理出其共通的幾點特色，包括研究主題、研究觀點等；第四節從整理探討不同年代的不同文本當中推測其中國觀；第五節則是本章結語。

第二節 印度西藏問題研究社群內部的組成

一、研究概況介紹

印度在歷史上一直以來都與西藏有聯繫與來往，但早期還算不上有現代學科意義下的研究。開始用現代學科的方式來研究西藏是與印度的西藏學發展密不可分的，而加爾各答是它早期的重鎮，被認爲是現代「西藏學」之父的匈牙利籍學者喬瑪（Alexander Csoma de Koros）也是以此地和大吉嶺作爲基地而開啓這門學科。1893年，加爾各答人達斯（Sarat Chandra Das）出版了《雪域上的印度班智達》（*Indian Pandits in the Land of Snow*）一書，是印度西藏學重要的里程碑。他曾經訪問過西藏多次，並以田野調查的方式在該書中對西藏的地理、歷史、語

言及文化作了詳實的介紹 (Sinha, 1983: 12)。20 世紀初期，加爾各答大學與詩人泰戈爾所創立的國際大學也都先後把西藏學納入學校的課程中。⁵⁹然而，早期的這些研究仍多偏重在文化與宗教方面，而少有從政治的角度來觀察西藏。

直到印度獨立初期，對於這方面的了解仍幾乎要透過來自英國殖民時期的官員的記載，或一些非常零星的遊記，學術界始終少有全面性關於對西藏政治狀況的探討。直到了 60 年代政治與社會局勢較為穩定後，才多有重新回頭對這方面議題的討論，而這也與當時的印中關係發展有關，期間 1962 年雙方還在邊境上爆發了一場戰爭，影響深遠。根據瑞 (G. N. Rao) 的說法，1961 年《關於印度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邊境問題上的報告》(The Report of the official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Boundary Question) 的出版是引發了學界對印中邊界探討熱潮的主要原因，這由此促進了大量對麥克馬洪線的探討與對印度西藏政策的研究 (Rao, 1968: 3)。隨後在 1966 年，普塔 (R.Gupta) 發表《印度—中國—西藏三角關係》(India-China-Tibet Triangle) 這一相當重要的著作，他從歷史的角度試圖論證西藏在政治地位上根本不屬於中國，而且在文化上與印度的關係更勝過與中國的關係。該書並且以西藏為關鍵，進一步探討印中之間為何會發生戰爭。⁶⁰1967 年則有貝特 (S.Bhat) 《印度與中國》(India and China) 一書，他將焦點擺在中共出兵西藏後的印中關係發展，並與當時的國際局勢演變聯繫起來。他最為獨到的見解是，他認為印中關係發展其實與中國—蘇聯的關係好壞是相關的，一旦中蘇關係變差，往往印中關係也會不好，這時候西藏問題與其衍生的印中領土爭議就可以成為引起雙方爭執的條件。⁶¹到了 1974 年時，普塔 (K.Gupta) 的《印中邊界秘史》(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ino-Indian frontier) 主要探究的則是，印度政府度對引發印中戰爭的「麥克馬洪線」所持的立場是否穩固，並思索印度政府的中國政策發展，同時

⁵⁹ 國際大學並在課程設計中把西藏學當作一門與印度學比較的學科。參閱 V. V. Gokhale. 1972. "Tibetan Studies in India(a brief survey)." *Report of 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no.18.p.8.

⁶⁰ Ram Gupta. 1966. *India-China-Tibet Triangle*. Bombay: Jaico Publishing House.

⁶¹ Sudhakar Bhat. 1967. *India and China*" New Delhi: Popular Book Service.

回顧殖民時期到獨立後中、英、印、藏等多方互動的過程。儘管對麥克馬洪線的合法性存疑，但他主張印中雙方都應該爲了和平相處的目標而互相友好，並在爭議問題上避免衝突的發生。於此，西藏問題作爲可能影響印中關係的要素就應該要特別被予以關注。⁶²這些學者的研究不同程度的涉及了對西藏地位的探討，也從不同角度闡述中國與印度政府的作爲將對雙方產生何種影響。由此已經得知，印度學界探討西藏問題時往往把它與印中關係聯結起來理解，並且背後還各自存在著不同種看待中國的視野。此外，由於達賴喇嘛以及大量的藏人流亡印度造就的效應，也無形中影響使印度西藏研究更呈現豐富與跨領域的特質。

二、研究平台介紹

而除了學者的專書討論之外，印度的西藏問題研究也大量的出現在關於中國研究或是南亞研究的論壇與期刊中，包括《中國述評》(China Report)、印度國防部智庫「防衛研究與分析機構」(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is, IDSA) 附屬刊物《戰略分析》(Strategic Analysis)，近年來也出現在「南亞分析群體」(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SAAG) 與「清奈中國研究中心」(The 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CCCS) 等論壇收錄的文章中。此外也有以「西藏」爲題的幾個期刊，包括西藏流亡政府下的部門推動設立與出版的《西藏期刊》(The Tibet Journal) 以及由藏人獨立編撰的《西藏再覽》(Tibetan Review) 等，都有公開的對外徵稿，許多印度學者也會於此發表成果，或彼此之間或與藏人學者對話。這些期刊或是論壇共同構成了印度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發表的主要平台，在數量、研究主題與研究取向，甚至是解釋觀點上，也都有各自的特色。以下進一步對上述幾個平台作出簡單的介紹。

⁶² Kuranakar Gupta, 王宏緯、王至亭譯，1990(1974)，《中印邊界秘史》(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ino-Indian Frontier)，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

(一) 以國際關係或中國研究為核心的平台

《中國述評》(China Report):《中國述評》於 1964 年創刊,目前由印度德里大學的中國研究所(ICS)出版,期刊的編輯人員多來自中國研究所以及尼赫魯大學,在印度國內的中國研究甚至是國際的中國研究中享有極高的聲譽。該期刊收錄學術論文、時事評論、文章回應、書評以及文獻資料和大事表等。它以中國為主要核心研究地區,並涉及它周遭的東亞國家,而且特別偏重這些國家的文化、發展狀況以及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研究取向上更跨越經濟學、政治學、國際關係、法律、社會學、歷史學,是一個相當全方位的中國研究刊物。⁶³

西藏地區的情勢以及研究始終是期刊中一個不斷受到探討的主題,並廣泛的出現在學術論文以及時事評論中,更幾乎是每期的「印度與中國關係」

(India-China Relation) 或「中國與南亞」(China and South Asia) 報導中的一部分。在議題範圍上除了關注西藏地區的情勢演變之外(例如 1965 年分析西藏自治區的成立或是 1966 年該地區的文化大革命情形),也時常出現在印中關係的討論中,不論是作為影響的要素或是當作陳述的背景皆有。近年來更已經出現對後達賴喇嘛時代的思索。⁶⁴

《戰略分析》(Strategic Analysis):《策略分析》是一個由 IDSA 所出版的雙月刊,該中心主要負責關於印度國家與國際間安全與防衛相關的議題研究。因此該期刊主要收錄關於區域與國際安全相關議題獨立研究、分析與評論,包括對西藏問題的探討。⁶⁵從其研究項目來看,中國是亞洲研究中一個重要部分,而西藏問題也

⁶³ 關於更詳細情形可參閱中國研究所網址：<http://www.icsin.org/about.html>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網印度當代中國研究的介紹，網址：

http://www.hprc.org.cn/gsyj/gwddzgyjjg/yindu/200909/t20090911_30778.html，檢索日期 2010/06/11。

⁶⁴ 可參閱 Virendra S. Verma. 2009. "Post-Dalai Lama Situation and the Middle Path: Discussions with Chinese Scholars in Beijing." *China Report*. vol.45(1): 75-87.

⁶⁵ 對該期刊的詳細情形，可於 IDSA 網站上查閱。網址：<http://www.idsa.in/strategicanalysis>。檢索日期 2010/05/28。

被放在中國事務的脈絡下，並多集中在幾位固定的學者發表。其關懷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西藏地區的情勢穩定狀況，以及這些議題如何攸關印度的邊境安全。

清奈中國研究中心 (The 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CCCS)：清奈中國研究中心主要作為一個關於公眾政策的思想論壇，不定期發表文章，而且團隊的組成深具學者以及印度官方色彩。論壇創立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在中國崛起的局勢下，提供一個平台供印度的國內外中國研究學者之間作學術性對話，交流討論印中關係的發展，並作出對印度而言在雙邊、區域甚至是全球層次可行的基礎政策研究。其關懷的焦點主要與印度如何思索面對中國的需求有關，包括「印中邊界問題」、「中國—巴基斯坦關係」、「印中雙邊貿易關係」、「中國的政治發展及其對印度以及世界的影響」、「中國—印度—東協關係」、「南亞印度對中國崛起的反應與調查」以及「中國—印度—南亞的文化聯繫」等。「西藏」被獨立出來與「新疆」、「台灣」同被歸類在「少數群體」(的地區)(minority area)項目下討論。⁶⁶

其論壇從 2006 年開始收錄文章，但自 2009 年才開始有關於西藏問題的討論，不過發表頻率很頻繁，而且集中在由幾位學者固定發表。並與「南亞分析群體」(South Asia Analysis)⁶⁷中文章偶有重疊。

(二) 以西藏研究為核心的平台

《西藏期刊》(The Tibet Journal)：《西藏期刊》創立於 1975 年，是屬於位於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底下的「西藏工作與文件圖書館」(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LTWA) 出版，原則上一年發行四次，其探討的主題只要與西藏文化或文明的討論相關即可，並可用英文或是藏文發表。期刊對外公開徵稿，並不

⁶⁶關於詳細的訊息可見其網站，網址：<http://www.c3sindia.org/team>，檢索日期 2010/05/22。

⁶⁷南亞分析群體主要是一個關於策略分析以及促進對於印度與國際安全事務研究的思想論壇，探討的對象涵蓋全球，並且收錄的文章特別集中於政治以及戰略分析的主題。更詳細的訊息可見網站：<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The%20Web%20Site.htm>，檢索日期 2010/05/28。

限制投稿人身分，而可見印度學者於此發表成果。

從已出版的期刊來看，文章探討內容以佛教研究為大宗，其次就是關於西藏問題的討論，從創刊號開始就有討論西藏與中國關係的文章。⁶⁸也有針對時事變化的報導。⁶⁹隨著藏人流亡時間日久，80年代後的文章開始出現對流亡印度的藏人難民的探討。⁷⁰這幾年更開始出現呼籲對西藏未來路線的重新思索。⁷¹

《西藏再覽》(Tibetan Review)：《西藏再覽》是一個1967年於印度新德里由藏人獨立創立的月刊，並由「西藏之聲」(voice of Tibet)發行，後由於財務方面的縮緊一度於1971年由流亡政府接管，但為了保持其獨立性質又在1999年恢復獨立運作。其探討的「西藏」包含了地理上的西藏地區以及流亡藏人，內容多偏向新聞與評論性質。⁷²

除此之外，印度還有為數眾多的大眾媒體也相當關注西藏的情勢，例如《印度教徒報》(The Hindu)就時常刊登關於西藏問題發展與印度的中國政策等評論，其現任主編拉姆(N.Ram)也常撰文發表看法。其他還有廣大的研究人員或獨立或透過「印藏友好協會」等組織舉辦的活動發表關於西藏問題的研究。另外，「西藏政策研究中心」(Tibet parliament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re, TPPRC)也是一個重要的發表平台。⁷³

經由上述的檢視，我們發現印度學界對西藏問題的討論的篇幅不但豐富，而

⁶⁸ 可參閱 Zahiruddin Ahmad. 1975.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China in Tibet". *The Tibet Journal*. vol.1(1):24-35.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⁶⁹ 例如1979年達賴喇嘛訪問美國後，1980年立刻出現幾乎整本對達賴喇嘛與美國關係的討論。*The Tibet Journal*. vol.5(1&2).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⁷⁰ 例如 Dorsh Marie deVoe. 1981. "The refugee problem and Tibetan refugees." *The Tibet Journal*. vol.6(3):22-42.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近期也有 Dawa Norbu. 2001. "Refugees from Tibet: Structural causes of successful settlements." *The Tibet Journal*. vol.26(2):3-25.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⁷¹ Jane Ardley. 2003. "Satyagraha in Tibet: Toward a Gandhian Solution?." *The Tibet Journal*. vol.28(4):23-38,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⁷² 進一步詳情可查閱其網站：<http://www.tibetanreview.net/index.php?id=68&type=p>，檢索日期 2010/05/27。

⁷³ TPPRC 由德國跨國 NGO The Friedrich-Naumann-Stiftung 基金會設立，目的在於協助流亡藏人具備民主思想與三權分立的概念，以及保存藏人文化。常與其他民間單位合作及出版西藏問題研究相關著作。可參閱網址：<http://www.tpprc.org/>，檢索日期 2010/06/12。

且也極為複雜與多元，在文獻中把它視作單獨課題加以介紹者更在所多有，這似乎顯示了印度學界中有著長期關注該議題的風氣與大量的研究人員，並呈現出難以簡單的辨識哪些學者可被稱為「西藏學專家」的狀況，這相對於印度政府長期以來在政治上的相對謹慎談及此問題則又是一個有趣的對比。然而，學界之中對於這個議題的探討究竟如何進行，其特色又是如何，有必要進一步的分析才能了解。以下主要就上述平台中所收錄的文章，以及歷年來印度學界中關於西藏問題研究的專書加以整理。

第三節 印度學界的西藏問題敘事

一、議題研究領域與方法論多元化

印度的西藏問題研究呈現多元面貌，並且還延伸出許多次議題，主要的原因已如前述，不只本來長期關注西藏文化與政治社會方面的學者會去關注這個問題，在國際關係領域或是中國研究等方面對此也都有所研究。更甚者，由於有為數不少的流亡藏人已定居在印度社會，其觀點或有影響各界人士對此議題的看法。另外，許多對印度內部社會感到興趣的研究者也開始出現以流亡藏人社區發展⁷⁴或是流亡藏人的社會狀況⁷⁵為研究題材的著作，當這些研究在歷史背景上須要先交待研究對象群體為何會出現在印度時，則又必然會牽涉到西藏問題的緣由。整體言之，如果試圖以學科類別或是方法論途徑來討論印度西藏問題研究的話，面對這些數量龐大而又各具特色的文獻就會顯得難以歸納出一個單一的結論，因為這個議題本身就是一個正不斷變動的活議題，而且也已經成爲一個跨領域的議題。

⁷⁴ 例如 Rajesh S.Kharat.2003.*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New Delhi：Kaveri.

⁷⁵ 例如 Monu Rani Gupta.2005. *Social Mobility and Change among Tibetan Refugees*.Raj Publications, India: New Delhi.

二、西藏問題論述特色

然而，我們在閱讀眾多的文獻中似乎仍然可以發現印度的西藏問題敘事具有共通的幾點特色，並且也發現，這些文獻讀來具有相當濃厚的以印度為中心的思維。整體言之，它的敘事開展是以印度為起點，不斷地思索印度與西藏在歷史與文明上的關係，以及印度在當代的政治問題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它著重探討問題論述背後的意義或概念，而相對上來說較不闡述對實際細節的討論。以下分別敘述共通的特色

(一) 西藏問題必然牽涉印中關係發展

從文獻的篇章敘述結構來看，無論是專書或是期刊文章都共有一個現象，就是西藏問題幾乎都當成印中關係歷史的回顧或是相關討論的脈絡下的一環，這一點對比印度以外的討論印中關係發展的文獻並不以西藏為核心，是非常突出的一個特色。當印度學界在討論該議題時必定與作者對印中關係的發展看法產生聯結，然而相形之下，印度以外的文獻卻不必然有此現象。他們往往將「西藏問題」與「印中爭議」區別開來視作不同的議題，當探討西藏問題時，其中的核心角色多在中藏之間而不涉及印度，而在討論印中爭議時焦點則放在印中之間，而不一定看的到西藏的角色出現。筆者在訪問印度的期間曾經就此現象請教過當地的學者，當時得到的回應是，「從印度的角度來看，西藏問題絕對是印中關係中必要討論的一環。因為印度與中國之所以成為鄰國，就在於 1950 年中共出兵西藏並將其納入統治，也因此印中才會產生後續的領土爭議，更才會有 1962 年邊界戰爭的發生」。這個說法與 Sharad K. Soni 與 Reena Marwah 的觀點類似，他們認為，1950 年代後「由於西藏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由印度的遠鄰一變而成為近

鄰，因而對於印度來說研究中國有其必要性，而西藏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研究課題」（Soni & Marwah 著、吳宗翰譯，2010：75）。可以想見，正是由於「阿克賽欽」與「阿爾納洽魯邦」（或稱作藏南地區）的領土爭議未解，西藏問題仍在持續發展，大量的流亡藏人與西藏流亡政府的中央「達蘭薩拉」等俱在印度，因而，西藏當然會是影響印中關係發展的一環，從而必然是在印中關係發展脈絡當中的一部分。

這樣的敘述安排方式事實上非常切合印度所身處的位置對自身所作的省察，而且正如我們在第二節的發現，從很早期以印度觀點出發探討印中關係的文獻中就有這樣的特色。例如，1956年 Margaret W. Fisher 與 Joan V. Bondurant 著的《印度觀點的印中關係》（*Indian Views of Sino-Indian relations*）一書中就已經看到這樣的安排。該書在第一章從 1954 年的印中簽訂《和平五原則》切入，而附錄文件也多與西藏問題有關。60、70 年代大量以「印中關係」、「邊界爭議」為研究的文獻也都有類似的篇章安排。即便到了 2004 年尼赫魯大學教授 B. R. Deepak 的《印度與中國 1904-2004》（*India-China 1904-2004*），2007 年 Parshotam Mehra 的《邊界歷史選集》（*Essays in Frontier History*），2009 年 Bhawna Pokharna 的《印中關係》（*India-China Relations*）等著作，更不用說眾多以「中國—印度—西藏」三角關係之類的討論著作，每當談論到印中關係發展的歷史或是兩國之間的邊界爭議問題，則西藏問題就必然在這個脈絡底下被重新回顧一次。

（二）西藏多被視為有別於「中國」而介於印中之間的緩衝主體

上述提到印度的西藏問題研究文獻多是放在印中關係發展的脈絡下被觀察，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文獻主要是針對西藏的歷史狀態作出研究來探討西藏問題者，但無論如何，它們共通的一個主流論述就是會從語言、文字、宗教、文明或是發展歷史等等方面，論述西藏具有一個有別於「中國」的主體。然而，到底該如何定義這個主體，則文獻之間莫衷一是。有的文獻非常強調它是一個「獨立的

主權國家」(independent and sovereign country/nation) (Bhattacharya, 1983 : 721-725), 但大部分的文獻多以印中之間的「緩衝區」(buffer zone/region)、「緩衝國」(buffer state)、中國的「自治區」(autonomous) 等稱呼來談論西藏的定位, 有些文獻則稱呼它為「國家」, 但不特別強調「獨立、主權」等字眼。不過, 大部分的文獻都很清楚的將西藏與中國、蒙古、滿州等區別開來, 並往往依照不同的歷史時期闡述彼此的互動。這樣的區別概念(特別在描述它的地理位置時)可能有來自於英印殖民時期的影響, 蓋當時英人思索保障印度安全時即以阿富汗作為西方屏障, 以新疆、西藏等地作為北方與東北方屏障的設計 (Mehra, 2007 : 88-90), 從而賦與了西藏某種特殊的戰略意涵。另一方面也可能來自印度傳統上與西藏來往而產生的認知與概念, 其間透露出, 印度與中國的歷史交往並不同於印度與西藏, 儘管印度與兩者之間的關係都很緊密, 但對印度而言這兩個對象幾乎是兩種不同的文化、宗教與政治體 (Mehrotra, 1997 : 5)。

而且如從「歷史關係」談起, 角度上多類似本書第二章提到的「西藏觀點」下的中藏關係, 並且會透過闡述西藏在歷史上如何與周邊國家互動, 尤其是締約 (treaty-making capability) 等外交活動, 進而賦與西藏得以從事與他國來往的主體性。例如, 有文獻討論到, 西藏在 7 世紀時松贊干布王在位時乃是中亞地區的大國, 曾與當時的鄰國包括中國唐朝等有多次的輝煌戰事與其他方面的往來, 並且先後迎娶文成公主與尼泊爾的公主; 文獻也強調西藏曾經在與中國唐朝的戰事中攻陷長安, 於唐穆宗時期雙方訂立「甥舅碑」而劃定中國與西藏的邊界等。當提到近代的歷史時, 文獻提到了 1856 年西藏與尼泊爾曾經締約; 1904 年榮赫鵬 (Younghusband) 上校攻打拉薩後英印政府與西藏代表曾訂立「英藏條約」。文獻中最常提起的, 是 1914 年的西姆拉會議與 1947 年的亞洲關係會議了, 文獻多闡述西藏在西姆拉會議時乃是與參加會議的與中、英兩國代表平起平坐的一員, 並且是獨立與英印政府劃定「麥克馬洪線」; 自 1911 年國民革命後到 1950 年代間它完全是處於在一個不受中國管轄的「事實上」(de facto) 的獨立狀態下, 1947 年在印度獨立前夕它並受邀參加亞洲關係會議與印度等各國代表與會。上述這些

「西藏歷史」幾乎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接受並於文獻中不斷出現。

基於對西藏的涵義儘管定義不明確但卻具備主體能動性的認知，每當談及1950年中國出兵西藏時，文獻中的觀點也多是以「被併入」或「被吸收」進一個更大的主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概念，來詮釋這段歷史，甚至對其遭遇表達出深刻的同情。

（三）西藏與印度文明有很深的聯繫

印度的西藏問題文獻還有一個明顯的特色就是，文獻中多極力強調西藏與印度有很深的精神與文明聯繫，這表現在印度文明對西藏文明的影響上，而且多半字裡行間流露出對能貢獻於西藏文明感到自豪。它們多半會提及的包括，西藏的文字乃是在印度梵文（Devanagari）的基礎上創造的；而藏語與梵語（Sanskrit）之間也有相當緊密的關係；西藏文明最重要的內涵就是其西藏佛教義理，而西藏佛教屬於大乘佛教，佛教的源頭則來自於印度；修道院與佛法經典的傳承制度同樣也是發展自印度；更不用說歷史上印度有多少班智達入藏弘法促進了雙方在文明與宗教上的交流，以及藏人喇嘛前往印度學習者也所在多有。整體言之，文獻中多論述雙方之間的聯繫是充滿著「精神」方面的特質（Mehrotra, 1997: 1-4），如果用達賴喇嘛的話語來比喻，文獻中的論述就是將西藏視為是「印度的文明之子」（a child of the Indian civilization）。

雖然也有少部分文獻觸及中國文明對西藏文明的意義，認為印中文明都西藏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Sen, 1969: 23-24）。不過西藏地處於印中兩大文明之間的交匯之處，文獻中多半還是傾向認為西藏的精神主要受印度文明影響，至於中國文明的影響，則多半在制度與物質方面的層次。

這種強調西藏的精神文明受印度影響的論述，甚至擴大到詮釋達賴喇嘛思索西藏問題的解決方式上。有部分文獻對於注意到達賴喇嘛流亡期間似乎對於西藏問題的解決有非常深刻的轉變，從早期的堅決獨立到中後期之後與中共尋求妥

協，追求藏人的自治，這無疑與其對佛法的體悟有關（Puri，2008：175-184）。也有文獻認為，達賴喇嘛長期提倡的佛教核心價值與「非暴力」、「中道路線」，這樣的思維與面對爭議的態度，追溯到底層仍然是反映出印度文明的理想；達賴喇嘛的「非暴力」很明顯是來自於聖雄甘地的理念（Bhattacharjea，1996：361）。

但儘管如此推崇雙方在文明上的連繫，一旦從政治定位來論述何謂西藏時，印度的西藏問題研究文獻多半無異議地遵循印度政府自 1954 年印中「和平五原則」（PanchaSheel）以來的立場，幾乎沒有文獻會主張印度政府對西藏的歸屬問題採取不表態，亦即新德里毋須迴避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從文獻對「現狀」的描述上來看，文獻多認為西藏目前在事實上是屬於主權中國的一部分，儘管在理解這個「成為中國一部分」的過程時，如前所說，印度各界多半不認為是出於西藏自身的選擇。

印中關係的文獻往往還會對 1950-60 年代初期印度尼赫魯政府的中國政策簡單回顧。其出發點在於，面對這樣一個與印度在文明上這麼有千絲萬縷聯繫的「主體」，為何尼赫魯會坐視它「被併入」另一個主體之中？有人以為這是因為尼赫魯個人的親中立場，也有人詮釋這是因為尼赫魯眼見當時韓戰未歇，如印度出兵干涉，恐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尼赫魯是基於和平主義的立場而不得已犧牲了西藏（Gupta 著、王宏緯等譯，1990：48）。而在這部分的探討中，最容易流露出作者認知的中國是具有領土野心的。

（四）對問題解決方式有分歧；均希望喜馬拉雅山區能免於人為干擾

正是因為認知到現狀下西藏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因而才會進一步去討論未來西藏的歸屬是否應該改變。對於西藏問題未來的解決方式，文獻再一次的顯現出莫衷一是的現象，左派者、右派者、傾中者、反華者…等，不同的立場有不同的看法。不過整體言之，文獻多從印度的角度出發，其關切的重點在於如果西藏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那麼對印度的與印藏關係的影響為何？如果西藏維持在中

國的框架下，那麼局勢又應當如何發展才符合印度的期待？

有部分的文獻認為，西藏與印度有長達兩千英哩的接壤，因而西藏的情勢攸關整個印度國家的安全。從過去歷史的紀錄來看，印藏雙方能夠維持和平相處，然而當印度政府默許了中國出兵西藏並將其納入統治後，如果西藏仍能保持自治的地位則或許與原來的狀況無異，但一個明顯的情況是，在中藏簽署《17 點和平協議》後解放軍立即入藏並駐守西藏邊境，這對印度來說構成了很大的壓力，故必須仿效而採取措施，但其實印度自己並不願意。比較早期的文獻，尤其是在 1962 年的印中戰爭後，中國的威脅成爲實質的經驗，重新檢討印度的中國政策與西藏政策的呼籲甚囂塵上，因而時常明顯的透露出對這種兩軍對峙的情況的焦慮態度 (Sen, 1969 : 29)。從這種觀點出發時，多半主張印度應該協助西藏獨立，因爲從與其雙方過去的相處經驗顯示，西藏並不會對印度的安全產生巨大的威脅，或至少西藏對待印度的態度是比較友善與中立的，所以呼籲印度應該改變其現階段的政策 (Bhutani, 1985 : 430)。但也有不少文獻主張，西藏的獨立與否其實並不是印度應當優先考慮的環節，因爲印度真正在乎的是印度的安全問題，而西藏正是一個在歷史上與印度互動最佳的友鄰。從這種著眼點出發的多半希望，在印度的旁邊能有一個作爲與中國緩衝的西藏，他們多半接受達賴喇嘛對於西藏構想的建議，例如接受他於 1985 年提出將西藏作爲印中之間的緩衝區構想，只要西藏成爲一個非軍事化的區域，這對印度來說就可以減去極大的負擔，而且印度也認爲中國應當有類似的想法 (Bhutani, 1987 : 316)。

由於西藏情勢攸關印度的國家安全，但是整個情勢的發展對於藏、印、中之間都是太過敏感的議題。Deepak 認爲，西藏因素是導致中國不信任印度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每次雙方高層拜訪時印度都須要針對西藏歸屬不斷的聲明。而且一旦這個議題處理不當往往也影響印中關係的未來發展 (Deepak, 2004 : 447-448)。事實上，從印度觀察「漢藏對話」的情況來看，其實印度傾向扮演的，是一個願意協助，但並不願意太過涉入的輔助性角色，但求未來問題的解決能夠透過和平方式便善莫大焉 (Verma, 2009 : 75-87)。對印度來說，最需要關心的其實就是

西藏地區的「非核化」、「非軍事化」，以及「喜馬拉雅山的環保問題」，這些都是印度在思索西藏問題解決時的考量（Mehrotra，1997：38-44）。

而除了由於關注國家安全而希望減少西藏地區開發與減少駐軍之外，另一方面也有文獻從印度文明，特別是印度教思想的層面來看待西藏對印度的意義。Uma Kant Mahapatra 認為，從印度教的角度來說，喜馬拉雅山地區是他們的聖地，因而維護該地區的平靜與純潔是極為重要的（Mahapatra，1988：123）。Dawa Norbu 也提到，對於印度教而言，喜馬拉雅山地區構成了印度教思想當中極為重要的基礎，他們將之視為文明的重要中心，如此同樣居住於喜馬拉雅山地區的西藏文明也被視為是屬於廣義印度文明的一部份（Norbu，1997：1088-1089）。因而多主張該地區能夠維持著免於開發的狀態。

第四節 印度西藏問題研究視野下的中國認識

2000年1月4日17世大寶法王噶瑪巴（karmapa）由西藏楚布寺連夜穿越尼泊爾邊境到達印度達蘭薩拉，不但轟動了世界，也再度引起印中兩國情勢緊張（更再次證明西藏問題與印中關係的糾結），各種流言揣測紛紛而來：有人以為這證明中共治藏政策失敗；也有人以為，從小由中共栽培的「中國籍」噶瑪巴未來承繼其前世在錫金地區巨大的宗教影響力後將可能導致中國勢力進入印度邊境，暗示他的「流亡」可能並不單純…。Amitabh Mattoo 從社會大眾對此事的態度發覺，面對同時具備文明與民族國家兩種特質的中國，印度根本還不存在一個完整的圖像，而至少存在著盟友（ancient friend and modern ally）、典範（role model）、敵人（unpredictable adversary and dangerous rivals）與難以捉摸的（inscrutable and mysterious）等四種看法（Mattoo，2000：13-25）。在他的概念下，中國被視為「盟友」的典型即是1950年代初「Hindi-Chini Bhai-Bhai！」（中

國與印度是兄弟)的友好情況；而把中國視為「典範」則可以說是一種印度想像的投射，例如被當作「社會主義」楷模、或是「不向西方屈服」的鬥士，或是「改革開放」的代言人等，是把中國當成一個「未來式」印度的理想；「敵人」則指「中國威脅論」，尤其是強調自 1962 年戰爭以來的氛圍，中國是一個印度難以衡量的對手；「難以捉摸」則比較中性，亦即可能對中國充滿了憧憬，但也可能意味著懼怕。本文類似 Amitabh Mattoo 的發現，當在分析印度的西藏問題研究文獻時，也同樣看到了文獻當中有不同的中國形象。

面對中國在西藏的所為，各方作者在論述過程中分別流露出對中國敵視，不解，或是認為還需要態度謹慎觀察等不一的態度，而且有時候這些情緒還是混合的。亦即，某位作者有時候既對中國的「成長」充滿了認同，然而一旦談論到西藏情勢的變化，同一位作者則可能又流露出猶疑不定而謹慎的看法。進一步的歸納作者在論述時表達的對中國的態度，往往還會看到作者其實更嘗試著從印度的立場去詮釋中國的行動，經由印度的立場，試圖回答「中國本質」或是找出「印中關係本質」，這不但又映證了前述印度的西藏問題研究多與印中關係的討論不可分，也顯示了印度有相當程度是基於切身的需要而探討此問題。從印度的西藏問題研究文獻閱讀過程當中，進一步就其所透露的，發現而歸納出這些文獻當中反映的中國觀，並進一步整理成「體系視野」、「文明視野」與「行動視野」。這些視野不必然有時期上的比重差異，但都反映出從印度的角度試圖理解中國的特色，分別就其思路脈絡敘述如下。

一、體系視野：國際政治結構下的中國

部分文獻在回答中國出兵西藏的行動與在西藏推動的政策時，試圖以超越個別國家情境的方式思索之。既然中國已經擁有西藏，也得到印度的承認，為何印中之間還會有爭端產生？研究者以為，可見原因或許並不出在西藏問題本身，而

來自於一個看不見的結構與主權國家之間競爭的邏輯，此種對中國的認識可稱之為「體系視野」。

如此，「西藏問題」失去其自身的邏輯，轉而成為整個區域安全與全球戰略的一環，問題的發展反映一個更大的體系結構，而中國乃是其中一名同樣受到體系所制約的參與者。這些文獻提出的結構觀點，可溯及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英帝國、沙俄與滿清帝國之間的「大戰略」，與冷戰時期兩極支配格局時蘇聯、印度、中國三方在中亞與喜馬拉雅山區的角度，乃至於後冷戰時期多極世界下的印中兩國崛起，在各自邊境地帶駐軍與部屬核武飛彈等，這些都是發生於不同時期但本質上並無不同的戰略布局戲碼。

在體系視野下看中國，就不能單純從歷史或是意識形態上的理由來解讀它出兵西藏的行動，而更要從追求中國大後方的安全保證理解之。所以當中國方面大肆慶祝「西藏自治區」的成立時，不但不意味著「自治」的來臨，反而更加表現出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⁷⁶中國在西藏高原上的投入大量人力與金錢築路建造便利的交通，其目的無非是使中國政府能快速來往於西藏與中國各地，並進而環視整個亞洲大陸（Norbu，1988：377-378）。在體系的驅策下，中國將過去「大戰略」概念下的緩衝區，推進到尼泊爾、不丹地帶，以經濟援助和協助彼等維持國內政治穩定等方式，爭取這些國家的支持，並遊說使彼等對印度的角色產生疑慮，從而形成了印中之間的新緩衝區（Norbu，2000：275-297）。

準此，中國的屬性是一種「把印度視為某種競爭者」的體系立場，故而當然要對印度的政策與考量都充滿了心機計算。由於中國是一個在國際關係結構中力爭上游而圖有一席之地者，在面對同樣具備強大潛力的印度，如果不能順利拉攏之則自須要壓制。換言之，在體系視野下的文獻主張，「中國認為印度面對中國時除了敵友之外不能有其他的立場空間。」在冷戰格局時，中國雖然名義上仍屬於社會主義陣營，但與美、蘇兩強之間的關係卻不能簡單一刀切開。一旦中國認

⁷⁶ 1966. "Tibet: Autonomy or Integration? : The 'Tibetan Revolution' is at an uncertain stage. Peking has tightened its control but its position is not invulnerable in Tibet". *China Report*, vol.2(2). p.28-32.

爲自己與美、蘇之間關係不如印度與美、蘇之間的關係親近時，印度可能隨時都會遭到中國以各種藉口責難，如印度在「西藏問題」、「達賴喇嘛」、「反華行動」與「邊界爭議」等扮演某種角色故意與中國爲難，印度其實是一個受害者（Jain，1970：12-15）。擁有居於亞洲大陸最高點西藏的中國，乃配合與巴基斯坦的結盟，甚或拉攏印度周邊國家如緬甸、尼泊爾、孟加拉等，而確保了在戰略位置上居於絕對的優勢先機。此何以即使蘇聯崩解的後冷戰時代來臨，中國依然因爲握有西藏而持續的在南亞與中亞地區得以牽制印度的行動。

二、文明視野：文明政治下的中國

除了從國際關係體系的結構看到中國之外，另有採取從文明政治的角度，從觀察與思索「中國本質」爲何，並進而來理解西藏問題與印中爭端者。在「文明視野」的中國認識下回答西藏問題與印中爭端時，多試圖從問題的遠因談起。

對於印度知識界來說，印度是悠久的文明，凡事未必需要爭於一時。在 1914 年西姆拉會議時，西藏代表作爲有能力簽訂條約的一員並沒有任何的疑問，而且儘管中國代表並不承認，但英印政府與西藏政府兩者訂立的條約當然有效。儘管後來中藏之間的發展令人震撼，但在尼赫魯政府的中國政策的主導下，印度也承認了西藏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然而，中國政府不但沒有體會到印度如何刻意迴避自己對西藏定位的長久認知，默認了中國對西藏的作爲，中國也忽略了印度如何站在文明合作的歷史角度，擺脫冷戰政治的考量，成爲世界上最率先承認中共的國家，並在聯合國如何爲中共發聲等，竟然在 1959 年後開始對印度提出一個對它來說早已經沒有爭議的問題，甚至因此發生了一場戰爭，這實在是讓它感到不解。

文明視野下的中國只是一個名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但其作爲迄未歸類到印度所認知的社會主義陣營。相關文獻在探討西藏問題時同時呼籲重新省思「中國

本質」的研究，反對將中國簡化為社會主義國家，因為中國領導人繼續執行帶有相當濃厚傳統色彩的外交政策。他們在回顧西藏問題的發展時，試圖從中國的角度來理解，從而發現原來中國方面與印度方面的認知居然不同，他們根本不認為西藏與中國在歷史上的關係是一種供施關係，而始終認為兩者處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概念下。當中國在清末因為須要而轉換國家體系時，僅僅是在制度上轉換成現代民族國家體系（Uberoi，1972：58），其實中心思維並未轉變。反映到國際關係上，中國對待南亞鄰國也依然抱持「帝國情懷」，因而印度對中國的友好並不被視為是出自夥伴關係，反倒當成是印度傾慕中國的表現。⁷⁷

Krishna Prakash Gupta 也對中國在外交行為上充滿了傳統的天下觀色彩作過一系列探討。他認為印度出於與中國都是反西方、反帝國的情緒，以及印中之間以佛教作為文明聯繫的背景，因而自尼赫魯以降到印中戰爭前的中國政策都太過於強調印中之間的共通性，而忽略了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也對其世界觀與內涵有很大的影響。因而，西藏問題的發生其實是提供了一個印度學界重新反思的契機（Gupta，1972：48）。實際上，印中之間的認知頗有差異，因為印度方面自始認為自己沒有干涉西藏事務，然而從中國方面看來卻不是如此（Gupta，1971：24）。Dawa Norbu 也在其鉅作《中國的西藏政策》（China's Tibet Policy）中分析了中國如何以儒家天下觀作為行事準則，故當中共出兵西藏時，完全不存在所謂侵略與否的問題，而只存在如何更有效地恢復其原有主權的考量。這雖然從印度或西藏眼中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但中國方面的認知上確實是如此。

經由如此對中國認識的理解，印度學界才了解到，原來印中一開始之間就處於認知不對稱的地位，因而雙方才會爆發後續的一連串的問題。

三、行動視野：政治互動下的中國

⁷⁷ 1966.” Security of Southern Asia: What are China's aims in Southern Asia? And what can the nations of the region do about them?,” *China Report*. vol.2(2). p.15-19.

從行為主體在歷史的過程互動中看到中國的，可稱為「行動視野」的中國認識。從這類視野出發的文獻，主要的問題意識多是探討問題發展的現狀，或提出認為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案。論述方式是把印、藏（有時候指達賴喇嘛或流亡藏人，有時則指在當今中國內的西藏）、中三者都當作獨立的個體，兩兩之間各自以歷史爭議或其他的要素作為紐帶，並且都放在一個具體的歷史脈絡中分析。當其中兩者互動時不但可能會影響彼此，也會影響到第三方甚至是更大的範圍。換言之，存在於「中/漢—藏之間」的「西藏問題」，與存在於「印中之間」的「邊界爭議」，以及西藏流亡政府與印度之間的關係等，是各自區分的課題，等於是主張這些問題的本質並不完全相同，解決的方式也不一樣，儘管有關作者不忘呼籲密切注意彼此行為者之間的互動發展可能會影響到另一方面。

除此之外，「行動視野」多認為問題的產生是行動者在歷史脈絡中「不一定有主動意願」形成的，但是問題形成後透過行動者之間的互動仍可能解決爭議，但也可能使情勢變差每況愈下。由於當前局勢可能過於紛亂難解，「行動視野」多主張「擱置爭議」是最佳的解決方式，因為之所以被稱作爭議就在於一旦處理不慎就可能釀起大禍，而雙方可能都不願意事態如此惡化。例如，印中之間的邊界問題發展就是如此（Karunakaran, 1966: 35-39）。因而，每個行動者除了在先天的限制「紐帶」下與另一方互動之外，還須要考量其他的外在因素。

這種視野基本上將「中國」與「西藏」都視作與印度關係非常密切的個體，但彼此之間目前存在著不同的爭議，也都試圖解決問題，但當前的發展似乎使得問題可能不斷延續。由於同一個時期每個行動者有不同的發展目標，也希望彼此之間的互動不要因此而受限，因而在論述上多採取低姿態。以中國而言，其當前目標為持續的發展經濟；而印度目前也同樣需要也是一個穩定的環境發展自身實力；然而從西藏的角度出發則希望能獲得世人對西藏問題更大的關注，並尋求出一個合理而可行的解決辦法。面對延宕已久而未能順利解決的西藏問題，許多藏人在遵循達賴喇嘛「中道路線」（the Middle Way）同時，也逐漸思索是否可能有其他的替代方案，但也不願意因此破壞與任何一方的互動。因而，三方陷在爭議

尚未解決的狀況裡，但是又希望謹慎地與任何其他一方互動，就呈現出時而緊張，但更多時候是克制的狀況。舉例而言，Sheo Nandan Pandey 在分析西藏問題發展局勢時，就以此邏輯論證北京之所以陷入西藏問題的「泥淖」的原因。他眼中的西藏問題，就是一個中國與西藏之間基於歷史因素與各種策略考量下的產品。即使北京試圖不斷投資大量的經濟建設爭取藏人支持，但隨著經濟發展而進入藏區的漢人，在當地帶來環境生態與文化的變遷，仍影響著中共的作為反而對北京爾後的政策選項形成制約。如欲肯定藏人宗教文化，這與長期的宣傳反達賴喇嘛界限又該如何區分？中國在外交手段上又要如何面對國際壓力？諸如此類的問題都使得中共陷入了「泥淖」困境，但它仍要在這個狀態下持續與達蘭薩拉，與印度方面等互動。⁷⁸又例如，2010年四月在青海玉樹地區爆發了極為嚴重的地震災情，各國都表達了高度的關切以及物資捐助等。然而詭異的是，印度竟然不在中國的感謝名單上，這產生了「究竟印度根本沒有捐助物資」還是「捐了，但是要求不被列名」的疑問，如是前者則印度作為近鄰大國恐說不過去，但若是後者則更啓人疑竇。學者 B.Raman 的分析似乎暗示，正因為西藏因素潛藏於印中之間的爭議中，所以即使印度表達了關心也不希望會公開的明示，以免招致其他問題。⁷⁹從這類的文獻中都看到各方行動者都是在試圖解決問題時於「限制」下尋求一套共存之道。

整體言之，「行動視野」有那麼些許「博弈理論」(Game Theory)的啓發，但是更強調行動者是在諸多條件限制下互動。「中國」的形象不能以敵人、盟友等一言蔽之，它是不固定的。每一篇文獻都是基於不同的情境脈絡出發，而在每一次的互動當中，中國也都未必有相同的行為模式，所以無法輕易的加以歸納成簡單的法則。

⁷⁸ Sheo Nandan Pandey. 2010. China's Quagmire on Tibet Issue and the Dalai lama. *C3s Paper*. no.466. 參閱網址: <http://www.c3sindia.org/tibet/1264>. 檢索日期 2010/05/24.

⁷⁹ B. Raman. 2010. Why India Maintaining a Low profile in Tibetans' Hour of Tragedy?. *C3s Paper*. no.480. 參閱網址: <http://www.c3sindia.org/tibet/1304>, 檢索日期 2010/06/23.

第五節 小結

本章主旨在於整理印度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並從其文獻中進一步探求所透露的中國認識。第一節闡述了本章的架構，第二節介紹了印度學界西藏問題研究內部的組成，其中包含研究概況、專書與研究平台，並區分出「以國際關係或中國研究的平台」與「以西藏研究的平台」兩種，雖然兩者都針對西藏問題作出不少研究，但其設問各有千秋。

第三節對印度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作出整理。首先，由於西藏問題發展已經過於複雜，若試圖從學科領域或是方法論尋求歸納西藏問題研究，勢必事倍功半。然而，若從其敘事特色來探求其是否有共通性，則可發現印度的文獻在探討此問題時，乃以印度的願望或固有視野作為思考的出發點，可歸納出具有四點特色：對西藏問題的探討必然涉及印中關係發展；西藏乃有別於「中國」而介於印中之間的緩衝主體，但對如何定義主體內涵則顯得分歧；文明上，認為西藏與印度之間有深遠的聯繫，但政治上承認現狀下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未來西藏問題的解決可能方案看法不一，但基於環境、戰略安全等諸多理由，多希望喜馬拉雅山區盡量不要被人為開發。

第四節則從第三節的基礎上，繼續將西藏研究文獻中的中國認識整理歸納，而區分出從國際關係體系看到中國的「體系視野」、從文明角度來理解中國作為的「文明視野」以及從歷史脈絡過程中看中國的「行動視野」。他們彼此仰賴的文獻脈絡與所提出的問題意識各不相同，但均意識到西藏問題與印中關係互動上的連結性。「體系視野」將印度與中國都放到國際體系的競爭環境下檢視，「文明視野」則試圖從構成當代中國主體的傳統、文化思維當中去解讀它的政策行動，「行動視野」則具體的在各脈絡中重視印度、西藏、中國彼此互動間可能造成的影響。簡言之，這幾種視野都很明顯的看到印度乃是高度涉入其中的參與者。

整體言之，從印度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看來，問題意識或研究議程的開展均

與印藏交往的實際狀況呼應。無論如何，印度學界的文獻仍然是以印度的固有觀點為依據，而能夠從事跨越單一國界的想像成其探討西藏問題，並且將印度自身的情況，或印中關係的發展與其作出聯結。另一方面，印度學界在觀察西藏問題的發展時，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印度建國的經歷，西藏與印度一樣，既具有「文明」的主體性，也具有「國家」行動者的身分。當其關注西藏作為一種文明而被納入另一個更大的漢文明體時，其間展現的正是來自於印度自身作為一個悠久文明古國的敏感性；而當字裡行間流露出以國家戰略視角觀察西藏地區的情勢演變，甚或追求西藏與整個喜馬拉雅山區的非軍事化、非核化等目標時，則是出自於印度作為一個現代主權國家面對同樣作為主權國家近鄰「中國」的考量。





第四章 澳大利亞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 及其視野下的中國觀

第一節 前言

與印度相同的是，在澳大利亞主要從事西藏問題研究者，除了有來自「西藏學」背景的學者外，也多有來自於從「中國研究」脈絡出發的學者，後者並且是最主要的研究成果的來源。然而，比較起印度從很早期就開始與西藏來往，其學界也有數量眾多的研究人員長期關注西藏情勢，並且還將其聯結到對中印關係的討論，澳大利亞的西藏問題研究不但相對起步較晚，研究篇幅較少，其文獻探討的核心焦點也多半不涉及中印關係。從學界的研究議程發展來看，早期澳大利亞西藏問題研究從主要關注冷戰時期「中國」的行動開啓，尤其是對中共出兵西藏一事的探討，並試圖解釋這件事帶給澳洲的意義與啓發。⁸⁰晚近的研究文獻主軸多半是在「地理」上的西藏地區內，或針對特定議題與理論框架進行田野研究或實證研究，或與中國其他地區的狀況作比較等。整體言之，在澳洲執教的學者多半將西藏的研究放到整個「中國」的框架脈絡下來思索與解釋，因而，澳大利亞的西藏問題研究除了是澳洲「西藏學」探討的範圍，比之印度更是其「中國研究」重要的一環。以下便進一步從此切入探討研究文獻背後所影射的中國觀。

在本書第二章曾經提到，澳大利亞的藏人難民自 90 年代後就呈現急速成長的趨勢，然而相較於其他的歐美等國家或印度的狀況，其人數在比例上仍然偏低。再考量近年來澳大利亞與中國在經貿關係上的往來日趨密切，以及逐年增長並在當地社會生根的華人社群，種種背景都難以明確顯示澳大利亞學界在投入對西藏問題的研究時，是基於國家戰略利益或是經貿層次的考量，遑論澳洲在地理

⁸⁰ 澳洲與西藏早期的接觸記錄來自於 1968 年「澳洲西藏友好團體」(Tibet Friendship Group)的成立，可見本書第二章第四節第二項「澳大利亞與西藏的來往」介紹。而澳洲早期關於西藏問題研究的著作可見 1967 年《在中國的恐懼之中》(In Fear of China)一書，見本章第二節。

位置上又距離西藏頗遠的先天因素。而從投入研究的情形來看，澳洲的西藏問題研究多半以學者為單位，或是民間團體，而少有設立專職的研究機構。研究者通常接受過現代學科理論方法的訓練，或出自於本身強烈的對西藏問題與西藏地區人權狀況的關懷，或是因為熱切關心中國的政經發展動向而開展出對此研究的契機，而且多有實際深入中國各地區田野調查的經驗。受到 70 年代後澳洲政府宣布廢除白澳政策，主張澳洲應成為一個開放的多元民族國家，且在國家定位上從一個西方國家逐漸自我轉型成亞太地區的一份子的政策選擇所共同影響，澳大利亞的西藏問題研究顯現出帶有西方理論框架，田野調查，並偏重在對宗教文化、民族衝突與身分認同等人權相關議題探討的特色。

本章以下四節逐次說明從過去到現在澳大利亞西藏問題研究的概況，並以學者為重心，依照「以西藏研究為核心」與「以中國研究為核心」兩大研究脈絡，介紹幾位當代澳大利亞學界的重要作者；第三節則闡述澳大利亞的西藏問題敘事，從其學界文獻整理出共通的幾點特色；第四節探討不同年代的不同文本中的中國觀。

第二節 澳大利亞西藏問題研究內部的組成

一、研究概況介紹

澳大利亞與西藏的接觸主要始於 60 年代末期，70 年代開始有藏人移居澳洲，其中不乏有喇嘛、仁波切等於當地設立佛教中心弘法，80 年代後西藏問題在澳洲的能見度大開，90 年代後支持西藏的運動更是蓬勃發展至今不歇。然而，儘管現在澳大利亞已經有眾多的佛教中心，而且在民間運動以及政治上探討西藏問題非常熱烈，不過從學術發展的角度上來看，澳大利亞直到現在仍然少有關於西藏研究的單位與機構，大學中也少有設立專門的「西藏學」科系；反而，由於

澳洲長期關注並發展對當代中國的研究，使得中國研究在澳洲成爲具一門獨特跨領域性質的學科，西藏問題研究因而在澳洲的情形與中國研究領域相密切。許多研究者多半出自澳大利亞各大學中的「中國研究」、「亞洲研究」或「東亞研究」等科系，亦即從「中國研究」的脈絡開啓對於西藏的研究，就當前的狀況而言，研究人員與研究成果的數量確實也尚不足以達到能從其中區別出來。宗教政治與中國學這兩種脈絡共同構成了當前澳大利亞西藏問題研究的主要途徑。

一開始，澳大利亞學界對於西藏的研究就是從政治方面切入的，而且也與澳洲觀察中國的目的密切相關，當時的討論主要基於意識形態的立場，爭論中共出兵西藏的行動，卻其實少有對西藏進行細部的討論（Strahan，1996：248）。1967年前澳大利亞外務部長（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Gregory Clark的《在中國的恐懼之中》（*In fear of China*）一書，是早期關注到西藏問題的著作，書中主要探討對象爲中國，並將西藏問題放在其中一章討論。他將「西藏問題」視爲中國國家發展過程中所衍生的關於少數群體權利的問題（national minority problem），並認爲這在許多國家的歷史上都曾經發生過，例如印度在50年代爲了控制邊境而與當地的Naga民族發生衝突的情況就是。在該章中，他認爲西藏人在種族上與中國人有許多共通之處，西藏在文化上也同時受到印度與中國的影響，而且，從歷史的依據與國際法原則的角度來看，他也認爲「西藏屬於中國的一部分」的說法可以成立。他最主要的結論是，他不否定中國政府有權利在西藏可視需要依照法律而採取行動，因爲他認爲在政治上西藏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藏人屬於中國的少數民族，而中藏之間的互動應該要依照雙方的具體協定才是。他並將問題的發展聯結到當時澳洲國內的情形，而自問是否能從澳洲處理與原住民問題上獲得更好的經驗（Clark，1967：33-42）？

該書被視爲是當時澳大利亞社會內部激烈爭論澳洲究竟要在亞洲扮演何種角色，以及對亞洲政策、特別是中國政策的未來走向的一個反映。更因時處冷戰與越戰期間，對澳洲是否要繼續追隨美國外交政策以及如何界定自身的重大關鍵問題，作者形同是提出了一份建言（Uberoi，1969：31-32）。揆諸自50年代以

來盛行於澳大利亞社會對中國的恐懼，本書同時也可視為是一種緩解，試圖引導大眾從冷戰格局外認真看待中國更多的面向。⁸¹雖然 Gregory Clark 認為中國確實有能力也可能威脅澳大利亞，但這不意味著中澳雙方的未來必然只有衝突；反而，一旦經過對中國的深度了解之後，也可能因為掌握中國行動的關鍵而呈現不同的局面。

1970 年馬克斯維爾 (N. Maxwell) 的《印度對華戰爭》(India's Chinese War) 一書，則可說是同樣出於試圖解讀中國行動的另一重要著作。作者於 1959-62 年間在印度任職於《泰晤士報》(The Times) 記者，因而實際在參與過印中戰爭期間印度與中國互動的往來過程。他在該書的論述過程中探討分析戰爭前後印度「前進政策」的實施，以及印度與中國方面的互動，並回顧到西藏問題的發展，由此釐清過去西方社會對共產中國的刻板印象，中國實際上並非一味以意識型態為尊，對外政策也並非中國至上主義。在書中，雖然並陳印中雙方對邊界問題的立場，不過作者並沒有另外將西藏問題獨立成完整的課題，而是散落在序言及前三章中討論。根據他的描述，西藏因素之所以成為影響印中邊界爭端的重要原因，主要是由於印中兩國在建國後均力圖穩固「自己的」邊界，這因而牽涉到自中國清末以來，西藏已有一段時間獲得極大的自主性地位、卻又因中共建國後出兵西藏而喪失這個自主性，包括凡此等等所衍生的複雜細節，包括麥克馬洪線的劃定，以及中共始終懷疑印度對西藏的意圖等。⁸²

如此，澳洲在 60、70 年代初雖然開始有文獻涉及對西藏問題的探討，但多還是附屬於對北京的解讀而少有出自對西藏本身的研究；直到 80 年代開始，學界才逐漸興起類似馬克林 (Colin Mackerras) 的〈西藏與中國〉(Tibet and Chinese) 一文這類以深入的田野調查方式完成的專題式著作。⁸³而真正要談到大量採取

⁸¹ Colin Mackerras. 2009. "The 'China Threa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ise: A view from Australia." In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emo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version of Macau, May 10-13, 2009,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⁸² Neville Maxwell 著，1971，《印度對華戰爭》，北京：三聯書店出版、新華書店發行。

⁸³ Colin Mackerras. 1988. "Tibet and the Chinese." *Current Affairs Bulletin*. vol. 64. no. 12. p. 22-28.

「在地研究」，並以西藏地區為範圍，不斷地推陳出新的探討全球化對當地的影響，或是現代化帶來的衝擊、西藏民族主義的發展、中藏之間的對話情形，乃至於西藏高原人文生態環境的變遷等等各類議題，則更多是 90 年代之後的事。許多學者為了更加了解西藏地區的變化，而紛紛基於不同目的實際走訪當地，記錄在地情形並回應理論。就在這數十年間，澳洲歷經國家身份的轉型，外交政策上並自一個原本依附於英美路線的追隨者，逐漸成為具自我特色的亞太區域國家，與中國在經貿的交流更是日趨緊密。

二、學界人物介紹

由於在澳大利亞對於西藏問題的探討並不若印度那樣盛況，而並未構成如印度那樣形成關於西藏問題研究的討論平台。整體而言，為了凸顯並進一步介紹澳洲學界的狀況，我們將不同於第三章的作法，在本章改而針對個別的研究者作出具體的介紹。並且，本論文參照馬克林的研究，⁸⁴依資料收集的語文途徑與所受的學科訓練，對下述研究者作出「以中國研究為核心的研究者」以及「以西藏研究為核心的研究者」兩種區分。簡言之，澳大利亞學界的組成多元，而且研究者均重視在地參與及在地研究，這種經驗使得澳洲學界在看待西藏問題上表現出雖無固定模式，但又顯與其他研究社群迥異的風格。

（一）以中國研究為核心的研究者

Susette Cooke：目前為雪梨科技大學中國社會與文化變遷中心講師（Centre for Social &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Investment），主要研究領域為中藏關係，中國藏族政治以及中國內部的宗教發展，並兼涉及性別政治。現正參與澳洲研究議會

⁸⁴ Colin Mackerras. 2010. "Tibet Studies in Australia,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2010-2012 年於中國青海與雲南地區進行的「中國藏傳佛教：身分、文化與發展」研究計劃(China's Tibetan Buddhist Margins: Identity, Culture and Development)。⁸⁵其他相關研究還有〈爭取自由是我們的義務：中國國家體制下的西藏尼姑〉(To Struggle for Freedom is Our Responsibility: Tibetan Nuns in the Chinese State)⁸⁶等。

何包綱 (He Baogang)：為華人移民，現為澳洲狄肯大學 (Deakin University) 國際關係講座教授。⁸⁷主要研究領域為民主理論與中國問題，思考脈絡並多圍繞在「中國民主化」上。由於早年有哲學系思想背景，研究上著重思想與實證方法的結合 (曾彥中，2009：63-73)。2009 年曾舉辦西藏研究的工作坊。

他從中國研究的脈絡出發，並有多篇涉及西藏問題的研究。其中包括 2005 年〈中國特色的少數群體權利〉(Minority ri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⁸⁸一文，他從儒家思想與中共國家體制的設計延伸討論西方自由主義脈絡下的少數群體權利理論；同時也開始發表一系列期刊文章探討北京與達蘭薩拉的對話情形，包括 2006 年的〈達賴喇嘛的自治計劃〉(The Dalai Lama's Autonomy Proposal)⁸⁹以及在 2005 年及 2007 年與 Barry Sautman 合寫的〈達賴喇嘛對自治的新倡議〉(The Politics of Dalai lama's New Initiative for Autonomy)⁹⁰、〈達賴喇嘛的新自治論〉等⁹¹。除此之外，他在思索其他國家關於身分認同與少數群體之類的議題

⁸⁵ 見網址：<http://datasearch2.uts.edu.au/crc/members/detail.cfm?StaffID=2449>，檢索日期 2010/07/04。

⁸⁶ Cooke. 2005. "To Struggle for Freedom is Our Responsibility: Tibetan Nuns in the Chinese State" in Maja Mikula ed. (eds). *Women, Activism and Social Change: Stretching Boundarie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p. 117-135.

⁸⁷ 可參閱網址：<http://www.deakin.edu.au/arts-ed/sips/staff-directory2.php?username=baogang>，檢索日期 2010/07/03。

⁸⁸ "Minority ri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ed. by Will Kymlicka & He Baogang . 2005. *Multiculturalism in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⁸⁹ "The Dalai Lama's Autonomy Proposal." In ed. by Barry Sautman & June Teufel Dreyer . 2006.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Armonk, N.Y. : M.E. Sharpe:67-84.

⁹⁰ "The Politics of Dalai's New Initiative for Autonomy." *Pacif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601-629.

⁹¹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十五卷第二期，頁 1-32。

時，也常常投射出對中藏關係的看法。⁹²顯見西藏問題在其思考中國時具有的參照性。

希爾曼 (Ben Hillman)：現為澳洲國立大學克勞福政經學院 (Crawford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Government) 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地方發展政治與印尼。他非常熱情參與在地事務，一度擔任聯合國的發展計畫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的顧問，也曾經在 2006 年主持對印尼亞齊省的衝突後選舉的支持計畫及 2007 年關於亞齊省的省級政府改革方案。他在中國雲南省的藏族自治州 (Diqing Prefecture) 並創立了非營利組織「藏東訓練機構」(Eastern Training Institute)，⁹³他的許多西藏研究都是以該地出發的。⁹⁴

希爾曼的西藏問題研究主要關注在西藏地區，包括中共不同時期的不同政經政策對藏人造成的影響，並著重在他們自我身分與文化認同上的轉變，兼論他們如何與國家政府或其他民族的互動，同時輔以自身的田野調查經驗作為實證結果，進而評論北京與達蘭薩拉之間對西藏政經情勢的爭論。相關研究可見〈在中國的寺院政治與地方的國家機制：一個西藏自治區的官方與自治〉(Monastic politics and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 Authority and Autonomy in an Ethnicity Tibetan prefecture)⁹⁵、〈錢買不到西藏人的愛〉(Money Can't Buy Tibetans' Love)⁹⁶與〈中國西藏的民族觀光與民族政治〉(Ethnic Tourism and Ethnic Politics in Tibetan China)⁹⁷等。

馬克林 (Colin Mackerras)：現為格里菲斯大學 (Griffith University) 榮譽退休

⁹² Baogang He & Anthony Reid . 2004. "Special Issue Editors' Introduction; Four Approaches to the Aceh Question." *Asian Ethnicity*. vol.15, no.3, p.293-300.

⁹³ 可參閱網址介紹：<http://www.crawford.anu.edu.au/staff/bhillman.php>，檢索日期 2010/07/01。

⁹⁴ 例如以田野調查方式探討藏人自己與其他民族如何看待藏人，可參閱 2006. "Mca Minority: Masculinity and Ethnicity on the Edge of Tibet." *Modern China*. vol.32, no.2., p.251-272.

⁹⁵ 2005.: Monastic politics and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 Authority and Autonomy in an Ethnicity Tibetan Prefecture." *The China Journal*. no.54. p.29-51.

⁹⁶ 2008. "Money can't buy Tibetans' lov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71(3).p.8-12.

⁹⁷ 2009." Ethnic Tourism and Ethnic Politics in Tibetan China." *Harvard Asia Pacific Review*. Spring 2009. p.3-6.

教授以及北京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是澳洲當代中國研究的最早的先趨之一，也是著名的國際期刊 *Asian Ethnicity* 的創辦人，是早在 1960 年代就得以拜訪中國的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亞洲音樂與藝術、中國近代史與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特別是對新疆維吾爾族與藏族，也曾多次造訪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他並且曾經在 2005 年時為聯合國撰寫關於中國西藏地區的報告書。其經歷與學術成就可謂是當代澳洲最重要的中國研究與少數民族研究者之一。⁹⁸

馬克林的西藏問題研究多放在現代中國的發展框下檢視。他以自身走訪的田野調查經驗，綜合性地思索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現代化」深入各地所造就的情勢演變，透過自身的見聞深思箇中癥結，以此回應北京與達蘭薩拉雙方對西藏問題的論述。相關研究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人口狀況的報告書》(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ckground Paper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Tibetan Population)⁹⁹、《中國的少數民族》(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¹⁰⁰《中國的少數民族與全球化》(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Globalization)¹⁰¹等。

(二) 以西藏研究為核心的研究者

John Powers：現任職於澳洲國立大學亞洲社會與歷史研究中心主任 (Centre for Asian Society and Histor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¹⁰²主要研究領域為印度哲學、西藏歷史與宗教和文化方面的議題，並具備卓越的藏語文能力以及熟悉古典中國文化。他最著名的作品為《歷史作為一種主張：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共的觀點比較》(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⁹⁸ 可參閱黃有形，2010，《在整體中發掘個體：馬克林與他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⁹⁹ Colin Mackerras. 2005.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ckground Paper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Tibetan Population*. In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¹⁰⁰ Colin Mackerras. 2003.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¹⁰¹ Colin Mackerras. 2005.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Globalisation*.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¹⁰² 可參閱網址介紹：http://asiapacific.anu.edu.au/people/personal/mortk_ir.php，檢索日期 2010/07/02。

China)。在該書中，John Powers 首先認為，「歷史」被北京與達蘭薩拉雙方都當作一種建構認同的手段，然而雙方的觀點不但幾近無法相容，其各自的論述內部也有不連貫與矛盾之處。因而，該著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平衡地呈現雙方爭論之處，並考察檢視其各自論述的內容，為此他還多次前往西藏進行田野調查。¹⁰³另外，該書的重要貢獻是整理了多位國際知名的西藏研究專家的著作中，針對多項議題所透露的態度與常用語，作出了「中國來源」(Chinese sources)與「西藏來源」(Tibetan sources)二種可作為評斷文本立場的簡易指標，並可以此推測不同學者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¹⁰⁴

Simon Bradshaw：現為澳大利亞民間支持西藏團體「澳洲西藏議會」的研究員(Campaign Coordinator for the Australia Tibet Council)，長期關注西藏地區的發展情勢，也曾經前往西藏地區考察與研究。新近的研究有〈陸克文的「新中國學」中有西藏的位置嗎？〉(No Place for Tibet in Rudd's 'New Sinology'?)¹⁰⁵一文。

Gabriel Lafitte：為澳大利亞著名的西藏問題研究專家，長期推動澳洲人對西藏問題的認識，並擔任西藏流亡政府的發展政策顧問(development policy consult to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desk of the TGIE)，曾多次前往西藏地區實地了解當地情勢發展。他的著作多發表於網路上，可參閱〈西藏共產黨與煤氣價格〉(The Tibet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rice of Gas)¹⁰⁶與針對 2008 年拉薩事件的

¹⁰³ John Powers. 2004.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xford: Oxford Press.

¹⁰⁴ 例如，他以描述「中國『接管』西藏之前與之後的狀況」為關鍵字，如為中國來源者，多認為西藏本來的生活困苦(bieeer life)、經濟落後(backward economically)，西藏是地方政府(Chinese local government)而中國是中央政府(central government)。當中國「和平解放」(peaceful liberation)後，政府推行「民主改革」(democratic reform)，社會逐漸進步(development)。反之，為西藏來源者，多認為西藏本來雖貧窮卻社會祥和且人心滿足(happy, peace, satisfied)，噶廈政府為達賴喇嘛的政府(Dalai Lama's government)，是中央政府(central government)，而視中國為另一國家(Chinese government)。中國的「入侵」(occupy)造成極大的「悲劇」(tragedy, genocide)，猶如「殖民壓迫」(colonial oppression)；並以此指標對 I. Epstein、T. Grunfeld、M. Goldstein、W. Smith 與 R. Thurman 等西方知名西藏學者作出立場上的區別。可參閱該書中第 18 頁、24 頁與 132 頁整理之表格。

¹⁰⁵ 見網址：<http://www.onlineopinion.com.au/view.asp?article=10406>，檢索日期 2010/07/09。

¹⁰⁶ 見網址：<http://www.abc.net.au/rn/perspective/stories/2002/574937.htm>，檢索日期 2010/07/02。

〈藏人的自殺式抗議〉(Tibetans' Suicidal Protest)¹⁰⁷等。

第三節 澳大利亞的西藏問題問題敘事

一、議題研究領域與方法論多類同

澳大利亞的西藏問題研究因研究者本身各自關懷焦點的不同而發展出多元的面貌。然而，相較於其他學界社群的狀況，其在學科領域與方法論途徑上有其明顯而類同的特別之處。

前者指的是，澳洲從事西藏問題研究者多出自於「西藏研究」與「中國研究」等兩大脈絡背景；並且，文獻的問題意識多擺在藏人與中國國家體制或其他少數民族的互動上；在研究議題的範圍設定上也多將焦點鎖定在地理上的「西藏地區」（更不能忽略當前世界各國政府的立場多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些因而使得澳洲的西藏問題研究文獻在「學科領域」上的難以被清楚地辨識，整體而言均與澳洲的「中國研究」的跨學科性質密切相關。可以說，無論是由哪一研究脈絡出發探討這個問題，其研究成果都可與「中國研究」領域對話。後者則主要指這些從事西藏問題研究的學者大部分都有實地走訪西藏地區的田野經驗。這從文獻當中作者的自述，他們多以自身的見聞或實地蒐集的資料完成研究，而不僅僅依賴對現有的書面記錄分析可以印證。因而，在方法論的途徑上澳洲的研究多使用強烈立基於個人經驗的「田野調查」法與「訪談」法。

二、西藏問題論述特色

¹⁰⁷ 見網址：<http://www.onlineopinion.com.au/view.asp?article=7151&page=1>，檢索日期 2010/07/03。

澳洲學界的西藏問題敘事有幾點共通的特色，並且第三章的印度學界多有不同。整體言之，其敘事是以類似觀察者的角色，去思索近代「中國」國家內部西藏地區的人、事與政經情勢演變，並著重探討關於深層的身分認同、文化意識、宗教自由等當代人權面向的議題，且又富有熱忱，並希冀能以自身的知識或澳洲的經驗提供協助。

（一）西藏問題必然涉及當代中國發展

從大部分的澳洲文獻的敘述結構以及問題意識來看，對西藏問題的探討幾乎都放在中國的框架下談，也必然涉及對當代中國發展的看法，並且，大部分的文獻著墨於中共建國之後，其中，又特別關注 1980 年代改革開放後，其間對於歷史上的中藏關係研究探討的篇幅與數量則較少。然而，這並不是說澳大利亞學界對於歷史上的中藏關係沒有自己的看法，實際上，當文獻在回顧當代中國之前的中藏雙方歷史時，常見的敘事方式主要是「雙方的意見並陳」。亦即，文獻多會將「被視為」是支持北京立場的觀點與支持達蘭薩拉的觀點作出簡單的摘述闡釋，但多數作者並不刻意表明自己認為何者有理。¹⁰⁸如果用達賴喇嘛的話表示，作者似乎是以為「歷史自會證明西藏到底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的論述方式一方面可能顯示出歷史上澳大利亞與西藏之間少有接觸，也少有屬於本土文獻的記載，因而對於中藏關係的了解多必須透過其他學術社群的成果協助；但同時，澳洲的研究者也多有前往西藏地區田野調查與訪談的經驗，藉由實地蒐集資料與個人感受以輔助對文獻的判斷解讀。另一方面，澳大利亞雖然少有與西藏來往的經驗，但是卻與當代中國在各方面上有諸多頻繁的往來，特別是在經貿方面，所以相較之下，對於當代中國的熟悉程度就比較高了。

中共入藏後推行的種種變革對藏人造成何種影響，是澳洲研究者關懷的重點之一，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對西藏在宗教與文化層面上的破壞，更是他們譴責

¹⁰⁸ 從 John Powers 的著作很明顯可以看到這個色彩。

的一環，字裡行間多流露出對西藏遭遇的惋惜，但也多將這個動盪視為是當時整個中國大環境的問題（Mackerras，2005：23-25）。1980年代鄧小平對達蘭薩拉方面說，「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以及胡耀邦訪視西藏後宣布開啓改革，這之後的情勢發展則是文獻最為投入的部分。在這段期間，中國改革開放與經濟表現日益亮眼；達賴喇嘛也首次派遣代表前往拉薩地區了解當地狀況；中共官方開始重新提倡少數民族文化並發展觀光；然而，中藏對話多年來發展並不順利，拉薩地區也在1987、1989分別爆發了動亂，而2008年的314拉薩事件更是舉世矚目；天安門事曾使中共國際形象跌到谷底，並對比於達賴喇嘛同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並使得西藏問題在國際的能見度提升。凡此種種國際性的或是地區性的事件，都讓西藏問題的研究更具挑戰性。

至今，引發研究者關注的課題包括，中共究竟在西藏當地的統治為何，藏人宗教自由與言論自由有無受到壓制，人權狀況有無改善？西藏佛教與文化究竟是受到破壞，還是實際上得以振興？中共的人口政策在西藏地區的實行狀況為何？國家投入大量資源經濟發展的結果究竟有無佳惠藏人？中藏對話狀況的發展？這些議題澳洲學界不但是反覆研究，也一再深入基層作田野調查，其目的不啻是關懷西藏問題的發展，更無疑涉及對當代中國的變化加以掌握。

（二）西藏被視為具別於「漢」的主體性

從「主體性」來看，澳洲的研究者多意識到「西藏」具有獨特的地位。他們發現，就歷史發展而言，西藏人有自己民族起源的神話傳說，西藏地區也曾經有過自己的政權，並在不同時期與傳統「中土」王朝來往：藏王曾經與唐朝的公主聯姻，也曾經與中土共同與蒙古帝國發生過聯繫（依照觀點不同而有視其為獨立或是與中土共同被征服），在明、清等時期西藏更是逐漸與中土的關係越趨密切（但是否屬於其行政管轄仍同樣有不同的立場）（Powers，2004：28-70）。直到中共出兵西藏而能直接管理藏地為止，總體來說，研究者呈現的西藏確實一直都

維持某種程度的自主性。研究者或有謂，從民族、語言、文化與宗教等來看，藏人也確實截然不同於漢人（Mackerras，1988：22）。

然而，大部分的澳洲研究者在研究西藏時仍多從「中國」的框架下出發，而認為自己是從事「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例如 Susette Cooke、希爾曼、馬克林在接受訪談時，都曾經具體表達過這類看法。¹⁰⁹這背後的原因一方面除了與這些學者所學的學科背景多與中國研究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當前世界（包含澳大利亞政府）幾乎都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個中國原則有關。即便是從「西藏研究」脈絡出發者，研究上也多體認到西藏的特殊性意義，因而，當前澳洲總理陸克文在提倡澳洲發展其（從中文語境與中國歷史出發的）「新中國學」時，Simon Bradshaw 更大聲疾呼關於西藏的研究應當要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¹¹⁰因而，不論基於何種出發點，從「西藏研究」或是「中國研究」兩種脈絡探討西藏者都視「西藏是中國框架內有別於漢的主體」。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文所分析的文獻中，不論是從哪一個脈絡出發的文獻，在描述解放軍出兵西藏的行動時，其用語上多有使用過「接管」（take over）¹¹¹或「統一」（unity）等字眼；¹¹²在稱呼漢人時也多有使用「漢族中國人」（Han Chinese），¹¹³也顯見其不必然將漢人與中國人劃上等號，簡言之，中國被視為一個涵義更廣的「國家」。

畢竟，西藏在行政或政治上是否屬於中國，在澳洲對中國乃至於對西藏產生研究興趣之前已經有所安排，故並非後來的研究者所能置喙，何況之後所開展的關於西藏的研究課題，並不會直接受到西藏主權問題的影響，甚至西藏主權歸屬並不改變澳洲學者賦予西藏某種宗教或文化主體性的研究設計，即令西藏主權有朝一日發生變化，對澳洲學者的西藏研究似乎不致產生衝擊。如前所述，學者在研究上不但必然涉及當代中國的發展，在焦點上也多圍繞在中共政策、西藏地區情勢的演變與藏人在身分上的自我認同有無轉變，目的就是為了了解西藏民族的

¹⁰⁹ Colin Mackerras. 2010. *Tibet Studies in Australia,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¹¹⁰ 見網址：<http://www.onlineopinion.com.au/view.asp?article=10406>，檢索日期 2010/07/09.

¹¹¹ 例如 John Powers. 2004. *History as Progadanga*. p.111.

¹¹² 例如 Colin Mackerras. 2003.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Globalisation*. p.22

¹¹³ 例如 Ben Hillman. 2009. "Ethnic Tourism and Ethnic Politics in Tibetan China." p.3.

「主體性」有無產生變化。

（三）重視對在地情勢發展的細節探討

澳洲文獻對西藏問題敘事的第三個特點，是著重對在地情勢的細節探討。他們在時期序列不一定很長，探討的地區範圍也不一定很大，常常是對近十到二十年的狀況，選取一個城市或鄉鎮為對象，進行深入探討。亦即，研究者的問題意識並不在於將西藏作為驗證社會科學理論的實例，也不必然試圖從其中找出得以反駁理論的可能性，其關懷者，乃是「在地」的實踐，而理論僅是作為輔助解釋與描述的工具，或者是其研究成果所回應的後見之明。作者尤其好在論述中轉介自己如何深入西藏地區，運用田野調查與訪談等方法論途徑，以自身見聞，甚至附上照片以印證當地情勢。經由這個實證研究過程所整理的北京與達蘭薩拉雙方對於西藏地區情勢演變的爭論，作者或有同意其中一方說法，但更多時候是認為雙方的論點都過度簡化而有不足。這在探討 2008 年拉薩事件的文獻中，尤其可以清楚看到這個不偏不倚的立場。

文獻中有指出，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其經濟自由化的程度日高，中共下放權力給地方的權限也日益擴大。在以藏人為主的西藏自治區或是各地的藏族自治州等少數民族區域，多以觀光業作為主要的發展產業之一。在觀光產業的邏輯引導下，重新塑造或是振興傳統藏人文化成為必要，寺院的修復與開放也成為地方建設的重點。伴隨著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力的成長，沿海地區的新興階級莫不前往內陸旅遊，試圖追尋「香格里拉」勝地，這加深了對西藏的刻板印象，也強化了藏人對自我文化的認同（Hillman，2009：3-6）。然而，中共雖然投入大量資源於西藏地區，但重視者僅為市場效益而非教育文化，其間政府雖或夾雜若干對弱勢的保障意識，但經濟發展越盛，貧富差距卻反而拉大；當這種差異與漢藏民族身分相互強化，中共又採取否認態度，也拒絕任何國際行動者參與觀察或謀求抒緩，故文獻已經預期西藏地區的情勢不穩（Hillman，2008：8-12）。這

些文獻針對西藏地區的狀況作出非常細部的討論，文獻反映不出明顯的政治立場，但卻散發對在地狀況真摯的掌握與關懷。

即使是對中藏對話情形的探討，澳洲文獻也仍然保有這種風格。從人口成長率，到西藏文化的保存，或是西藏問題未來的解決，研究者也多透過自身資料的蒐集與訪談當地人的經驗回應。他們都以自身所擁有的知識或經驗，對問題作出深度而細部的討論。

（四）對西藏問題的解決均重視西藏主體性的存續

澳洲西藏問題研究敘事的第四個特點，主要在其對西藏問題未來解決的看法上。不過，大部分的文獻少有直接表態主張西藏未來的走向，僅多表示希望問題可以在避免衝突的情況下解決，而且也不可能迴避掉中國。整體而言，文獻當中並沒有一致的看法。在馬克林的研究中，他曾經詢問過了多位澳洲的西藏研究者，包括 John Powers、希爾曼以及何包鋼等人對西藏問題解決的看法，均得到類似於上述這樣的答覆。John Powers 認為，無論如何，將來西藏將來獨立與否，都希望「西藏」得以獲得平靜，而不要再被打擾；希爾曼則認為現代的藏人不可能再孤立於世，而希望他們能夠獲得更多關於現代世界的就業能力，他的「藏東訓練機構」就是基於這個目的而創立的；何包鋼則希望問題能透過中藏之間持續的對話，避免雙方的衝突，並且以不斷而持續的審議式民主程序解決之。¹¹⁴他們都沒有明確的表示希望問題未來的解決實質方向為何，然而另一方面，他們的回答中均注重於身在過程中的西藏能得到充分的參與，而隱喻了更多對某種「西藏」主體性存續的期盼。John Powers 是希望將來透過不被干涉而使西藏得以維持其主體性；希爾曼則似乎將主體性更擺在「人」身上，希望透過個別藏人的能力與知識的增長，而使藏人社群得以整體進入現代世界；¹¹⁵何包鋼則把西藏問題與中

¹¹⁴ Colin Mackerras. 2010. "Tibet Studies in Australia,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¹¹⁵ 另外參考希爾曼在 2009 年 5 月號的《國家地理雜誌》中接受的訪問，他認為「文化是會演變

國的民主化聯繫起來，而希望透過這個過程使問題得以和平解決，我們從何包鋼其他幾篇關於討論中藏對話與少數群體權利的文獻中也看到他類似的立場。

在不同的文獻當中，研究者多有觸及藏人對於自我身分認同的問題；以及儘管肯認當今中共政治統治下確有復興西藏宗教與文化傳統的政策，但對於其詆毀達賴喇嘛，也禁止任何最多只是遙遠影射分離運動的可能性，而希望之類的極端政策得到緩解。澳洲文獻對於少數群體權利、宗教文化與言論自由等當代人權議題特別敏感。每當觸及中共在學校對藏人孩童實行愛國教育，以及經過過濾的西藏傳統與歷史，便有作者就以爲這將妨害藏人文化的主體性，並將心比心產生罪惡感的聯想到澳洲過去對原住民的作爲所產生的「失落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¹¹⁶

因而，從這些文獻中所能解讀到的，不一定是對於西藏問題未來解決的看法，而更多的是研究者希望西藏（或整個中國）可以更美好，並對於當下西藏地區情勢的演變，以及藏人遭遇表達的一份關懷。

第四節 澳大利亞西藏問題研究視野下的中國觀

澳洲學界的研究者在前提上多以當代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疆域爲範圍進行考察與研究；然而，他們並不將中國視作一個完整的集體探討之，反而，由於主張它具備豐沛的多元色彩，因此要求自己能仔細地從不同層面或地區入手，以掌握到中國的內涵，而西藏正是其一個能凸顯多元主體的觀察切入點。政治體制上中國於西藏地區的作爲或有不符當前西方的民主人權普世價值之處，但實際

的」，又說「香格里拉少數民族最現實的挑戰就是培養現代世界生活的技能」。可見在其心中西藏的主體性並不全是傳統文化，而在於一代代的藏人身上。見《國家地理雜誌》，2009，台北：海峽文化事業，頁 68。

¹¹⁶見 Gabriel Lafitte 的 Tibetans' suicidal protest 一文，網址：
<http://www.onlineopinion.com.au/view.asp?article=7151&page=1>，檢索日期 2010/07/03.

狀況的改善，必須根據內部的複雜情形與快速變動的社會先予以審慎的釐清；於是研究者指出，值此澳中關係在經濟如此緊密的來往之際，固然須當留意到西藏帶給澳洲的啓示，但也不必輕易地擴大到對整個雙方關係發展的看法。

透過對文獻的閱讀，進一步就其所透露的而再歸納整理成「國協視野」、「文明視野」與「行動視野」三種由澳洲立場看待中國的方式，以下就其思路脈絡分別敘述之。

一、國協視野：多元主體構成下的中國

澳洲西藏問題研究多放在中國框架的脈絡下理解，藉由對當地情勢發展演變的探討，並與其他的中國研究議程整合，而形成對整體中國的認識。大部分的研究者某種程度上都意識到了中國內部存在著不一的地方主體性，從地方內部的互動，到地方與地方的互動，甚至到地方與黨國家行政中央的互動，都印證了中國實為一個多元的組成。這種將中國解構成基層區塊，視中國猶如一個多元一體的國協組成，著眼於對它地方主體性的發掘，重視其基層能動性與主體性，強調對個人或社群的關懷，並深入次級文化或基層社群等次國家團體者，為澳大利亞看待中國的「國協視野」，¹¹⁷其中有極端者則稱之為「一中帝國」。¹¹⁸

這種視野下所認識到的當代中國建國過程，多至少追溯自滿清帝國時期的疆域，並歷經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以及當時倡議「五族共和」與「中華民族」的概念，再經過對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後，最後於 1949 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Mackerras, 2003: 19-21）。至此，新中國已將王朝時期的帝國疆域化為民族國

¹¹⁷ 石之瑜認為「國協意識」構成了澳大利亞國家社會與學術社群的組成，也影響到其看待其他國家與國際秩序的方式。本文發現澳洲的西藏問題研究流露的中國觀也有類似視野，名為「國協視野」。可參閱石之瑜，2010，〈文明是國際關係問題嗎？亞州學派國關理論的不可行性〉，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

¹¹⁸ 例如，譚若思(Ross Terrill) 即以此作為他著名的《一中帝國大夢》標題；可參閱譚若思著、楊明暉、潘勛、王嘉源等譯，2004，《一中帝國大夢》，台北：雅言。其他有若干注意到中國內部之多元性，然而卻以「帝國」稱呼者，也幾乎都有「國協視野」的中國認識存在。

家的邊界，而其內部則至少存在著 56 個民族，包含主要的漢族（Han Chinese）與其他 55 個少數民族（ethnic minorities），而藏族乃是少數民族其中之一。「西藏問題」的發生，與此中國民族國家體制的形成密切相關，故早就居住於後來成立的當代「中國」境內且具備主體性的藏人，是否願意在身分上認同接受成為「中國藏族」，就是問題的重要起點。

所謂「國協視野」之意義，在於文獻當中透露出中國是集多元差異共於一體，而西藏是其多元組成中的一部分，中國固非西藏身分的實質內涵，卻已成為西藏歷史演進中相互構成的對象。立基於此，並更進一步去探討國家體制與多元體之間的互動者，可謂之為「文明視野」。

二、文明視野：國家體制與多元體互動下的中國

儘管意識到中國的多元組成性質，不過，在幅員遼闊的中國主權國家疆域內部，多元的民族/文化之間其實仍有強勢與弱勢之分，一旦與國家體制蘊含的行政壟斷力或暴力特質聯繫起來，加上中共的統治政策的急切，西藏問題的性質往往就成為政治統治者運用主流文化與行政手段壓迫其他少數民族的展現。這種看待中國的方式即為「文明視野」。

澳洲的「文明視野」與印度的「文明視野」內涵上有相似之處，但不若後者尚思索到印中關係發展，其主要的焦點仍擺在「中國」上。

我們可以再用譚若思（Ross Terrill）的說法來理解之。他認為，中國的概念可堪比擬作大英帝國，而且，作為實體來說，兩者都曾經壯大過也都曾經式微過，然而，儘管當代中國在體制上已經是一個民族國家，但究其統治內涵卻仍汲取過去王朝歷史與帝國時代的思想，自居一切中心，並意圖成為「新中華帝國」。統治者建構歷史，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由上而下塑造國家榮耀；「中華民族」雖然號稱由 56 個民族所組成，然而中華文化並不由這 56 個民族所共同締造，反

而卻由主流漢族文化所主導，因而所謂的多元化僅僅是一個教條（Ross Terrill 著、楊明暉等譯，2004：204-211）。也就是說，中國雖然是多元的組成，但實際上其內部仍然有一套須要服膺的價值體系，不同民族/文化彼此之間並不平等，而且不容任何人置喙。北京強加以漢族文化為主體的現代化到西藏，強力干涉與改造藏人的生活方式，這種「壓迫者的施捨」的思維背後正是西藏問題至今難解的重點（Ross Terrill 著、楊明暉等譯，2004：257-265）。Gabriel Lafitte 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帝國不能強以國家的形式行事」，中國統治者一味在西藏實行以特定文化為主體的現代化，終究無法解決藏人多次大規模的反抗行動。¹¹⁹

不過，從何包鋼（He Baogang）看來，似乎並不贊同西藏情勢不穩定的原因背後僅僅是統治者單純實行特定文化的現代化所致。他以為，中共在制定當前的少數民族政策時其理論根源乃是自「儒家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汲取靈感。「儒家文化」贊成「融合」而反對「同化」，「融合」的意義是，不同的主體（漢、藏）在國家框架下仍然可以保有自己的文化，而待相互影響後產生新文化，它講求的是一種文化擴散的概念，並追求多數與少數的和諧；而「同化」則是以某種力量施加到另一民族上而強迫其改變。然如果「強制」融合，則其結果無異於同化，從這一點來看，何包鋼認為西藏問題難解的部分原因，在於中共意圖強制使漢藏民族之間快速融合所致。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不承認有民族問題，而主張以現代化手段弭平階級不平等的差異。中共服應其理論，並在西藏地區投入大量資源發展經濟，其結果，卻使得本來擁有較高知識與技術水平的漢人（當地或移民）受惠程度遠超過當地藏人，而造成更大的階級差異，這不但使得西藏問題未能邁向解決，當地的情勢反而更趨複雜化。準此，何包鋼並不認為問題背後反映著漢人統治者壓迫藏人被統治者的關係，但中共在對藏政策上一味要求民族之間的快速融合與經濟發展成果分配的不均，確實是其有必要檢討之處。¹²⁰

¹¹⁹ Gabriel Lafitte. 2008. "Tibet: revolt with memories." In web: http://www.opendemocracy.net/article/china/democracy_power/tibet_revolt, 檢索日期 2010/07/10.

¹²⁰ "Minority ri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ed. by Will Kymlicka & He Baogang. 2005, *Multiculturalism in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整體言之，澳洲學界從「文明視野」角度認識中國者，其著眼點多在統治者未能適切考慮中國的文化多元性，而貿然躁進其民族國家發展的工程，這使得其結果顯現出本來就佔主流的漢族文化更形強勢，反而抵觸其本來的多元性質。

三、行動視野：從澳洲立場審慎看待下的中國

「行動視野」下的中國認識，從對中共在西藏地區種種不民主與破壞人權之所為的關注，進而引伸到應該要如何採取對中國的行動與態度者。在文獻中，論者大都意識到中共政權有諸多須要改善之處，然而，他們多並不就此主張應當要激烈譴責中共，或是要圍堵而不與中國有任何來往，大部分多還是認為應當要審慎持續的觀察中國，並要參與中國的發展，透過不斷的交流而影響改善狀況。澳中自 1997 年以來每年舉行的「雙邊人權對話」，可以說就反映這樣的思維，在雙方日趨頻繁的交流中，透過每年要求中國改善其境內包括西藏境內人權狀況，而逐步地達到目的。陸克文主張友直友諒友多聞的新中國學，便認為直率的批評是澳洲的責任。¹²¹

在這種視野下，任何情勢的發展都不能夠用簡單的理論或態度視之，而必須要透過對問題深入而仔細的探討，例如，有許多人指控北京以政策有意圖消滅藏人，情況是否屬實，有賴具體數據與實地考察，比如在中共統治下藏人人口反而是成長的；又如，有謂中共壓迫西藏宗教與文化，但根據研究者的訪查卻也可見保護的政策意識；再如，有認為中共在經濟發展上刻意排除藏人，而造成貧富差距拉大，但實際狀況可能是先天環境結構的不良與配套措施不夠，而導致藏人無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順利就業。因而，各種全稱式的批判往往有其不全之處，惟進入地方基層去了解問題所在，發掘出真實為何才可下判斷。

¹²¹ 陸克文在 2010 年 4 月 23 日於第 70 屆莫里遜講座(Morrison)暨澳洲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的(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的成立演講致辭時，除了肯定澳洲中國研究的發展，更認為澳中之間應當更廣泛的全面性交流，雙方並且是可以直率來往的「諍友」。可參閱網址：<http://pmrudd.archive.dpmc.gov.au/node/6700>，檢索日期 2010/07/14。

從「行動視野」下看到的中國，是一個多元而複雜的綜合體，這與澳大利亞國家的組成相似。西藏問題的發生顯示了其國家統治者有其不民主與不尊重人權的一面，這與已經國家歷經轉型，強調民主價值與人道關懷的澳大利亞則有很大的不同。澳大利亞與中國在互動與來往時應當要注意其負面之處，但也不能因此解釋定義何謂中國。

第五節 小結

本章旨在整理澳大利亞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並從其文獻中進一步探求其所流露之中國認識，同時為下一章的印度與澳洲的比較打下基礎。第一節主要介紹本章論述架構，第二節則闡述了澳大利亞的西藏問題研究內部的組成，包括對整個研究發展概況的簡述以及主要學界人物的介紹。其中在人物的部分依照其研究脈絡而作出了「以西藏研究為核心」以及「以中國研究為核心」兩種研究者區分。

第三節對澳大利亞學界的西藏問題敘事作出整理。首先，從其研究成果看來，不論是出自於何種研究脈絡者，在學科領域上均與「中國研究」領域密切，並可與該領域對話；而在學者的方法論途徑上也清楚地看到他們多有採取「田野調查」與「訪談」。第二，從其敘事特色來看，則可發現澳洲文獻的研究者在探討西藏問題時，多將自己居於問題之外，以觀察者的角色思索問題，但又抱持著熱忱而希望自身經驗可以提供貢獻。整理歸納後，特點有四：西藏問題必然涉及當代中國發展；西藏多被視為「中國」國家內有別於「漢」的主體；重視在地情勢的發展，並承認現狀下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對於問題未來的解決有所分歧，但均重視西藏主體性的存續。

第四節則於第三節基礎上再進一步探求文獻所流露之中國觀。區分出三種俱意識到中國的多元組成特性，然而卻僅偏重多元的「國協視野」、將國家體制與多元特性結合的「文明視野」以及將多元引伸到探討如何從澳洲的角度應對中國

行動的「行動視野」。這幾種視野均明顯的展現出澳洲試圖以一種觀察者的角度，鉅細靡遺的從「解構中國」過程中達到「了解中國」的目的，並在其中或有思索到自身所處之位置。並少有具備從戰略安全的層次思量中國，或是在觀點上透露出親中、反中等意涵。主要論述以及思路脈絡中僅見到澳洲文獻對於「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其內部多元主體的重視。

整體言之，從澳大利亞的西藏問題研究看來，其問題意識與研究議程的開展也均呼應了澳大利亞的國家經驗。一方面，西藏問題研究多被放在當代中國的框架下探討，此顯現了處於西方經驗脈絡下對主權國家的認識；另一方面，其對少數群體權利的關懷、對人權相關議題的敏感性高，則展現了澳洲曾經歷經身份轉型的過往。



第五章 綜合分析與比較： 印度與澳大利亞學界的差異

第一節 前言

經由前述章節發現，印度與澳大利亞在研究議程的開啓、投入的研究資源與研究的成果等方面均有落差，其研究觀點也有顯著的不同。整體言之，印度在歷史上很早就分別與中國和西藏來往，都將它們視爲具有等同於印度的主體性，而可謂之國家主體性。英國殖民時期帶來現代學科的研究方式，更奠定了印度在西藏研究與中國研究上各有自己的發展脈絡。在中共建國並出兵西藏後，這兩個學科不但沒有因西藏問題的發生而成爲一體，反而卻因爲問題的發展而激發出更多的研究議題與取向。另一方面，澳大利亞學界自一開始就將焦點擺在對中國的觀察上，即使是對西藏問題的關注也附屬於這個範圍。因而，儘管其西藏研究與中國研究也均有其自己發展的脈絡，但從研究上看，其成果更是其中國研究的一環，故所意識到的西藏主體性可謂是在中國框架下的地方主體性。從兩者西藏問題研究所透露的中國觀來看，儘管在名稱上有雷同者，但其內涵也均有極大的差異。印度多以自己的關懷爲起點，從印度的立場解讀西藏問題的發展，並表達出其中國認識；而澳大利亞則多以觀察者與實踐者的角色看待西藏問題，反映出細膩而且富澳洲國家轉型經驗的特質。

當代西藏問題的發展已與中國密不可分，而從印度與澳大利亞西藏問題研究來看，學術社群的研究可否能與各自（自身發展與中國關係）的國家經驗，乃至於其各自的中國研究作參照與理解。若能如此，掌握西藏問題研究的內涵，便可補充與精緻化各自的中國研究與西藏研究。簡言之，印度的研究與其中國研究關係密切，但不能簡單地視爲是其中一部份；而澳大利亞的研究則可視爲是其中國

研究的一部分。本章以下四節逐次綜合性的探討印度與澳大利亞西藏問題研究，回顧其敘事特色與中國視野的內容，並就其差異作分析與討論；接著在第三節與第四節將印度與澳洲的研究分別與各自的中國研究參照，尤其針對中國研究的發展狀況作出探討，以理解兩者之間的關係。

第二節 印度與澳大利亞西藏問題研究之比較

印度與澳大利亞在西藏問題的研究上有所差異，並不表示他們之間有高下之別，而是顯示了兩個研究社群所處的時空位置，包括印度與澳洲的地理位置與西藏或中國的距離、歷史上與彼等的互動，以及印澳兩國建國後所欲發展的方向。這些要素共同影響了兩地學術社群投入對此問題的研究，然而，這並不代表整體學術社群的研究成果被預先決定，個別學者仍有其開創性與能動性，只是說我們可以從其研究議程推進中看到這些結構上的差異。

以下綜合性的比較印度與澳大利亞的研究，而分成「研究發展狀況的差異性」、「對西藏問題研究學科領域與方法論之辨識度有別」、「對西藏問題論述明顯不同」以及「中國認識內涵大異其趣」四項述之。(表一)

表一：印度學界與澳大利亞學界西藏問題研究之比較

比較項目	印度學界	澳大利亞學界
目前研究發展的狀況	研究數量多，目前以期刊或論壇為主	研究數量少，目前以個別學者為主
西藏問題研究學科領域與方法論上	議題發展變動性大，導致在學科領域與方法論均難	學科領域與中國研究密切；方法論途徑強調田野

	以辨識	調查與訪談
西藏問題研究論述特色	西藏問題必然牽涉印中關係發展	西藏問題必然涉及當代中國發展
	西藏多被視為有別於「中國」而介於印中之間的緩衝主體，但主體定義分歧	西藏多被視為中國國家內有別於「漢」的主體性
	強調西藏與印度文明有很深的聯繫	重視對在地情勢發展的細節討論
	對問題解決有分歧，但多希望喜馬拉雅山區盡量不要被開發	對問題解決有分歧，但均重視西藏主體性存續
西藏問題研究視野下的中國認識	體系視野 文明視野 行動視野	國協視野 文明視野 行動視野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一、研究發展狀況的差異性

印度與澳大利亞學界的差異首先表現在目前累積的研究成果上。可以看到，印度長期以來一直有注意西藏情勢的研究風氣，也有大量的人才投入其中，在人員與研究篇幅的數量上，甚至多到難以清楚地辨識哪些學者可以被稱為西藏學專家的情況。第三章區分出了以西藏研究為核心的平台與以國際關係或中國研究為核心的平台兩種，不光是為了說明在印度依其性質有哪些從事西藏問題研究的期刊或論壇，也同時是要呈現出它們在研究數量上的成就。另一方面，澳洲學界目

前主要以個別學者為單位，研究人員與篇幅數量上雖不及印度學界，但是其組成多元，而且幾乎都有實地前往西藏的田野經驗。在第四章介紹以西藏研究為核心的研究者與以中國研究為核心的研究者時，究其內容都可以發現到這些學者不但相當重視在地研究，其中許多人還有在地的實踐經驗。整體言之，本研究認為印澳之間的差異背後主要反映了兩地研究社群的西藏經驗與中國經驗。

在建國前，印度在與西藏的接觸與對西藏的研究上已經從三個面向奠定了基礎。第一個部分是不屬於現代學科而來自於民間交流的研究，主要是指長久以來印度與西藏及中國在政治、經貿活動以及文化方面的來往，其中「佛教」是聯繫三者最大的紐帶，它不但是印度本土的宗教信仰，在傳入西藏與中國後，更對後者在生活與哲學層面產生重大影響。儘管佛教後來在印度逐漸式微，以及有伊斯蘭王朝的建立，導致印藏中之間交流日漸減少，不過仍還是有零星「班智達」的活動。¹²²第二個部分是「西藏學」，這開啓了用現代學科的方式來研究西藏，而且印度加爾各答乃是這門學科早期的重鎮，被稱為「西藏學之父」的匈牙利籍學者喬瑪，就是以加爾各答與大吉嶺為根據開啓了這門學科（山口瑞鳳著、許明銀譯，2003：83-85）。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到了 20 世紀初期，加爾各答大學與國際大學還先後把「西藏學」納入學校課程中（其中後者甚至是要拿來與印度學作比較）（Gokhale，1972：8）。第三個部分的研究則與中國有關。一開始，英印政府為了從中國後方進入中國而試圖取道西藏；同時又為了保障印度的安全也希望讓西藏與阿富汗成為與中（清）、俄的緩衝區，這因此有了接觸西藏的必要。民國時期的國民政府並沒有實質控制西藏的能力，當時的達賴喇嘛政府主要來往的對象是英印政府。不過，直到印度獲得獨立之前，這部分的研究成果主要僅是一些官員的記載或遊記。這三者雖然主要是在文化、歷史與宗教方面，不過對於後來偏重政治方面的「西藏問題」研究有莫大助益。

在印中分別建國之後，直到 1962 年的中印戰爭爆發，對於種種印中關係的

¹²² 劉國威，2002，〈十三世紀以後進入西藏的印度人〉，《法光雜誌》，第 152 期，可參閱網址：<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3/bj013122223.pdf>，檢索日期 2010/08/01。

變化以及未來印中關係的政策擬定，成為印度官方與國內許多人關心的議題，這促使了政府與學界投入大量資源研究印中關係。然而，對印度來說，要探討印中關係就無法迴避對西藏問題的探討，因而，西藏問題既成為研究課題，也往往被視為是一個必要回溯的背景，這時候就結合了過去對西藏的研究成果。所以，在原先取得的歷史條件下，以及新出現的基於國家的需要，加上達賴喇嘛與眾多藏人流亡印度國內所造成的效應，都是使印度的西藏問題的研究上會呈現出如此蓬勃的原因。

而在澳洲學界方面，早期澳洲並沒有與西藏來往的歷史，因而少有屬於本土的文獻記載，對於西藏的了解必須仰賴其他研究社群的成果。雖然自 70 年代後開始有藏人、喇嘛或仁波切前往澳洲，不過他們幾乎或以弘法為目的，或從事其他行業，而不必然投入學術方面的研究。¹²³同時，澳洲國家在亞洲研究或中國研究的學術發展歷史並不長，早期也極為仰賴外來學者的參與，因而這些外來的學者移民是否關切西藏問題，是額外須要考量的要素。與印度學界最大的差異是，從一開始，澳洲就將重心擺在對中國的觀察上，西藏問題對其而言僅是冷戰時期用以解讀共產中國行為的事例，以專題探討這個問題者少有。也就是說，澳洲並無一個為國家需要而投入研究西藏的背景，主要的研究都是自發性於關懷西藏，從而導致澳洲在研究人員與篇幅的數量上都少於印度的原因。不過，隨著 70 年代白澳政策的廢除與國家的轉型，使澳洲開始重視亞太地區，並不再排斥亞洲移民，也與中國的來往越趨密切；同時，它在外交上開始重視各國人權發展狀況，伴隨著西藏問題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大開，因而，許多關切中國與西藏地區人權發展的澳洲研究者逐漸投入這個領域，這是為什麼澳洲的研究文獻幾乎都在 70 年代之後出現的原因。

¹²³ 即便有投入學術工作者，也未必從事政治面向的西藏問題研究。例如現任職於澳洲塔斯馬尼亞(University of Tasmania)哲學系的索南塔曲(Sonam Thakchoe)教授為畢業於印度「中央高級西藏研究院」(Central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並移民澳洲的藏人學者，其主要專長為佛教哲學，他也是澳洲當前的西藏學重要學者之一，但並未從事任何關於西藏政治的研究。可參閱網址：<http://fcms.its.utas.edu.au/arts/philosophy/pagedetails.asp?lpersonId=2144>，檢索日期 2010/07/18。

二、對西藏問題研究學科領域與方法論之辨識度有別

在印度學界，西藏問題是一個不斷變動以及跨領域的活議題，不但呈現出多元的研究面貌，同時又不斷地延伸出新的議題，原因已如前述，因為印度有先天的研究基礎，加之後天的需要，同時又有流亡藏人定居印度社會，這些都使得印度的西藏研究在學科領域與方法論上顯現出難以歸納出明顯的特色。

而在澳洲學界方面，研究者雖然多出自於西藏研究與中國研究兩大研究脈絡背景，但基於當前各國政府多承認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以及中國研究的跨領域性質的原因，其研究文獻多清楚地是與中國研究領域密切相關。而在方法論上，多強調使用田野調查與訪談法，這可以說是澳洲學界研究西藏的特色。

三、對西藏問題論述明顯不同

印度與澳洲文獻的第三個差異主要是在對西藏問題的論述內涵。在印度的敘事中，印度將西藏首先視為一個有別於中國而介於印中之間的緩衝體，而且，這個主體與印度的文明有很深的聯繫。印度學者相當強調印度對西藏文明的諸多貢獻，並從歷史的接觸中認知到西藏已具有等同於印度與中國般的國家主體性地位。在當代的印中國家建國歷史過程中，印度認知西藏主體是被併入到另一個更大的主體中國當中，這當中還牽涉了許多印中建國前與建國後的複雜歷史，包括印度收留了達賴喇嘛與眾多的流亡藏人，以及默許其流亡政府的存在，這些都導致了印度在談論西藏問題時必然牽涉印中發展。此外，印度一方面流露出對西藏極大的同情，另一方面也基於印度國家在文明觀點、戰略安全與環境保育上的需要，而認為無論將來問題的解決為何，都希望喜馬拉雅山的資源盡量免於開發。

而在澳洲的敘事當中，研究者雖基於不同的問題關懷而展開對西藏問題的討論，但他們多把西藏放在當代主權中國的框架下討論，而從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角度切入。探討的時間點也多在中共建國之後，並且鉅細靡遺地追問，在不同時

期的不同政治政策與行為者的互動，對西藏留下的影響。通過這樣的敘事方式，西藏問題必然牽涉當代中國發展，而且研究者也注意到西藏具有別於漢的主體性。澳洲文獻多運用深入的田野調查與訪談法，並呈現極為重視細節與對在地情勢的探討，這種不重視大理論、大結構，而從非常細微的地方一步步地解構中國，去探求地方主體性者，可謂之澳洲西藏問題研究的特色。最後，在思索西藏問題的解決時，文獻少有對西藏的政治問題採取立場，但均重視西藏主體性的存續。

因而，可以看到，印度的敘事開展總是以印度為起點，不斷地思索西藏與印度在歷史與文明上的關係，以及在當代的政治問題中印度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並著重問題論述背後意義或概念，相對而言較不重視對實際細節的探討。相較之下，澳洲的敘事特色則是以外在觀察者的角色，具體追蹤近代「中國」內部西藏地區的人、事與政經情勢演變，並著重探討當代人權面向的議題，以及希冀自身的知識或是澳洲的經驗能提供協助。¹²⁴兩者之間的差異反映了各自的建國經歷以及國家發展經驗。更進一步說，同時兼具「文明主體性」以及「國家行動者」身分的印度，經由歷史上與西藏交往的經驗而賦與了西藏相同的特質，因而當印度在關注西藏問題時，對於漢藏文明主體的變化特別敏感。另一方面，印度對於喜瑪拉雅山情勢的關注也顯現其當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觀察其他近鄰行動的特質。而澳洲學界方面把西藏問題放在中國的框架下來談，顯示了基於西方國際關係脈絡下對主權國家的認識，其間特別關注與人權議題與少數群體權利的發展，則是與自身的國家轉型經驗有關。

¹²⁴ 在印澳文獻當中，2008年刊於《中國述評》的 Bharati Puri〈早期達賴與晚期達賴的方法論集論述〉以及2006年何包鋼的〈達賴喇嘛的自治計畫〉與2007年的〈達賴喇嘛對自治的新倡議〉是本研究分析過程中感到極具對比性而又富有印澳特色者。兩部分文獻的問題意識均是試圖理解達賴喇嘛前後期自治主張的轉變，然而 Puri 文以晚期達賴喇嘛個人對佛法的參悟程度，而終取得「發展」（馬克思主義、國家）與「心靈」（佛法、西藏文化）平衡點的方式來解釋為何達賴如今主張西藏應該留在中國框架內。對比於何之文章以國際局勢的變化、北京高層的態度、西藏地區的情勢演變等從各層面細膩的去理解達賴的轉變，兩種論述方式對照之下值得一再玩味。可參閱 Bharati Puri. 2008, "Discourse and Method of the 'Earlier' Dalai Lama and the 'Later' Dalai Lama," *China Report*. vol.44.p.175-184.; "The Dalai Lama's Autonomy Proposal." In ed. By Barry Sautman & June Teufel Dreyer .. 2006.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The politics of Dalai's New Initiative for Autonomy.' *Pacif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601-629.

四、中國認識內涵大異其趣

印澳文獻的最後一個差異表現在西藏問題研究透露的中國認識上。從印度的情況來看，文獻透露之思維主要仍與對印中關係的討論密不可分。三種視野「體系視野」、「文明視野」與「行動視野」均將印度的角色涉入其中，而分別從國際關係體系、文明政治的角度、歷史脈絡中的互動過程等來探討中國。總的來說，印度的問題意識主要是企圖理解「中國本質」，並由此引伸到對印中雙方應該如何互動的思索。而在澳洲的研究方面，乃是從最基層入手，由對眾多小地方的深入理解而拼湊出大的中國形象。這樣的研究方式使得文獻所透露的三種視野「國協視野」、「文明視野」與「行動視野」大異其趣。簡言之，澳洲視野主要以多元個體構成的整體為原則貫穿，並從此延伸討論中國的內部情況；以及思索當此澳中兩國互動往來密切時，澳洲究竟該如何面對一個不符合西方普世價值的政治體制。

印澳間的差異主要反映了與中國的位置距離以及國家自身的發展經驗。首先，印度所面臨的結構，乃是印中兩國在認知上均以為彼此有作為世界大國的潛力，而且在地理位置上又相鄰。同時作為世界大國的意識本身雖然並不蘊含零和的概念，然而套用到主流的國際關係上卻往往成為一個競爭性的命題，因而，本來基於印度國家戰略與安全需要的中國觀察，就不免涉入更多算計與缺乏信任。何況，印度又是實質的接觸感受到西藏近在咫尺，與中國更曾有過戰爭，因而不論如何設想，印度學者總是難以避免在思索問題時將自身涉入。儘管「行動視野」主張印中應力圖「擱置爭議」，而實際上就兩國當前發展來看也不太可能發生激烈的衝突，然而問題的敏感性始終存在。

至於在地理位置上遠離中國的澳洲，兼具西方的國際關係脈絡而又經歷國家轉型的經驗。對澳洲而言，主權國家是基本的分析單位，但是內部可以是多元也可以是單一的，因而印度學界對於西藏主體被併入另一個主體的解讀就少被澳洲所見，反而多是觀察到國家體制內（多數與少數/強勢與弱勢）民族如何互動以

及對人權議題的關注。澳洲不存在體系視野，主要是因為自其建國後的主要外交政策多是在追隨美國的前提上思索，直到 70 年代後才出現更獨立自主的外交理念（汪詩明，2003：145-149）。既然長期來看澳洲的問題意識多不在競爭，因而與之概念密切的體系視野也就少見。另一方面，雖然印澳在「文明視野」上都有注意到文明與國家體制的結合可能產生權力壓迫的問題，但是澳大利亞的地理位置也某種程度上抵消這個焦慮，至少不若印度感受到的這麼具體。從討論中國威脅的性質可知，對印度來說，中國威脅是偏軍事性的，中共在西藏地區部署的軍隊與核子武器都對印度造成實質性的壓迫；但從澳洲的角度來看，西藏問題的意義雖然顯示中國具有危害普世人權的一面，但威脅感還不若對澳洲經濟過度依賴中國的疑慮。¹²⁵

第三節 印度西藏問題研究與印度中國研究 之比較

爲了釐清印度對西藏問題研究以及其中國研究的關係，有必要先對印度對中國的研究發展情形有個了解，然後再進一步比較。

一、印度中國研究發展概說

從印度的中國研究發展過程來看，開始運用現代學科的方式進行中國研究可回溯到 20 世紀初期，而且與詩人泰戈爾（Rabindra Nath Tagore）訪華還有很深的淵源，並多發展在文化、宗教與哲學方面的領域。1947 年的印度獨立建國是

¹²⁵ Colin Mackerras. 2009. "The 'China Threa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ise: A view from Australia." In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emo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version of Macau, May 10-13, 2009,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一個重要的大事件，其中國研究也在過去多年的印中交流歷史基礎上得到更大的發展；1962年印中之間爆發戰爭，導致雙方關係陷入停頓，這同時是印度中國研究一個關鍵的分水嶺，或謂之轉向。自此之後，印度的中國研究更開始著重在社會、政治、軍事與外交方面的領域，許多對於當代中國的研究、以及最重要的幾個中國研究單位都是在這之後設立。80年代後隨著印中兩國關係逐漸恢復，同時印中的經濟在國際表現也日益亮眼，在經濟、軍事與許多層面上雙方也開始有更多的合作，包括學術方面的交流，因而印度的中國研究得到更大的突破與發展。整體言之，印度的中國研究可謂從文化和宗教領域開始，當印度建國之後更擴展對社會、政治、經貿方面，而依據其發展脈絡則可以找出三條路線。一條是源自於精神文明的路線，這是由泰戈爾所奠基的傳統。這條路線主要關懷的是中國與印度可以相互比較的特色，以及關懷中國與西方的普遍發展模式如何不同，主要關乎文史哲宗教等面向。另一條則脈絡則可溯源於甘地反殖民的民族主義傳統，其主要關懷為中國的國防與實力可能對印度造成的影響，以及著重探討印度的因應之道。這兩條認識途徑並各自孕育出「親中」、「反中」兩種傾向（石之瑜等，2009：122-126）。第三條脈絡則是對改革、經濟的研究，已經逐漸形成氣候。

1918年，加爾各答大學在其「印度歷史與文化」的碩士學程中首開「中國語言與文學」課程，這是印度近代最早在課程中開設關於中國研究的記錄。不過由於教師資源的缺乏，學校後來並沒有進一步增設相關課程。1924年，泰戈爾訪華，在中國結識了一批中國學者，並對中國文化產生極高的興趣，他在返國之後並從法國聘請學者 Sylvain Levi 為其在 1921 年於聖蒂斯坦（Santi Niketan）創立的國際大學（Visva Bharti）擔任客座教授，講授「中國佛教」課程。經由相關學者的努力，中國研究開始在印度得到發展（Kamal Sheel 著、崔燕慧譯，1999：434）。

30年代初期，經由中國學者譚雲山（Tan Yun - Shan）與泰戈爾等在印度的奔走以及在中國的學者號召響應，「印中學會」以及「中印學會」分別在 1934 年的國際大學以及 1935 年的南京成立（泰戈爾擔任印中學會主席，尼赫魯擔任

名譽主席；蔡元培擔任中印學會理事會主席，戴季陶擔任監事會主席），印中雙方並展開諸多交流與合作計畫，其中包括在國際大學設立中國研究中心（House of China）（郁龍余，2000：121）。1937年，中國研究中心正式成立，這也是第一個以中國為系所名的記錄。潭雲山並被任命為中心主任，負責領導，時逢返印度的中國研究學者巴克齊（師覺月，P. C. Bagchi）的加入，在兩位的努力下，印度的中國研究更是得到進一步的推進，並成為孕育許多印度中國專家的搖籃。

二次大戰期間，儘管中國面臨日本的侵略而使得許多學術機構往重慶以及南方遷移，不過雙方的交流仍然持續，1939年尼赫魯訪問中國以及1942年蔣中正在的回訪印度，更是受到兩國的人民以及學術界的歡迎。當時駐重慶的印度將軍K.P.S.Menon還設立了一個交流計畫，協助印度學生以及學者到中國訪問；同時，在浦那（Pune）也成立了弗格森學院（Fergusson College），主要從事中國佛教經典的研究（Kamal Sheel 著、崔燕慧譯，1999：435）。

印度獨立建國之後，對於國內事務有了更大的自主權，於國際的能見度更是大開，對於中國的研究也有了有全新的需要，1948年，「印度國際學院東亞研究部」的成立開啓了對當代中國的研究（該學院後來與尼赫魯大學合併，原來的中國部（China Section）成為尼赫魯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東亞研究中心，許多印度第一代的現代中國研究專家都是在此接受訓練的）；1958年，德里大學佛教研究學系也開始了中國研究的計畫（Tankha 著，張燕暉譯，2007：76）。然而，在50-60年代這段期間，印中的關係卻也因為西藏問題以及其衍生的邊界爭議而開始屢生衝突，1962年更因此爆發了戰爭，而使得兩國關係陷入停頓。

在印中戰爭之後，印度政府本著了解敵人（know thine enemy）的精神，決定進一步加強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在國際關係上與美蘇也有了較多的往來，並獲得了美國福特基金會的協助。福特基金會提供資金贊助，提供獎助學金供人前往美國的大學接受訓練，並在返國後投入學術界作中國研究。這個時期主要有兩個重要的研究機構成立，一個是國際研究學院，一個是德里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國際研究學院是1964年將原來的國際學院東亞部合併到尼赫魯大學中成立的；德

里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則由譚雲山之子譚中 (Tan Chung) 負責籌辦，一開始附屬於德里大學佛教研究學系下，1964 年才另外獨立成為中國研究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系成立時是 V.P.Dutta 教授擔任系主任，1971 年改由譚中擔任，該系後來又在日本基金會 (Japan Foundation) 的經費提供下加入日本研究，並改名為中日研究系 (現在已經改名為東亞研究系)，¹²⁶而逐漸發展成為區域研究中心的型態。整體來說，這兩個學校都側重對於當代中國在社會、外交、政治方面的研究，並且都是印度目前絕大多數從事現代中國研究學者的母校 (Kamal Sheel 著、崔燕慧譯，1999：434)。

70 年代末期，位於瓦拉納西 (Varanasi) 的貝拿勒司印度大學 (Banaras Hindu University) 在 Hsueh Lei 的領導下於外文系中設立了中文與中國研究部，從事中文教學，並著重對中國佛教和現代中國的研究；而位於昌迪加爾 (Chandigarh) 的 Panjab 大學也在 P.L.Mehra 的主持下設立了中文系，該系強調中文以及藏文教學，並著重對中國邊境喜馬拉雅山地區的研究 (Kamal Sheel 著、崔燕慧譯，1999：435)。

80 年代後隨著印中之間逐漸恢復交流，印度的中國研究也開始探討中國的改革經驗以及發展模式，並用以思索印度的情況；90 年代之後由於印中之間各自經濟的成長，以及雙方在各方層面合作的加強，印度的中國研究也更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前往中國的留學生增加，許多關於中國研究的機構也不斷的成立，這個趨勢至今未歇 (Mohanty 著、山佳譯，2004：72-73)。

而在這些之外，自 1970 年起，來自德里大學的譚中、Giri Deshingkar、Mira Sinha Bhattacharjea、Krishna Prakash Gupta、Manoranjan Mohanty，以及尼赫魯大

¹²⁶ 譚中是印度近代中國研究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推手，在他擔任德里大學中日研究系主任的期間，他加強學生的中文能力 (成立速成中文班 intensive course in Chinese Language)，要求得到碩士學位的印度學生必須要能以中文為研究工具；同時也到歷史系和政治系的碩士課程中去增設中國課題方面的課程。1978 年，他轉到尼赫魯大學後，也從各方面提升了該校中國研究的能力。整體來說，譚中不但促進了印度中國研究的能力促進了印度統治菁英對中國了解，另一方面，他也在那個印中氣氛詭譎的年代緩和了印度的反華情緒。可參閱「譚中」訪談稿，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網址：<http://140.112.150.151/RAEC/act02.php>，檢索日期 2010/07/18。

學 G.P. Deshpande，甚至是外交部的官員等這些共同對中國研究有興趣的學者官員就開始每週聚會一次，針對不同的中國議題召開討論會議長達 20 餘年，而形成一個跨領域的非正式中國研究討論小組，並出版《中國述評》(China Report) 雜誌。¹²⁷ 1991 年，德里大學中國研究所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的成立，更是這個討論群體以及印度中國研究進一步發展的象徵。其他還有防衛研究與分析研究所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is, IDSA)、印度文化國際研究院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以及甘地夫人國家藝術中心東亞部 (East Asian Section, Indira Gandhi Center for National Arts) 等，也都是目前印度中國研究相當重要的單位 (Kamal Sheel 著、崔燕慧譯，1999：436)。

二、印度西藏問題研究與印度中國研究之關係

經過比較，可更清晰的理解到，印度西藏問題研究與其中國研究關係密切，但並不能將問題研究單純地視為是中國研究的一部分。理由有幾點，首先，印度西藏問題研究主要有兩大脈絡，一者是西藏學，一者是中國研究。西藏學的在印度的發展主要起源於 19 世紀，比其中國研究的開啓時間更早，兩者乃是發展於不同的研究背景脈絡中。不過，兩者最早研究的領域都是針對佛教（這再次印證佛教作為印藏中三者文明的聯繫），而且也都與加爾各答密切相關（西藏學以此地為發源，加爾各答大學也都是最早開啓西藏學與中國研究的學校）。

第二個是，從事印度西藏問題研究的學者（如 Mira Sinha Bhattacharjea、Krishna Prakash Gupta 等）以及其發表的研究平台（China Report、IDSA 等）雖然與中國研究有諸多重疊之處（這再次說明西藏問題與中國關係密切），不過，西藏問題研究更有來自以國際關係為核心與以西藏研究為核心的平台。而且印度的西藏學也從歷史、宗教、社會等不同面向對西藏問題作出探討；另外，隨著流

¹²⁷ 「譚中」訪談稿，台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網址：<http://140.112.150.151/RAEC/act02.php>，檢索日期 2010/07/18。

亡藏人定居印度社會已久，在印度也尚有其他學科領域對藏人的狀況感興趣者。簡言之，印度西藏研究的發展時期較長，學科發展更完善，其在對西藏問題的研究上也同樣顯現出具有跨學科領域的性質，足以與中國研究分庭抗禮；而藏人流亡印度以及周邊地區，更是無形中將西藏問題的範圍擴大，並對這些地區的人有實質生活上的影響，研究在背景回溯上雖然必須探討到「中國」，卻也未必會將核心焦點僅侷限在其中。

整體來說，印度的西藏問題研究可視為是印度西藏研究以及中國研究的交會，其研究觀點與成果相互影響，而共同構成了印度的西藏問題研究。同時，經由對問題的研究，西藏學以及中國研究也可相互對話，並精緻補充各自內部的研究成果。

第四節 澳洲西藏問題研究與澳洲中國研究 之比較

一、澳洲中國研究發展概說

澳大利亞中國研究的發展，依據時期先後來看，可從最早 1918 年雪梨大學設立東方語文學系研究開始，而進一步劃分成「傳統漢學興起」（約 1918-1949）、「現代中國研究初步確立」（1950-60）、「中國研究繁榮發展」（1970-80）、「以及「持續發展」（1990 之後至今）等四個部分。並可以用「『借鑒』國外中國研究的發展」、「『引進』國外中國研究的人才」、「培養『本土化』帶有澳洲特色的中國研究」三者作為貫穿的描述主線。¹²⁸整體言之，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而且雖然相對來說起步晚，卻在很短的時間內發展迅速，並已成

¹²⁸ 胡再德，2005，《澳大利亞中國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為當前世界中國研究的重鎮。它從傳統的漢學研究（文學、歷史等）開始，而逐漸擴大到對整個當代中國的研究（政治、社會、經濟等），並著重學科跨領域整合，至今，其研究範圍並不侷限於漢文化，而是關於整個中國的知識。並且，隨著澳中經貿的成長緊密，這種情況更是明顯；其學術社群的建立乃是從早期非常依賴聘請外來學者協助澳洲本地學術研究而開啓，借鑒參考其他國家的學術成果、學術思潮與研究方法而不斷發展與培訓，而逐漸到有澳洲本地學者產生。綜觀來看，在當前全球當代中國研究中，澳洲的研究成果與成長速度最多最快的，同時也是許多重要的中國研究期刊如《中國研究》（China Journal）、《現代亞州》（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等，與知名的亞洲研究機構如澳大利亞亞洲協會（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澳大利亞中國研究協會（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的所在。

在二次大戰之前，澳洲的中國研究主要是附屬於以日本為主的亞洲研究下，當時沿襲英國牛津以及劍橋的漢學傳統，強調掌握文本的閱讀技巧，並以此作為文學、哲學和歷史等學科的基礎。1918年雪梨大學東方語文學系所開啓的中文計劃就是依此模式設立。¹²⁹另一方面，由於早期澳洲與中國的交流並不密切，因而澳洲人對中國的認識也相當賴新聞媒體的報導，包括記者莫里循（George Morrison）以及端納（William Donald）等人¹³⁰先後對清末中國以及中國抗日時期狀況的描述。

二戰之後，國際上冷戰格局壁壘分明，澳大利亞在《澳紐美條約》、《東南亞

¹²⁹ B. Hooper, 2001, 〈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 參閱網址：

http://www.asap.unimelb.edu.au/aah/re-search/review/b6_hooper.html, 檢索日期 2010/07/20.

¹³⁰ 莫里循 (1862-1920) 1897 年開始擔任《泰晤士報》(The Times) 駐北京記者，親身經歷過戊戌變法、義和團、八國聯軍、辛亥革命等事件，也曾擔任過袁世凱的政治顧問。他在中國期間所撰寫的日記、備忘錄等以及當時所收藏的任何用西文撰寫關於中國的資料是後人研究清末中國的重要文獻，後來並被用以成立「莫里循書庫」。1932 年，旅澳華人為了紀念莫里循對中國的報導以及為了喚起澳洲對中國文化的重視，而開始舉辦「莫里循講座」，該講座一年一次並持續至今，而且已發展成為澳洲中國研究的重要聚會；端納(1875-1946)曾先後擔任過香港《德臣報》、《紐約先鋒報》、《倫敦時報》以及《倫敦前驅報》等駐中國特派記者，也曾擔任過岑春煊、孫中山、張作霖、張學良與蔣介石等人的顧問，他在記者生涯中最重要的報導是日本對中國的諸多政策發展，以及西安事變。可參閱胡再德，2005，《澳大利亞中國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頁 28-34。

集體防務條約》的簽訂後更是確立了外交上主要追隨美國的路線，不過，澳洲的中國研究仍然持續發展，也開始注意共產中國的行動。這時期傳統漢學不但有了更大的進步，關於當代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等領域的研究也逐步發展。例如，1949年，澳洲國立大學聘請在中國長期居留過的費子智(C.P.Fitzgerald)為講師，並在1952年於該校太平洋研究院下設立遠東歷史系，由費氏出任系主任。費教授退休之後，王賡武(Wang Gunqwu)教授進一步承繼發展之；¹³¹另一方面，1953年，坎培拉大學院(1960年被併入澳洲國立大學)也從瑞典聘請國際漢學家高本漢的學生畢漢思(Hans Bielestein)擔任該校東方語文研究講座教授，繼任者並先後有瑞典語言學家馬悅然(Goran Malmqvist)與柳存仁(Liu Ts'un yan)等，同時期雪梨大學也從英國聘請A.R.戴維思(Davis)，這些學者共同奠定影響這時期澳洲的中國文學研究。¹³²整體來說，澳洲在50-60年代外交上逐漸從英國路線轉向美國路線，並在經濟上意識到亞洲地區的發展開始蓬勃，而開始試圖與亞太地區有更大的結合，以及關注亞太地區的事務。

70-80年代隨著白澳政策的廢除，澳大利亞更加重視與亞洲的關係，而澳中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也無形中推動了澳洲的中國研究。除了原來的澳洲國立大學以及雪梨大學兩個研究重鎮外，許多學校這時期也開始設立中國研究中心或是亞洲研究中心，許多關於中國的研究刊物也紛紛創刊。這時期創立的中國研究刊物包括：1961年雪梨大學亞太研究院主辦的《澳大利亞東方學會雜誌》(The Journal of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1970年澳洲國立大學創辦的《東亞歷史》(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以及同年創立並享譽國際的(澳洲國立大學也在美國福特基金會贊助下成立了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並創辦)《澳洲中國事務期刊》(The Australia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1995年改名《中國雜誌》The China Journal)

¹³¹ 費子智早年專注於中國中古史及雲南少數民族，在澳大任職後致力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遠東歷史系剛創立時，歷史、文學以及語言都是該系使用的方法論。王賡武接任費氏職位後，確立了以歷史學為中心的研究方法學。何漢威，1983，〈澳洲國立大學的漢學研究〉，《漢學研究通訊》，頁185-186。

¹³² 雷金慶，2003，〈澳大利亞中國文學研究50年〉，參閱網址：<http://www.anu.edu.au/asianstudies/chinakoreacen/csaa/Louie.pdf>，檢索日期2010/07/21。

等。¹³³同時，隨著澳大利亞中國研究人員的增加，澳洲也在 1975 年與 1989 年先後成立了澳大利亞亞洲研究協會（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以及澳大利亞中國研究協會（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等。¹³⁴

90 年代後，隨著中國的經濟在世界的崛起，澳中在經貿領域的合作也越來越盛，這同時也影響到其中國研究，使得越來越多具社會科學背景的學者加入中國研究的領域，至今仍然如此。這時期主要有大衛·古德曼（David Goodman）、安戈（Jonathan Unger）、陳佩華、白杰明（Geremie R. Barne）等學者在不同面向的努力。其中，白杰明提倡後漢學，主張從中文語境出發探討中國，強調澳洲人也可以是某種意義上的中國人，認為任何有興趣中國研究的人只要從中國的脈絡出發都可以進行中國研究，是一個潛力深遠的概念。澳洲前總理陸克文於 2010 年 4 月 23 日第 70 屆莫里循講座上也再次強調這個概念對澳洲中國研究的重要性。¹³⁵另一方面，1994 年雪梨理工大學國際研究所發起了一個有關改革中的中國各省的研究課題，並在 1998 年進一步與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合辦中國省份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Provincial China, UNSW-UTS），試圖發展以「省」為單位的中國研究以及建立直接與中國各省接觸的管道，並一度發行《省級中國》（Provincial China Journal）雜誌，也是這時期的澳洲中國研究的發展（劉霓，2006：360）。

除了上述這些研究單位之外，還不可忽略澳洲政府以及從事亞洲和中國研究的各協會各機構提出的檢討報告所發揮的指導性效果，它們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研究在高等教育的發展或是國家在學術資源上的投入。這些包括政府提供資金協助亞洲研究委員會和澳大利亞全國亞洲語言學習工作組（NALSAS），它們致力推動澳洲人對亞洲語言以及亞洲事務的關心與認識（Mackerras 著、劉明新譯，1997：78-79）；以及 1970 年的「奧克馬蒂報告」（Auchmuty Report）、1980

¹³³ 何漢威，1983，〈澳洲國立大學的漢學研究〉，頁 186-187。

¹³⁴ B. Hooper，2001，〈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參閱網址：

http://www.asap.unimelb.edu.au/aah/re-search/review/b6_hooper.html，檢索日期 2010/07/20。

¹³⁵ 可參閱網址：<http://pmrudd.archive.dpvc.gov.au/node/6700>，檢索日期 2010/07/14。

年的澳大利亞亞洲研究協會報告、1984 年的亞洲研究理事會的國家戰略報告、1989 年的「英格爾森報告」(Ingleson Report)、1992 年的澳大利亞中國研究協會的「中國研究國家戰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hinese Studies)以及 1994 年的「拉德報告」(Rudd Report) 等。¹³⁶

二、澳洲西藏問題研究與澳洲中國研究之關係

現在更能精確的掌握澳大利亞西藏問題研究的內涵以及其與澳洲中國研究的關係，質言之，澳洲西藏問題研究不但與中國研究密切，而且也可以視為是其中的一環。理由有幾點，第一，雖然在澳洲的西藏學以及中國研究是兩個不同學科，而且在澳洲從事西藏問題研究者分別來自「西藏研究」和「中國研究」兩個不同的核心，不過，澳洲的西藏研究跨學科性質不高，主要僅涉及藏語文與哲學方面的探討，而少有對政治事務方面的研究。相反的，澳洲的中國研究不但發展完善，其跨領域性質更是明顯，因而，少數偏重於政治方面的「西藏問題」者（以及立基於澳洲政府承認西藏屬於中國一部分）研究成果均與中國研究較為密切。

第二，澳洲對西藏問題的關注主要起源於 50-60 年代，根據早期涉及西藏問題研究的著作《對中國的恐懼》一書，以及當時人對該書的討論，可發現其間的問題意識主要在解答澳洲究竟該如何面對共產中國，而非專題式的討論西藏問題，這其實與當時的中國研究脈絡關注共產中國的行動是相關的。

第三，當前澳洲的文獻中多有從人權面向關懷西藏問題的發展，不過，問題多放在中國研究的框架下，把藏人視為是中國「少數民族藏族」，而非是獨立的

¹³⁶其中，影響較為深遠的是 1989 年的「英格爾森報告」以及 1992 年的澳大利亞中國研究協會的「中國研究國家戰略」。前者由曾任澳洲亞洲研究協會主席 (ASAA) 的約翰·英格爾森提出，主要分析 80 年代當時澳洲大學中的亞洲研究以及語言的教學狀況，並提出了三項建言，分別是：呼籲培養具有亞洲意識或以亞洲為中心的研究人員、呼籲政府與大學長期開展有關亞洲及其語言的教學，以及呼籲大學評估檢視其關於亞洲課程的授課方式，並擴大課程內容範圍；後者則是由格里菲斯大學的馬克林執筆發表，系統性地闡述澳洲推動中國研究的必要性，並分析當時澳洲的中國研究現況，並提出從各方面都應更加推進對中國（包括華人世界）的認識。劉寬著、收於何培忠編，《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北京：商務，頁 351-356。

「西藏人」。

基於上述理由，澳洲的西藏問題研究應可被視為是澳洲中國研究的一環，其研究成果可以補充澳洲的中國研究。而澳洲的西藏研究則少談這部分。

第五節 小結

本章在第二節綜合性的探討印度西藏問題研究與澳大利亞西藏問題研究之差異，並在這之後進一步分別在第三節、第四節與印度和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作比較，以釐清二者之關係。

結果發現，在印澳之間的比較上，可以區別出兩者主要有四項差異，首先表現在研究發展狀況的差異性，這指的是印度的研究成果數量多而澳洲較少；其次是西藏問題研究學科領域與方法論上的辨識度有別，可發現印度不明顯而澳洲明顯；再其次是對西藏問題論述明顯不同，即印度主要意識到西藏的國家主體性而澳洲主要意識到西藏在中國的地方主體性；以及中國認識內涵大異其趣，印度總是將自己涉及到與中國的關係而澳大利亞則較少有這類的傾向。而影響這四項差異背後的結構性因素，則主要來自於印、澳在地理上與藏 / 中的相對位置，以及印澳兩國的建國經驗等。

第三節探討印度中國研究的發展狀況，並經過與其西藏問題研究比較之後，發現兩者關係密切，但不能輕易地將其西藏問題研究視為是中國研究的一環，應當視為是西藏研究與中國研究的交會。

第四節發現，由於澳洲在西藏研究上多偏重文化、哲學方面的研究，而較少涉及對政治事務的探討，這因而使得澳洲的西藏問題研究在主題議程的發展上更被視為是其中國研究的一環。

正如本論文第一章中所說的，西藏問題乃是一個本質不明確，且已跨越國界的問題，以當今發展而言，更幾乎無法在回答西藏問題時迴避對中國的看法。依

據個人（與國家）與中藏之間不同的來往經驗，不但會影響形成不同的認知，這中間，行爲者依其認知涉入問題後，則更容易造成不同層次的影響。其中，國家環境與歷史經驗等的結構性因素主要作用在議程設定的開展上，其效果遠大過於個人的經驗作用，是故從這方面而言，研究者在開展其研究時，其議題的選擇與論述的特色方面的能動性受到侷限，而不容易跳脫原有的視野。然而，若從研究觀點而言，研究者的能動性仍然不斷展現，這些均從印度與澳洲的文獻當中發現不一樣的西藏問題論述以及中國觀的例子中可以看到。



第六章 結論與展望：

從西藏觀察中國（See China through Tibet）VS.在西藏發現中國（See China in Tibet）

本研究爬梳印、澳學界西藏問題研究，印證每一種學術議程的發展背後其實都源自於特定的情境脈絡，而這情境脈絡與研究者本身所處的時空位置等條件又有極大的關聯，例如印度對西藏的研究具有國家需要的背景，而澳洲則早先源自於冷戰時期對中國的關注，後來則是出自於研究者關懷中國境內的狀況或是從掌握地方主體性來了解整個中國。主題議程的推動可能是在有意或無意之間發生，但卻往往對後來的研究者產生了很大的制約效果。這種無形間形成的結構氛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研究者在主題框架上的選擇，投入的學術資源與心力，甚至方法論途徑上的採取，以及論述的共同特色。不過，這依然不否定個別學術研究者的能動性，因為從結論來看並沒有被決定，論述與觀點也非一致。透過比較不同的學術社群研究成果，不但有助於參考借鑒其他學術社群如何探討相關議題，更能協助認清自我在研究過程中的位置，以及可能遭遇的困境，並進一步打破原有框架而使得學術視野獲得更大的拓展空間。本研究在初始時選擇印度與澳洲作為研究對象，即是試圖跳脫台灣過去長期從冷戰結構與中原視角看待西藏問題的框架，進而發現不一樣認識西藏問題的方式與觀看中國的角度。

中藏與印度各有長遠悠久來往的歷史，西藏不但與印度有半邊國土接鄰，長期以來作為印中之間的緩衝地，同時也是印中兩大文明的過渡帶。就認知而言，西藏是與中國不同文明且具備與他國交往能力的主體，既然印度與中國俱為國家，那麼西藏也理當擁有類似的地位，何況歷史上證明了西藏是一個與印度極為友好且具有文明共通性的鄰邦？而且，基於這種印藏文明上的聯結，印度政府對

於流亡藏人所提供的各項援助，幾乎是少有其他國家可以比擬。它不但與流亡政府合作，提供協助藏人安置與就業，更在印度教育部成立西藏教育委員會，負責贊助所有藏人學校教材與資金費用。其他還有成立西藏家園基金會協助藏人兒童教育、唐卡藝術，以及在鹿野苑成立中央高級西藏研究院，在達蘭薩拉建立羅布林卡機構等，均顯見其協助保護藏人文化之用心。筆者於達蘭薩拉作田野調查的期間，逢其舉行「謝謝你喜馬偕爾邦」流亡六十年紀念會，在典禮上，印度官員與流亡政府官員並肩而坐，會場上也混雜著許多藏人與印度人，感覺難分彼此。與大寶法王會面時，他說：「我真的很訝異，印度待我們幾乎就像自己人，甚至連在文明上都把我們當作它們的一部份了！」如果從印度的拉達克到錫金、達旺一帶皆主要以西藏佛教為信仰來看，大寶法王的說法並沒有太大問題，「西藏」某種意義上確實成為印度的一部份。

印度與中國一直以來在亞洲事務上扮演吃重的角色，對於周遭地區的物質與文明俱有重大的影響。經過西方帝國主義與現代化的洗禮，印中先後轉型成為現代主權國家而紛紛建國，在中共出兵西藏後，印度學界除了有西藏主體遭到吞併的認知外，更在主權國家邏輯的思維下對於兩大國相鄰而有極大的焦慮感，何況1962年間雙方實際地發生了一場戰爭，因而對中國動態關注的重要性在冷戰期間也絲毫不下於對美蘇行動的觀察。即便在中印各自展開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後，以及自80年代以來多次的高層互訪與領土談判，雙方也均有意加強雙邊經貿合作關係，但容易挑動神經的爭端始終存在，「擱置爭議」的策略也往往在時而有心的手段下失去效果。

觀察印度學界西藏問題研究文獻，除了發現其均難以迴避對印中關係的探討，而且也多有流露出解讀中國行動的意義與思索印度該採取何種因應措施。這樣的研究視野帶給認識中國的啓示是，印度實質上是透過西藏觀察中國（See China through Tibet）。而且這樣的觀察很大一個意義並不僅出自於深層關懷（與印度有共通性的）藏漢文明互動的意義上，而更有來自於主權國家邏輯觀察強鄰的動機。對於中國文明的內涵性質，印度並不特別需要透過西藏來了解，因為對

於中國的認知印度早已在歷史的交往過程中形成，而視其為一個足以與印度抗衡的漢（中華）文明，是與西藏、印度俱為不同的文明，而現在則與印度同樣具有文明與主權國家兩種身分。從文明面的角度而言，透過西藏問題的實例，印度實在思索轉型成主權國家的中國文明如何可能與鄰邦互動，並是否可能夾雜傳統的中華帝國天下觀？而純從戰略安全的角度來看，印度透過西藏觀察中國的目的，更主要有基於印度國家本身的需要，對當今印中兩國領土接鄰，並著眼於穩定當今印度邊境安全的理由。由於印中兩國均力圖成為大國，而就其各方面的狀況勢也可預見雙方未來在各方面會有更多的接觸，因而透過對西藏情勢的觀察，印度乃從中多獲得一個掌握了解中國動態的管道。

相形之下，澳洲則處在完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澳大利亞是一個新興國家，在地理位置上相對偏遠於中國與西藏，早期的歷史當中兩者也俱不是其主要來往的對象。從學科發展的角度而言，一開始投入研究中國和西藏相關的議題並不積極，而多主要是個人自發性投入相關研究者。在冷戰格局形成後，共產中國建立，澳洲在為了解讀中國行動的目標下開啓了西藏問題研究的議程，但當時主要作為用以解釋中國行動的一個案例，細部的情形其實並不被探討。然而，隨著西藏問題在國際上不斷發酵，以及伴隨著澳洲國家定位在 70 年代後的自我轉型，澳洲對亞太事務的關懷轉趨積極。而澳中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以及雙方的經貿關係在這數十年間越來越緊密，在整個國際政經大環境的變遷促成下，澳洲的中國研究有了突飛猛進與驚人的表現。當這一點聯結到澳洲國家的轉型經驗，以及西藏問題的高度國際能見度，是許多研究者開始對於中國內部民主化，而或進一步著重西藏境內的人權狀況、宗教自由等相關議題投入的重要原因。

澳洲在歷史上與中藏互動來往的經驗並不同於印度，對於中國與西藏的主體性認知也有所不同。觀整體澳洲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而言，發現其視中國為一個具備多元文明性質的國家，並賦與西藏地方主體性的地位。這是受到基於西方脈絡而又歷經國家轉型經驗的影響，使得澳洲文獻所流露出來的特殊之處。研究者深入西藏地區，從中發現對西藏情勢演變的探討並不能單純以國家—地方的角度

觀之，而當還須從各種細部因素考量。可以說，澳洲的研究者乃是企圖透過解構中國的方式，而達到掌握與了解中國是什麼的目的。這樣的研究視野帶給認識中國的啓示是，透過澳洲的西藏問題研究，澳洲乃在西藏當中發現中國（See China in Tibet）。對澳洲的研究者而言，實際的狀況是，西藏確已經構成了當代中國國家內部的一部分，並且是意欲了解這樣一個多元複雜國家政經情勢與內部文明組成的重要途徑。刻意忽略掉西藏的存在，中國將不再會是「真正的」中國，也因而不可能聲稱能掌握中國的內涵。

而除了從知識的角度上澳洲透過對西藏的研究得以了解中國是什麼，另一方面，澳洲學界的文獻特別留意於西藏地區人權發展狀況，則更是顯現出對於普世人權與少數群體權利的積極關懷，而蘊含了對人類邁向更美好境地的期許，這反映了澳洲國家對於尊重多元差異的經驗深入社會人心，影響到研究者看待事物的價值。

整體言之，本研究從第二章西藏問題的形成背景開展探討，經從西藏問題本身進入印度與澳洲兩種不同的學術脈絡，從文獻中分別顯現兩地學術界如何看待西藏問題，以及所透露出來的中國觀。並在第五章進行宏觀與微觀層次的比較。歷經這樣的過程，更從「比較」的過程當中獲得印、澳兩種認識中國的啓示。儘管印度與澳洲兩者過去俱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如今學術社群也都仍以英語作為主要寫作語言，也都有接納流亡藏人定居本國，然而兩國卻在歷史的過程中各自發展出截然不同的局面，並開創出各自不同於母國的能動性。伴隨著國際大環境的變遷，從後冷戰世界乃至於到後美國世界的局面，而中國正被視為將在未來在國際上擔任更重要的角色，印度與澳洲兩者也俱在國際能見度上提升了各自的地位，這些一波波不斷新出現的要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印度與澳洲各自和中國的關係，以及它們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與態度。

面對內涵如此複雜，跨越國際性，又實質上悠關數百萬人命運的西藏問題，不同的研究者對其各有看法，本研究至此已從學術的角度盡一份努力。未來，立基於現有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再從印度，或是從澳洲，甚至是其他國家文獻的角

度，從地緣政治學、文明政治學，以及區域研究等多種層面，透過西藏對於何謂中國作出更深廣面向的探討，則是值得研究者爾後努力的方向。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 山口瑞鳳著、許明銀譯，2003，《西藏》，台北：全佛文化。
- 亢升，2009，《印度—崛起中的亞洲巨象》，香港城市大學。
- 王家偉、尼瑪等，2000，《中國西藏的歷史地位》，北京市：五洲傳播。
- 王力雄，2009，《天葬》，台北：大塊。
- 王小彬，2009，《經略西藏—新中國西藏工作 60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 王宗安，2008，〈達賴喇嘛與中共談判之癥結分析〉，《中國大陸研究》，Vol.51(1)，頁 103-117。
- 王貴、喜饒尼瑪、唐家衛，1997，《西藏歷史地位辯》，北京：民族出版社。
- 伍昆明編，2006，《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廈門市：鷺江。
- 外交部檔案叢書—界務類第五冊西藏卷(一)，2005，台北：外交部。
- 外交與新聞部，2008，《西藏流亡政府簡介》，印度：達蘭薩拉。
- 石之瑜、黃威霖、余帛燦，2009，〈印度知識界面對中國的深層視野〉，《國外社會科學》，2009 年第一期，頁 122-126。
- 石之瑜，2010，〈文明是國際關係問題嗎？亞州學派國關理論的不可行性〉，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
- 石泰安著，耿昇譯，1999，《西藏的文明》，北京：中國藏學。
- 何包鋼、沙柏力，2007，《達賴喇嘛的新自治論》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十五卷第二期，頁 1-32。
- 何漢威，1983，〈澳洲國立大學的漢學研究〉，《漢學研究通訊》，Vol.2(3)，頁 185
- 吳敬恆、王雲五、蔡元培編，1933，《西藏問題》，上海：商務印書。
- 呂秋文，1999，《西藏政治地位》，台北：蒙藏委員會。

- 汪詩明，2003，《20世紀澳大利亞外交史》，北京：北京大學。
- 胡再德，2005，《澳大利亞中國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范明，2009，《西藏內部之爭》，西港：明鏡。
- 郁龍余，2000，〈中國學在印度〉，《學術研究》，2000年第一期，頁120-123。
- 孫克信，1997，《西藏之昨天與今天》，台北：唐山。
- 張秋生，1999，《澳大利亞與亞洲關係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張雲，2008，《西藏歷史問題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 張靜宜，2009，《歐洲聯盟對中國人權政策之探討—以對「西藏問題」之政策為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 張駿逸，1990，《美國在西藏問題上的角色分析》，台北：蒙藏委員會。
- 張永攀，2007，《英帝國與中國西藏(1937-194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 許嘉裕，1997，西藏地位問題爭議之研究，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牧民，2009，《國際安全理論—領土、主權與威脅》，台北：五南。
- 陳姿潔，2009，《南方的中國學？從費約翰到澳洲特色的中國學研究》，台北：台灣大學政治所碩士論文。
- 陳繼東，2003，《西藏開拓南亞市場及其特殊性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 曾彥中，2009，《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以安戈及何包鋼的學思歷程為例》，台北：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有形，2010，《在整體中發掘個體：馬克林與他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 解放西藏史編委會，2008，《解放西藏史》，北京：中共黨史。
- 《國家地理雜誌》，2009年5月號，台北：海峽文化事業。
- 楊以彬，2001，《中共對外關係中「西藏問題」之研究》，政大外交系碩士論文
- 楊開煌，1999，《達賴喇嘛「西藏問題」國際化之策略分析》，台北：蒙藏委員會。
- 達賴喇嘛（Dalai Lama）著，唐鼎譯，1997，《流亡中的自在—達賴喇嘛自傳》，台北：聯經。

- 達賴喇嘛 (Dalai Lama) 著、丁一夫譯，2010，《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台北：台灣圖博之友會。
- 達賴喇嘛陛下宣傳部，1983，《流亡藏人》(1959-1980)，成都軍區政治部群聯部。
- 劉霓，2006，〈澳大利亞的中國學〉，收於何培忠編，《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北京：商務
- 潘美玲，2009，〈印度加爾各答的客家移民〉，《客家研究》，Vol.3(1)，頁 91-123。
- 謝劍，1999，《自決抑整合：中、西對西藏問題觀念的衝突》，台北：蒙藏委員會。
- 謝彬等，2009，《西藏問題》，鄭州市：大象。
- 譚中，2006，《印度與中國：兩大文明的交往和激盪》，北京：商務。
- 蘇嘉宏，2005，《流亡中的民主》，台北：水牛出版社。
- Gupta, Kuranakar. 著，王宏緯、王至亭譯，1990，《中印邊界秘史》(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ino-Indian Frontier)，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
- Goldstein, M.V. 著，杜永彬譯，2005，《喇嘛王國的覆滅》，北京：中國藏學。
- 胡珀著，詹烟譯，2001，〈澳大利亞的中國研究〉，《國外社會科學》，2001 年第五期，頁 83-85。
- M.C.Praag 著，達瓦才仁譯，2008，《西藏的地位》，台北：達賴喇嘛宗教文化基金會。
- Mackerras, Colin. 著、劉明新譯，1997，〈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研究〉，《世界民族》，1997 年第二期，頁 78-81。
- Marshall, Catherine. & Rossman, Gretchen. B. 著、李政賢譯，2006，《質性研究—設計與計畫撰寫》，台北：五南
- Maxwell, Neville. 著，1971，印度對華戰爭，北京：三聯書店出版、新華書店發行。
- Sharad K. Soni & Reena Marwah，吳宗翰譯，2010，影響印度對中國研究的西藏因素，《國外社會科學》，2010 年第三期，頁 75-78。
- 嘉瑪希(Sheel, Kamal.) 著、崔燕慧譯，1999，〈印度中國研究綜述〉，《漢學研究通

訊》，18(4)：433-436。

坦克哈 (Tankha, Brij.) 著，張燕暉譯，2004，〈印度的中國學研究：正在改變的範式〉，《國外社會科學》2007 年第四期，頁 75-78。

譚若思 (Terrill, Ross.) 著、楊明暉、潘勛、王嘉源等譯，2004，一中帝國大夢，台北：雅言。

韋立德 (Wright, Tim.) 著、劉霓譯，2004，〈澳大利亞與英國的中國學比較〉，《國外社會科學》2004 年第六期。

貳、西文部分

1966. "Security of Southern Asia: What are China's aims in Southern Asia? And what can the nations of the region do about them?". *China Report*. Vol.2(2):15-19.

1966. "Tibet: Autonomy or Integration? : The 'Tibetan Revolution' is at an uncertain stage. Peking has tightened its control but its position is not invulnerable in Tibet". *China Report*. Vol.2(2):28-32.

Ahmad, Zahiruddin. 1975.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China in Tibet". *The Tibet Journal* . Vol.1(1):24-35.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Anand, Dibyesh. 2004.*Geopolitical exotica: 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rdley, Jane. 2003. "Satyagraha in Tibet: Toward a Gandhian Solution?" . *The Tibet Journal*. Vol.28(4):23-38.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Baogang, He. & Reid, Anthony . 2004. "Special Issue Editors' Introduction; Four Approaches to the Aceh Question". *Asian Ethnicity*. Vol.15. No.3:.293-300.

Baogang, He .2005."Minority ri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ed. by Will

- Kymlicka & Baogang He. *Multiculturalism in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ogang, He. 2006. "The Dalai Lama's Autonomy Proposal" in ed. by Barry Sautman & June Teufel Dreyer.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Armonk, N.Y. : M.E. Sharpe:67-84
- Baogang, He.& Sautman, Barry. 2006. "The Politics of Dalai's New Initiative for Autonomy". *Pacif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601-629.
- Bhat, Sudhakar. 1967. *India and China*. New Delhi: Popular Book Service.
- Bhattacharya, S. S. 1983. "Tibet's Political Status with China". *Strategic Analysis*. Vol.VI,No.12:721-725.
- Bhattacharjea, Mira Sinha. 1996. "Self-determination for the Tibetan people: A Political Argument". *China Report*. Vol.32(4):353-.361.
- Bhutani, V. C. 1985. "What Boundary Question? Sino-Indian or Indo- Tibetan?". *China Report*. Vol.21(5):427.430.
- Bhutani, V. C.1987." Tibetan Aspirations". *China Report*. Vol.23(3):311-.316.
- Clark, Gregory. 1967.*In Fear of China*. Melbourne : Lansdowne.
- Cooke,Susette .2005. "To Struggle for Freedom is Our Responsibility: Tibetan Nuns in the Chinese State". in Maja Mikula ed. (eds). *Women, Activism and Social Change: Stretching Boundarie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17-135.
- Deepak, B.R. 2004. *India and China 1904-2005*. MANAK, India: New Delhi.
- deVoe, Dorsh Marie. 1981."The Refugee Problem and Tibetan Refugees". *The Tibet Journal* . Vol.6(3):22-42.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 DIIR. 1998. *Indian Leaders on Tibet*. Dharamsala, H.P., India: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 DIIR. 2001. *Tibet and Manchu*. Dharamsala . H.P., India: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 DIIR. 2005. *International Resolutions and Recognitions on Tibet(1959-2004)*. Dharamsala, H.P., India: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 Donnet, Pierre-Antoine,translated by Tica Broch. 1994. *Tibet : Survival in Question*.

London : Zed Books Ltd.

- Ginsburgs, George & Mathos, Michael .1960."Communist China's Impact on Tibet(I)". *Far Eastern Survey*. Vol.29(7):.102-109.
- Gokhale, V. V. 1972." Tibetan Studies in India(A Brief Survey)". *Report of 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No.18:6-8.
- Goldstein, Melvyn C.1999.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Gupta Ram . 1966. *India-China-Tibet Triangle*. Bombay: Jaico Publishing House.
- Gupta, Monu Rani. 2005. *Social Mobility and Change Among Tibetan Refugee*. Raj Publications.
- Gupta, Krishna Prakash. 1971. "China'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vention". *China Report*. Vol.7(6):12-27.
- Gupta, Krishna Prakash . 1972." Indian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a-I a Socio-Historical Analysis". *China Report*. Vol.8(4):29-51.
- Hillman, Ben. 2006." Mca Minority: Masculinity and Ethnicity on the Edge of Tibet". *Modern China*. Vol.32.No.2:251-272.
- Hillman, Ben.2005. "Monastic politics and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 Authority and Autonomy in an Ethnicity Tibetan Prefecture". *The China Journal*.No.54:29-51.
- Hillman, Ben.2008." Money can't buy Tibetans' lov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Vol.171(3):8-12.
- Hillman, Ben. 2009." Ethnic Tourism and Ethnic Politics in Tibetan China". *Harvard Asia Pacific Review*, Spring 2009:3-6.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60.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 A repor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Geneva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 Jain, Girilal. 1970. "China's Dual Approach". *China Report*. Vol.6(4): 12-15.
- Karunakaran, K.P. 1966." China In Indi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Report*. Vol. 2(6): 35-39.
- Kharat, Rajesh S.2003.*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New Delhi: Kaveri.

- Kuleshov, Nikolai S.1996,Russia's Tibet Files.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 Mackerras, Colin. 1988. "Tibet and the Chinese". *Current Affairs Bulletin* . Vol.64.No.12:22–28.
- Mackerras, Colin. 2005.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ckground Paper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Tibetan Population*. In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 Mackerrass, Colin.2003."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in ed.by Mackerras, Colin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Mackerrass, Colin.2005.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Globalisation*.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 Mackerrass, Colin. 2005.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Globalisation*.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Mackerras, Colin. 2009. "The 'China Threa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ise: A view from Australia".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emo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version of Macau*. May10-13,2009.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 Mackerras,Colin. 2010. "Tibet studies in Australia,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s of AA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ibetan Studies*. April 23. New Delhi, India: Association of Asia Scholars.
- Mahapatra, Uma Kant. 1988. "Tibet- groping Toward a Solution" . *China Report*. Vol.24(3):213-220.
- Mattoo, Amitabh.2000. Imagining China, in Kanti Bajpai, Amithabh Mattoo etd., *The Peacock and the Dragon*.:13-25. Har-Anand, India: New Delhi.
- Mehra, Parshotam. 2007. *Essays in Frontier History: India, China, and the Disputed Border*. Oxford, India: New Delhi.
- Mehrotra, L. L. 1997. *India's Tibet Policy*. Tibet Parliamentary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re. India: New Delhi.

- Norbu, Dawa.1988. "Chinese Strategic Thinking on Tibet". *Strategic Analysis*, Vol.12(3):371-395.
- Norbu, Dawa. 1997. "Tibet in Sino-Indian Relations :The Centrality of Marginality". *Asian Survey*.Vol.37,No.11:1078-1095.
- Norbu, Dawa. 2000." India, China and Tibet" in Kanti Bajpai, Amithabh Mattoo ed., *The Peacock and the Dragon*:275-297. Har-Anand, India: New Delhi.
- Norbu, Dawa. 2001."Refugees from Tibet: Structural Causes of Successful Settlements". *The Tibet Journal* . Vol.26(2):3-25.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 Norbu, Dawa.2001. *China's Tibet Policy*. Richmond Surrey: Curzon.
- Patterson, George N. 1960. "China and Tibet: Background to the Revolt". *The China Quarterly*. No.1.p.87-102.
- Powers, John.2004.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xford: Oxford Press.
- Puri, Bharati. 2008." Discourse and Method of the 'Earlier' Dalai Lama and the 'Later' Dalai Lama ". *China Report*. Vol.44(2):175-184.
- Ramachandran, K. N.1980."Tibet in Focus". *Strategic Analysis*. Vol. IV, No.3:101-106.
- Rao, Gondker Narayana.1968. *The India-China Border A reappraisal*. New Delhi, India: Asia Publishing House.
- S.Kharat, Rajesh. 2003,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New Delhi: Kaveri.
- Sen, N. C.1969. "Tibet in India-China Relations" . *China Report* . Vol.5(5):23-29.
- Shakabpa, T. W. D. 1967.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 Lo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ingh, Amar Jasbir .1992. "How the Tibetan Problem Influenc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hina Report*. Vol. 28: 261-289.
- Sinha, Nirmal C. 1983. "Tibetan Studies in Modern India". *Bulletin of Tibetology* .

Vol.19(1):11-15.

Smith, Warren W.1996,*Tibetan Nation: a history of Tibetan nationalism and Sino-Tibetan relations*, Boulder,Colo.: Westview Press.

Strahan, Lachlan. 1996. *Australia's China : 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obdan, Phunchok.2009,An Indian Perception of the Tibetan Situation, *Asia Pacific Bulletin*, No.31

Soni, Sharad K. & Marwah, Reena.2010. “Tibet Factor in India-China Relations : Some Reflections”. in *AA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ibetan Studies*. New Delhi: Center for Policy Alternative.

The Tibet Journal. Vol.5(1&2).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Uberoi, Patricia. 1969. “Australia’s China Policy”. *China Report*.Vol.5(5):.31-33.

Uberoi, Patricia. 1972.”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 conflicting values of the Chinese New Culture Movement”. *China Report*. Vol.8(1-2):54-62..

Verma, Virendra S. 2009. “Post-Dalai Lama Situation and the Middle Path: Discussions with Chinese Scholars in Beijing”. *China Report*. Vol.45(1):.75-87.

Verma, Virendra S. 2009.”Post-Dalai Lama Situation and the Middle Path: Discussions with Chinese Scholars in Beijing”. *China Report*. Vol.45(1):75-87.

Yun- Yuan Yang. 1987. “Controversies over Tibet: China versus India, 1947-1949. *China Quarterly*” . No.111:407-420.

參、其他

Bradshaw, Simon.2010. No Place for Tibet in Rudd’s ‘New Sinology’?. In

<http://www.onlineopinion.com.au/view.asp?article=10406> , 檢索日期

2010/07/09.

John Powers 個人學校網頁，網址：

http://asiapacific.anu.edu.au/people/personal/mortk_ir.php，檢索日期

2010/07/02。

Lafitte,Gabriel.2002. The Tibet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rice of Gas . In

<http://www.abc.net.au/rn/perspective/stories/2002/574937.htm>.檢索日期

2010/07/02.

Lafitte,Gabriel.2008. Tibetans' Suicidal Protest. In

<http://www.onlineopinion.com.au/view.asp?article=7151&page=1>.檢索日期

2010/07/03.

Pandey, Sheo Nandan .2010. “China’s Quagmire on Tibet Issue and the Dalai

lama”.*C3s Paper*.No.466 網址：<http://www.c3sindia.org/tibet/1264>，檢索日期

2010/05/24。

Raman, B.2010. “Why India Maintaining a Low profile in Tibetans’ Hour of

Tragedy?”, *C3s Paper*. No.480 網址：<http://www.c3sindia.org/tibet/1304>，

檢索日期 2010/06/23.

Susette Cooke 個人學校網頁，網址：

<http://datasearch2.uts.edu.au/crc/members/detail.cfm?StaffID=2449>，檢索日期

2010/07/04。

中國研究所網址：<http://www.icsin.org/about.html>，檢索日期 2010/06/11。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網印度當代中國研究網址：

http://www.hprc.org.cn/gsyj/gwddzgyjjg/yindu/200909/t20090911_30778.html，檢索日期 2010/06/11。

印度防衛安全機構（IDSA）網址：<http://www.idsa.in/strategicanalysis>,檢索日期

2010/05/28。

西藏政策研究中心（Tibet parliament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re, TPPRC）網址：

<http://www.tpprc.org/>，檢索日期 2010/06/12。

西藏再覽 (Tibetan Review) 網址：

<http://www.tibetanreview.net/index.php?id=68&type=p>，檢索日期 2010/05/27。

何包鋼 He Baogang 個人學校網頁，網址：

<http://www.deakin.edu.au/arts-ed/sips/staff-directory2.php?username=baogang>，
檢索日期 2010/07/03。

南亞分析群體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網址：

<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The%20Web%20Site.htm>，檢索日期
2010/05/28。

清奈中國研究中心 (The 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CCCS) 網址：

<http://www.c3sindia.org/team>，檢索日期 2010/05/22。

索南塔曲(Sonam Thakchoe)個人學校網頁，網址：

<http://fcms.its.utas.edu.au/arts/philosophy/pagedetails.asp?lpersonId=2144>，檢索
日期 2010/07/18。

陸克文於 2010 年 4 月 23 日第 70 屆莫里遜講座(Morrison)暨澳洲國立大學「中華
全球研究中心」的(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的成立演講致辭，
網址：<http://pmrudd.archive.dpmc.gov.au/node/6700>，檢索日期 2010/07/14。

新華網關於 2010 年 1 月 30 到 31 日兩天達賴喇嘛代表甲日·洛迪與格桑堅讚與
中共統戰部長杜青林舉行最新的一輪會談的報導，網址：

http://tibet.news.cn/xwzt/2010-02/02/content_18939045.htm，檢索日期
2010/08/12。

雷金慶，2003，〈澳大利亞中國文學研究 50 年〉，參閱網址：

<http://www.anu.edu.au/asianstudies/chinakoreacen/csaa/Louie.pdf>，檢索日期
2010/07/21。

對西藏的全政黨會議 (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Tibet)，參閱網址：

<http://www.atc.org.au/>，檢索日期 2010/05/23。

劉國威，2002，〈十三世紀以後進入西藏的印度人〉，《法光雜誌》，152 期，可參

閱網址：<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3/bj013122223.pdf>，

檢索日期 2010/08/01。

澳洲西藏友好團體（Tibet Friendship Group）。協會網址：<http://www.tfg.org.au/>，

檢索日期 2010/09/21。

澳洲達賴喇嘛小組(His holiness of Dalai Lama in Australia)網站：

<http://www.dalailamainaustralia.org/pages/default.aspx?ParentPageID=3&Page>

ID=5，檢索日期 2010/05/23.

藏東訓練機構（Eastern Training Institute）網址：

<http://www.crawford.anu.edu.au/staff/bhillman.php>，檢索日期 2010/07/01。

譚中訪談稿，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網址：

<http://140.112.150.151/RAEC/act02.php>，檢索日期 2010/07/18。



附錄一

西藏流亡政府宣傳部長杜敦桑培 (Thubten Samphel) 訪談稿

時間：2010/04/29 10:30-11:10

地點：宣傳部長杜敦桑培 (Thubten Samphel) 辦公室

受訪者：西藏流亡政府宣傳部長杜敦桑培 (Thubten Samphel)

訪問人：吳宗翰

翻譯：原文為英文，吳宗翰（以下簡稱吳）翻譯，以下以「杜敦」表示宣傳部長的回答

吳：能否簡單介紹印度政府與西藏流亡政府之間的關係？

杜敦：印度政府至今並沒有承認西藏流亡政府，這是一個承襲自英印政府時期的政策。即使如此，在人道的理由（humanity ground）之上，印度政府與西藏政府之間的關係非常的好。自五十多年前我們流亡到印度至今，如果不是在印度的援助之下，我們早已在西藏被毀滅的同時也消失了。現在我們得以重新運作政府、組織社群、教育孩子關於西藏的一切，這個很重要，也得以保存我們的文化，並進一步向西方弘揚佛法。有了這樣的環境，我們可以向我們的下一代持續不斷的教授西藏佛教與西藏的哲學，使西藏難民得以在流亡印度時仍能在有自己文化的環境下成長。另一方面，那些雖然不是藏人，但是也深受西藏佛教與文化影響的人，也因此得以有一個可以前往學習的地方，他們可以來這裡學習西藏宗教、西藏哲學、西藏的語言等等。像是蒙古或是布列亞人，他們就會來這裡學習西藏佛教，因為達賴喇嘛也是他們宗教上的精神領袖，所以他們會來這裡學習西藏語言，不然，也會來這裡接觸感受西藏佛教。所以，有許多藏人，或是來自蒙古的人，甚至來自俄羅斯的人，他們都來此地學習那些早已經被中國政府在西藏所摧毀的，但我們保存下來的西藏佛教與哲學，還有西藏文化，能有這些成果，無論如何都不能忽略印度政府對我們的支持。並且，也感謝許多其他國家在我們藏人為難的狀態下對我們提供的幫助。

吳：那麼可否再介紹印度政府的西藏政策？

杜敦：印度政府的西藏政策一直都是持續不變的，而且政策源自於英印政府時期。從那個時候開始英印政府就始終保持著一個模糊的立場，那就是承認中國擁有西藏的宗主權，但並不擁有主權。因而，西藏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但在許多方面卻應該有自主性。在 1954 年，中國與印度政府簽訂了一個關於西藏的條約，那就是《五點和平協議》。在那裡頭，它也延續了英印政府的立場，承認了西藏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一個自治區，並直到現在。後來，其他國家例如美國、英國等也都主要在印度公開立場之後採取相同的態度。中國的說法其實有問題，

它說到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承認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事實上這個狀態與印度政府採取的政策有關。

吳：我想請教在 1962 年的中印戰爭後，印度政府對於西藏議題有無改變過立場？

杜敦：在聯合國中，印度曾經三次表示過意見，一次是 1959 年，一次是 1961 年，一次則是 1965 年。在 1959 年與 1961 年的兩次，印度都沒有承認西藏。但是在 1965 年的那次，印度改變了並支持西藏。這此結果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印度與巴基斯坦爆發戰爭，而且中國支持巴基斯坦。所以，印度就在 1965 年支持了西藏，而中國則支持巴基斯坦。

吳：那麼這與 1962 年的戰爭，印度政府的立場無關？

杜敦：你應該分開這兩個部分，從人道上與政治上兩個面向來看。從人道的部分來看，印度的立場始終都是一致的，他們讓我們生活在印度社會，允許我們政府的存在，提供我們許多援助，可以這樣說，西藏人在印度除了投票權之外，我們享受所有跟印度人一樣的權利。但是在政治上，剛剛說的，除了 1965 年那次曾經支持西藏之外，在其他時候，印度都沒有改變過立場。在 1947 年，國際亞洲國家會議在印度舉行，當時尼赫魯邀請西藏參加會議，在那個時候，儘管後來遭到國民黨政府的中國代表抗議，但是西藏仍然是被認為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不然印度怎麼會邀請它參加會議？在那個時候，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印度非常支持西藏。在 1959 年，達賴喇嘛與眾多藏人流亡印度後，同年的亞非會議討論了關於西藏議題的狀況，在當時，從印度的大眾也都表現出明顯的態度，那就是其實非常支持西藏。

吳：1988 年拉吉夫甘地訪問中國後，印中關係被認為逐漸有所改變。那麼，相較於之前的 1965 年後到這個訪問的中間，您認為印度政府對西藏的態度有沒有任何的變化？

杜敦：沒有。在政治上，從 1954 年以後，印度政府自從簽了《五點協議》後就一直沒有改變，印度認為西藏屬於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上述我一再提到的部分。但是，我想要告訴你的是，在人道上印度對我們的援助是不斷而持續的，也因為如此，今日我們藏人才能夠得以生存在自由的印度社會。

吳：在人道的部分印度政府對藏人的援助我們已經從您的口中得以了解整個過程。那麼，就政治的部分，想再更細部的請教，從您過去的經驗感受中，印度政府有無在哪些年間對藏人的立場更為友善，而哪些年間是比較不那麼親密的？例如，藏人在印度的活動可能在哪些時候更加自由，而在某些時候卻受到限制？

杜敦：不不，並沒有，政策一直都是持續的，不論在政治上或是人道的措施上，政策與態度都一直沒有過改變。

吳：那麼想請教，印度政府是否曾以政治性的名義，或是人道性的名義，而訂定任何相關的法律條文賦與藏人在印度的活動權利，而使得藏人在生活上有所可以依循的依據？

杜敦：不不，沒有。但是我們藏人除了在政治上享有投票權之外，我們擁有其他跟印度公民幾乎一樣的權利，簡直就像是個一般的印度人一樣。而且，印度政府雖然不承認西藏流亡政府，並視達賴喇嘛與流亡政府是個別不同的，但是也並不會去妨害我們政府的運作。他們並沒有區分流亡政府與一般藏人，我們政府在印度社會持續的運作，而藏人也在印度社會中生活並享有自由正常運作。

吳：那麼，請問印中關係是否有影響到印度的西藏政策？

杜敦：我們認為，印中之間的關係應該改善，而且也認為，印中關係的改善是有助於西藏議題的解決的。因為當關係改善後，中國將可能有更多的自信面對西藏議題，認為這不再會是一個棘手而複雜的問題。但是這中間還有很多的對話空間。

吳：這意思是，西藏議題其實有在印中關係中是有所作用的嗎？

杜敦：不，我是說，我們相信，印中之間的關係雖然時而有所緊張，但是只要雙方的關係改善了，他們真誠的當好朋友，那麼，這樣的氣氛將有助於西藏議題的和平解決。因為這種和善的氣氛將會使中國政府更有意願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西藏議題。這也是我們長期以來不但呼籲雙方應該要和平共處的重要原因。

吳：所以，在印中關係改善的時候，相對的印度的對藏政策會有所變化嗎？

杜敦：我想，印度對待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場始終都是持續的。它承認西藏是屬於中國的一個自治區，但在另一方面，它允許西藏流亡政府的存在，並且使它得以運作，照顧廣大的藏人，這也是它一直沒有改變的政策。

吳：那麼，政府是否曾經與印度政府合作過哪些活動呢？

杜敦：我們與印度政府在很多層面都有合作，像我們能提供圖書給孩子們閱讀的圖書館，就是我們與印度政府合作的一個例子。像在瓦拉納西，西藏中央高級研究院這樣的一個重要教育機構也是與印度政府合作的一個例子，很多時候印度政府也會提供經費給我們，但不是每一個都會有。經由這樣的努力，使得藏人雖然身處在西藏之外，仍然能夠保存自己的文化。

吳：那麼，印度政府是否曾經試圖藉由提供任何幫助的同時，並要求或是限制流亡政府的活動？

杜敦：不不，就我所知，完全沒有。他們沒有試圖干涉過我們的活動，自從我們失去家園流亡這裡之後，他們對待我們如同對待本國人民。你知道，印度是一個民主國家，而不是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民主體制使得它尊重每一個人過自己覺得是最好的生活。

吳：可否請您簡單介紹《西藏通訊》(Tibetan Bulletin)？

杜敦：《西藏通訊》是一個直屬於流亡政府的專業性雜誌，你可以看得出來它所設定的讀者其實並不是針對西藏人，因為它使用的語言是英文。該雜誌主要的功用在於向西方世界介紹西藏議題的發展，闡述發生任何最新關於西藏的一切，並且，向西方世界的讀者介紹使得他們得以了解西藏文化，以及關於我們的一切，進而支持西藏。

吳：就我所知，《西藏通訊》創刊於 1963 年，並且，這也是印中發生戰爭後的隔年。在這樣一個敏感的時機點上雜誌又剛好創刊，就您所知，這純粹是一個時間點上的巧合，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杜敦：不，我想這件事情與印度政府無關。印度政府允許我們從事任何只要不違反印度法律的活動，當然包括辦刊物。我並不太清楚為什麼雜誌剛好在 1963 年，但是，在流亡之後，我們主要的目標就是生存，當逐漸站穩腳跟以後，並且稍稍有能力之後，我們要告訴世界發生在西藏的一切。你知道，沒有了家園之後，生存成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辦雜誌)是必要的，只要不違反所處國的法律。

吳：可否請您簡單介紹「感謝您印度！」(Thank you India!)這樣的一個節日，以及印度政府如何看待這件事情？

杜敦：「感謝您印度！」是我們表達對印度政府以及印度人民的一個節日，流亡 50 多年來，實在是很感謝他們的協助，我們才有今天的局面。印度是一個大國家，本身有廣大貧窮的人民以及面對眾多的挑戰，但是印度政府仍然慷慨的援助我們，這真的讓我們非常感謝。今年的「感謝您印度！」已經結束，這幾天我們將要舉辦「感謝您喜馬偕爾邦」(Thank you Himachal!)，表達在這裡流亡 50 年以及對他們的感謝。

吳：印度政府官員會參加活動嗎？

杜敦：不，我認爲中央層級的政府官員並不會參加活動。「感謝您印度！」表達對印度的致意，但是德里中央層級身分的政府官員應該不會參加活動。不過，「感謝您喜馬偕爾邦」，當地的政府官員，包括行政首長都會參加。

吳：整體而言，我已經很了解您告訴我的一切。但我也很好奇，如果印度是如此的對西藏友好，那爲什麼我們也在印度看到有人抱持著相反的立場？

杜敦：印度政府與印度人民對西藏非常的友善，當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印度媒體大肆報導，印度大眾也幾乎都是反映熱烈，感到喜悅。不過，事實上仍然有些人並不支持西藏，我想原因與意識型態有關。印度是一個大國家，內部也有很多紛歧，有些人認爲，印度應該與中國友好，而在西藏議題上的立場應該要符合中國的期望，所以我想有些人是基於意識形態的關係而反對西藏，但是整個來說的話，我認爲印度政府與大眾是對西藏友好的。(訪談完)

附錄二

西藏流亡政府前安全部長久美倫珠 (Jigme Lhundup) 仁波切訪談稿

時間：2010/04/29 19:45-20:50

地點：前安全部長久美倫珠 (Jigme Lhundup) 仁波切住所

受訪者：西藏流亡政府前安全部長久美倫珠 (Jigme Lhundup)

訪問人：吳宗翰

翻譯：原文為藏文，單增葛登仁波切翻譯，以下以「前(單)」表示部長的回答

吳：想請問您，就您的經驗來說，印藏之間的相處與交流是怎麼樣的狀況？

前(單)：總的來說，印度對於流亡政府非常的好。譬如說，達賴喇嘛剛到印度的時候，印度政府就說，我們「承認」流亡，而且你們政府與流亡的人來到這邊，不論多久我們政府與人民都會歡迎。

吳：那請問所謂的「承認」指的是？根據達賴喇嘛的自傳，尼赫魯當時的說法似乎是「默許」存在，但您所提到竟是「承認」，是否可以進一步說明？

前(單)：承認「流亡」並非是指流亡政府，印度政府並沒有承認流亡政府。但是第二年我們來到這裡已經建立了流亡政府，還有流亡的根據地，但是印度政府並沒有反對，而且他們還有幫忙西藏個別的學校啊，假如我們西藏的小孩子要是送去印度的學校去，那就可能會失去了我們根本民族的風俗習慣、對本族的認同；還有對那些西藏流亡的人民，也沒有把他們送到都是印度人的地方，這些幫忙都是為了保存西藏文化而來的。因此，雖然印度政府並沒有承認流亡政府，但是在各方面他們都提供了許多的幫忙。

再譬如說，印度對於這些西藏的小朋友在學習方面都有很大的協助，以及在各根據地方面也有很大的協助。特別是法王到哪裡去，他的安全方面的都是印度在幫忙保護，而且法王的出訪費用印度也提供了很大的協助。所以，總的看來，雙方都是非常友好的。

當法王出訪各國的時候，有時候是爲了弘法，講法講經；有的時候是發表一些有關於政治方面的，但是印度政府從來沒有去限制反對他的言論，這些是完全沒有的。如果說有限制的話，或說(法王)在這裡(印度)的情況下，應該會有所限制去哪裡時候盡量不可以談政治啊什麼的，但完全都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

吳：那麼在邊界問題上，或是關於麥克馬洪線的議題，就仁波切您的經驗，印度政府與流亡政府之間如何討論這個問題？

前(單)：這個議題，其實印度政府並沒有特別去跟西藏流亡政府談。而流亡政府這邊也沒有再去特別碰觸這個問題。

吳：那這是因為流亡到這邊之後，又印度提供了如此大量的協助，所以這個議題在這個情況下就沒有再被討論了？

前（單）：這或許你可以將它視為是原因之一。但是，更要體會到，達賴喇嘛法王並不僅僅是為了印度，他更是為了全世界，為了世界的和平，這類的問題就不會再被提出討論。

吳：那麼，是否能夠就仁波切您的經驗，與我分享，當中印關係、中美關係等國際政治關係改變的同時，西藏流亡政府是否也會有所感受到？藏人是否有哪些時期特別覺得在社會上特別順利，或是哪些時期覺得非常的不順利？

前（單）：以前，我們也是非常擔心這個問題，特別是關注中印關係如果變好，或者是當中美關係有變化的時候，我們總是擔心這會不會對西藏流亡政府或是藏人有影響，一直都非常擔心與懷疑。然而，到目前為止，尚沒有感覺到有改變過。一直都是很穩定的發展，沒有改變過。

而且，其實對印度來說，如果它去仔細的想一想，如果西藏問題能夠好好的解決的話，對它來說有非常大的幫助。譬如說，印度現在每天花在邊境上的費用是一個很大的支出，假如西藏問題可以得到妥善解決的話，那對印度來說絕對有很大的利益與幫助。但是，印度當然也不會因為想到了這一點，就名目上的大力支持西藏，它還是會比較低調的，因為這個議題還須要很多其他外在的因素來決定。

吳：所以，您的意思，印度政府在對藏政策上始終是很穩定的路線而沒有改變過？

前（單）：是，一直如此。對我們來說，與印度的關係是須要非常重視與關心的，因為我們藏傳佛教的佛法來自於印度，而且大部分的印度人都非常關心與支持我們，這就是因為我們繼承了佛法，還有達賴喇嘛不斷的四處弘法。因此，有了這些關係，我們更是重視與關心與印度的關係。

吳：那麼，在印度國內，譬如說印度共產黨等，是否有主張反對印度的對藏政策者？而流亡政府與印度政府方面又是因應這樣的聲音？

前（單）：就經驗來說，並沒有出現以「組織」或是「團體」來反對印度的這樣政策者，儘管是有人以文章的方式發表，但那也是屬於少數者，目前來看並沒有出現公開表示反對的團體或是組織。

從另一方面來看，達賴喇嘛法王到了這邊，其實對於當地有很大的幫助，對於經濟發展等有很大的促進。譬如說我是 1965 年到達蘭薩拉這個地方，那時候只有兩輛公車，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但如今除了有出租車，至少也有 600 輛以上的公車，這些都顯示了當地的進步。達賴喇嘛法王人在這邊，因此有來自各國的，有西藏的，還有各方的，這些都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因此，從各個角度來看，他們（印度）也是非常歡喜。

（合十，訪談結束）

附錄三

西藏流亡政府前宣傳部長久欽·圖登南嘉 (Thubten Namgyal) 訪談

稿

時間：2010/05/01 17:50-18:55

地點：前宣傳部長久欽·圖登南嘉 (Thubten Namgyal) 住所

受訪者：西藏流亡政府前宣傳部長久欽·圖登南嘉 (Thubten Namgyal)

訪問人：吳宗翰

翻譯：原文為藏文，單增葛登仁波切翻譯，以下以前宣（單）表示前部長的回答

吳：部長您是否能就您的經驗向我們分享印度與西藏之間來往的關係，並不侷限於印度在政治上聲稱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而甚至在社會的層次上印度是否曾經對藏政策是否作過調整？

前宣（單）：從政治上的角度來看的話，印度已經說了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我們西藏政府也是了解印度的這個政策。然而，印度是一個民主國家，它在另一方面的政策就是：「各有各的自主權」。而它們也對我們相當信任。當我們流亡到這邊之後，不論我們去抗議中國，或是要爭取獨立，印度都沒有禁止我們，這些都是我們的權利。當然它如果要限制我們的話其實也可以，但一直到現在都沒有這麼作。

吳：那麼即使在中印關係，或是國際政治關係上有所變動時，印度政府也依然如此而沒有暗示或表明希望藏人不要從事這類的活動嗎？

前宣（單）：印度政府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控制或是禁止這類的活動。因為印度政府始終沒有改變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的政策，而它在國內也容許這類活動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如果法王達賴喇嘛說西藏是一個獨立的，或是如何，那麼，這樣的意見必然成爲它（印度）所重視的一件事，而這樣它就可能會有其他的行動。不過，法王始終是堅持不獨立，他說他要的用中間道路解決中國與西藏之間的問題，他要用和諧的方式來處理兩國之間的這個議題，因此，當法王作出這樣的宣示，而民間的藏人不論怎麼去抗議要求獨立等，印度政府也就沒有去加以禁止了。

吳：照這樣的面向來看，這是否表示印度政府曾經與法王有過討論，對於這個議題的解決已經有了方向？我的意思是，印度政府是否曾經與法王探討過這個問題，而使得法王對西藏議題的解決有所改變，還是說印度政府從未影響過法王的決定？

前宣(單):並非如此，法王並非是與印度政府談論過才有此決定。早在 1959 年之前，印度政府就已經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國際環境的變化，中國的成長等，從各方面條件來看，法王是根據世界的環境來決定的，而不是因為印度政府與法王討論後決定這個路線的。

吳:那麼流亡至今，就宣傳部過去的經驗，是否曾經對「邊境議題」、軍事、「麥克馬洪線」等，與印度政府交換過意見，雙方的交流情形如何，是否可以請部長分享經驗？

前宣(單):關於「麥克馬洪線」的問題印度與西藏之間曾經討論過好幾次。因為，有時候當印度很強烈的去說「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時，「麥克馬洪線」卻又不是中印之間簽定的，而是印藏之間簽署的，所以，從這個面向來看，當印度政府有時候說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時候，法王就會出面去說明麥克馬洪線的狀況。

當年麥克馬洪線簽定的時候，是西藏與印度之間妥協而簽定的。後來印度獨立了成爲一個國家之後，另一方面中共的勢力也成長到逼近西藏地區，我們其實可以說後來其實是印度與中國兩方面都侵佔了西藏，共同地把西藏給滅掉了。因此，現在你問到了這個問題，很清楚的，印度如果沒有先解決麥克馬洪線的問題，那它也立刻陷入了一個困境，譬如說中共可能聲稱那裡是中國的領土等。所以印度在這個問題上始終保持一個謹慎的態度。

吳:那關於這個部分是否可以請部長再更詳細的說明？譬如說您提到法王曾經出面，那麼究竟是哪幾個時間點時法王曾經出面？爲什麼是那個時間點呢？

前宣(單):我不記得是哪一年，但記得好幾次不僅僅是法王曾經提過，好幾次就是我本人親自與印度政府談的，那時候的總統是「」(1700)，還有拉吉夫·甘地的時候也曾經幾次提到過這個問題。剛剛也說到，這個議題是一個相當關鍵的問題，這也是爲何流亡政府可以在印度的一個原因。而我剛剛說到的那位「」他本來是印度的外交部長，後來當上了總統。

吳:那麼可否再請教部長，您剛剛的意思是由於麥克馬洪線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所以流亡政府可以在印度？還是說印度政府是由於出於「補償」的態度，(因爲侵佔了土地)，所以流亡政府才可以在這邊？能否請您再就這一點闡明？

前宣(單):流亡政府能夠在印度，並不是你所提到的這兩個原因。麥克馬洪線是由印度以及西藏兩個國家經過談判確定而簽定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且，達賴喇嘛是西藏的主人，(身爲條約簽定的另一方)，所以達賴喇嘛，或是西藏，能夠在這裡也有這個原因。

吳:那麼，部長您是否可以再爲我解答，由於您剛剛的說法似乎產生了兩個可能：一個是由於有邊界爭議，所以西藏流亡政府可以在這邊；還是說西藏流亡政府存在於印度與有邊界爭議這是兩回事。對於這個是否可以再加以爲我解答？

前宣（單）：首先，麥克馬洪線是由十三世達賴喇嘛與印度簽定的，而十四世達賴喇嘛繼承了十三世的一切，這一點我們先確定。因此，對於麥克馬洪線的問題，如果今天並不存在著達賴喇嘛的政府，那自然就不會有人提這個問題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你再去思索，就可以體會為何流亡政府可以存在於印度了。

吳：那麼，想再請教部長，這個問題後來就逐漸的被邊緣化不再被討論嗎？還是有其他的發展？

前宣（單）：麥克馬洪線的所在地，不論是達賴喇嘛或是印度政府兩者的立場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說那個所在地都是屬於印度的部分。假如達賴喇嘛法王說那個地方不是印度的話，那麼中國就很有可能聲稱那是它的了。

吳：部長能否分享過去在任內與印度政府交往的情況？

前宣（單）：我擔任了 15 年的部長，在任內我的經驗是隨時都與印度政府保持聯絡，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印度對我們來說相當的重要。有的時候印度政府官員會來到此地與我們談論事情，有的時候則是我們會去拜訪印度官員討論事情。剛剛我們提到，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印度政府承認了「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其實是一個相當錯誤的決策，而印度也知道這是一個錯誤的決策，因為一個相當關鍵的問題就在於「麥克馬洪線」。從外部來說，印度政府已經作出了這個宣示，要改變不易。但從內部來說，西藏與印度可以說兩者是同難同當。

吳：部長您剛剛提到西藏政府與印度政府之間很常會面討論，那請問這個是有常規化嗎？

前宣（單）：並沒有，雙方之間的來往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會面交換意見。大部分的狀況是針對出現的議題，雙方一再反覆的交流與討論。

吳：那麼當時直接交流的層級是最高到部長嗎？還是有更高的層級？

前宣（單）：過去的經驗曾經有印度的外交部長曾經來過。其他的部分大部分由於我們有駐印度的代表處，事情幾乎由那個地方處理。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認知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印度與西藏雙方間有共同的利益存在，不然的話，我們流亡政府如何可能可以在這個地方？簡單地說，我們有真正的共同的利益。

吳：那麼部長能否再向您請教，在您的任內，西藏與澳大利亞雙方來往的關係與發展為何？

前宣（單）：就我的經驗，我對澳大利亞與我們的來往幾乎沒有任何概念。我印象所及，最早我們有七位青年人在這裡訓練，而後有兩位派到澳大利亞去，除此之外我並沒有任何的印象了。而我們與澳大利亞較有實質的關係大概是從 2000 年之後吧。

吳：恩恩那我了解了。最後，我想再提一個問題，部長能否就您的經驗，宣傳部在過去致力於讓更多人關注「西藏問題」的同時，是否曾經受到印度政府任何的暗示或是明示對於這個議題的宣傳與發展？

前宣（單）：一個都沒有，印度絕對不會作這個事情。而且就算是達賴喇嘛想要出訪，印度也從來沒有阻礙他的行程。其實，法王可以說與印度兩者是同難同當，心意相通，因此，印度政府從來也不會去妨礙法王的活動，也不會懷疑法王的活動是否可能傷害印度。

吳：真的非常感謝部長您的分享，我收穫良多，謝謝您！

（合十，訪談結束）



附錄四

澳大利亞政府在西藏問題上的位置以及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係

資料來源：西藏流亡政府駐澳洲坎培拉處提供

Australian Government's position on Tibet and its relations with Chines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position on Tibet

The present Australian Government's position on Tibet is tha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ccepts that Tibet is part of China, a position consistent with Australia's recogni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72. Australia's stance on this issue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at of the wi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Government, however, remains concerned about continuing reports of restrictions on religious freedom, cultural identity,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side Tibet. These concerns are included in a range of issues raise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uring the Bilateral Human Rights Dialogue,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August 1997 and is held annually.”

Pres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is growing momentum day by day.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Australia is the fastest growing overseas communities. In 2004, over 11,000 Chinese settlers arrived here - around 10% of the total migrant.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census, about half a million Australians identify themselves as having Chinese ancestry. *BBC report on 20 October 2005*

Economic Relations

In 2002, out of six countries, China was offered the natural gas contract worth \$26 Billion to Australia. This gas contract was considered a reward to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 and the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Mr. Simon Crean for not meeting with His Holiness in 2002.

Australia's economic statistics in terms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very impressive. China is Australia's second largest export market and has overtak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verall, present clos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is summed up by Mr. Alexander Downer,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Australia, as follows

"Australia'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substantial and growing. The relationship is based solidly on strong complementarities. Australia is a stable, reliable supplier of the high quality minerals, energy, foodstuffs and services that China needs for its continued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wo-way merchandise trade in 2004-5 exceeded \$32 billion, with average annual growth of 20 per cent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People-to-people links are also growing strongly, particularly in education (*43000 full time students in current year*) and tourism (*176,000 visitors for the current year*). Our two sides are negotiating a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a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remove trade barriers and deepen integration between our two economies." (*11 October 2005*)

In addition, there is a distinct possibility that China might be given a green signal to mine the world's largest deposit of Uranium in Australia. Australian government thinks that it can monitor China for the proper use of uranium, which is bone of contention among political parties: specially the Greens.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On 26 May 2005, there was a set back to this otherwise cord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when Mr. Chen Yonglin, the former First Secretary and Chinese Consul for Political Affairs in Sydney sought a political asylum in Australia. However, it was handled with great care and at a low key level that the two countries seems to be on the normal track again.

"Australia is China's new spokesman", wrote Mr. Sushil Seth, a writer based in Sydney in Taipei Times on 6 October 2005. This assertion is based on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s speech at Asia Society function in New York (September 2005) where he said that ".... to see China's rise in zero-sum terms is overly pessimistic, intellectually misguided and potentially dangerous. Its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system has lif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out of poverty. Its growth in recent years has helped to sustain the expans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of world trade."

According to Richard Bulliavant, Chinese strategy is to make Australia part of China's "Great Border Area" or "Grand Border Strategy" for obtaining both Australia's natural resources and its political compromise: *to break the military ties betwee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urn Australia into "a second France that dares to say 'no'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Observer, Spring 2005*)

附錄五

澳大利亞藏人社群的發展

資料來源：西藏流亡政府駐澳洲坎培拉處提供

Introduction:

Australia, an Island continent is the sixth largest nation in the world with relatively small population. The Australian federation consists of six States and two Territories. They are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Northern Territory, New South Wales, Victoria, South Australia, Western Australia, Queensland and Tasmania. The Capital cities are Canberra, Darwin, Sydney, Melbourne, Adelaide, Perth, Brisbane, and Hobart respectively.

Immigration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Australian society. Since 1945, over six million people from 200 countries have come to Australia as new settlers. Australia's culturally diverse society includes it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settlers from countries all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ibetans, settled in all cities of Australia.

Development of Tibetan Community

There is a 36 year's history of Tibetans migrating to Australia with the first Tibetan named Namgyal Tsering coming to Australia in 1973. He got settled in Sydney. During the 1980's, Sydney's Tibetan community, numbering less than twenty, was perhaps, the smallest of the ethnic groups. Most of the early Tibetans who got settled in Australia were either Tibetan lamas who came to teach or head Tibetan Buddhist learning centres in Sydney, Melbourne, and Brisbane or other lay people who got here through their Australian husbands and wives, whom they have met overseas (mostly India). In due course, Tibetan children were born and the Tibetan population increased. However there was only a handful of Tibetans until early 1990's and they were not linked as a community. The Tibetan Community of Australia, NSW is the first Tibetan community established in 1992.

Lama Thubten Yeshe and Lama Zopa Rinpoche were the first Tibetan lamas to visit Australia in 1974. In 1975, they found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Mahayana Tradition (FPMT) which is an internation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evoted to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Mahayana Buddhist tradition and values worldwide through teaching, meditation, and community service. Today, there are more than 130 Buddhist Centres are affiliated to FPMT. Other lamas also came to teach Tibetan Buddhism, and many of them stayed becoming permanent residents. Until mid 1990's, there were around 80 Tibetans living in Australia.

As a result of repeated appeal from Mr. Chhime Rigzin Chhoepakpa, the then Representative of His Holiness Dalai Lama's to Hon. Phillip Rudduck, the Minister of Immigration & Multicultural Affairs in 1996, the first batch of twelve Tibetan refugee arrived Australia on 24 July 1997 on Special Humanitarian Programme (SHP). This is an ongoing programme since then and the quota was increased during the time of Representative Tenzin Phuntsok Atisha in 2004. With continuation of Special Humanitarian Programme, more Tibetan refugee arrived in Australia. The Tibetan populatio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2005 with arrival of 50 Tibetans at same time and around 100 in total that year making Tibetan population in Australia above 250. As of November 2008, around 300 Tibetans have come to Australia under this program with majority of them settled in Sydney. In this way, this biggest city of Australia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Tibetan population. The early Tibetans (lay peoples) were mostly engaged in factory, nursing homes and other labour jobs in the beginning, many of whom managed to do short courses later which enabled them to get better jobs.

The Tibetan Community in Canberra develop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Sakya Losel Choe Dzog and Tibet Information Office in Canberra. In 1993 as a result of meeting between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then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Mr. Paul Keating the Tibet Information Office was established. The office bearer including the Representative & the Secretary and their families were the former Tibetans arriving in Canberra. The number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the transfer of new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Secretary by Tibetan Exile Government who were joined by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relatives. While there are few who came here through their Australian husband and wife. The Tibetan population in Canberra now is around 52 with half of them as youngster attending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The first Tibetan to come to Melbourne was in 1979 while in Adelaide, it was around 1988, a lama at Buddhist Centre.

As of March 2008, there are around 600 Tibetans living across different states of Australia and the numbers will continue to grow. There are well established Tibetan communities, where Tibetans participate in the cultural life of Australia, while practicing their religion and retain their customs here. Tibetans have generally adapted well to the life-style in Australia and continue to preserve and practice their culture.

附錄六

澳大利亞國會中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案

資料來源：西藏流亡政府駐澳洲坎培拉處提供

Australian Government's position on Tibe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ccepts that Tibet is part of China, a position consistent with Australia's recogni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72. Australia's stance on this issue is in conformity with that of the wi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Government, however, remains concerned about continuing reports of restrictions on religious freedom, cultural identity,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ibet. These concerns are included in the range of issues raised in the bilateral Human Rights Dialogue,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August 1997 and is held annually.

All the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support the Middle Way Approach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he parties include Labour (ruling party), Liberal, Greens and Democrats. The Labour and Green Parties had adopted a comprehensive Policy on Tibet in 2000 and 2004 respectively, which recognised Tibet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before the Chinese occupation. However, they fully support the present approach of His Holiness to obtain genuine autonomy under PRC.

The Honourable Prime Minister Kevin Rudd and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Honourable Stephen Smith has consistently called for dialogue between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s envoy and China. The Prime Minister reiterated the need of recognising human rights problem in Tibet during his visit to China in May 2008.

Copies of resolutions/ motions of support on Tibet in Senate

Australia has supported the three resolutions passed by UN General Assembly (in 1959, 1961, and 1965) which have called upon China for the cessation of practices which deprive the Tibetan people of thei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including their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has also unanimously passed a similar but more detailed Resolutions on Tibet. (the Senate 6 December and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6 June 1991)

1) Australian Senate Resolution December 6, 1990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on June 6, 1991

That:

- A) expresses its deep concern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ibet;
- B) recognises that human rights abuses have been committed in Tibet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1959 and that human rights abuses are reportedly continuing;
- C) endorses Resolutions No 1353 of 1959, No 1723 of 1961 and No 2079 of 1965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nd recognises that they remain relevant today;
- D) endorses the call for the cessation of practices which deprive the Tibetan people of thei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 E) commends the Dalai Lama and his representatives for consistently rejecting the use of violence, and notes that this was acknowledged in the awarding of the 1989 Nobel Peace Prize to the Dalai Lama;
- F) endorses the representations made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nd by members of this Parliamen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lleged human rights abuses, generally and in Tibet;
- G) calls 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C to:
 - i) recognise the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of the Tibetan people as set out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venants, including the right to practice their culture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without fear of persecution, arrest or torture;
 - ii) enter into earnest discussions, without pre-condi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and his representatives with a view to reducing the tensions in Tibet; and
 - iii) respond to representation made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nd by members of this parliament on allegations of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general in Tibet; and
- H) call on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o continue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to, and seek responses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llegations of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ibet.

2) Australian Senate Resolution 10 November 1994

Moved by the Democrat's Foreign Affairs and Human Rights Spokesperson, Senator Vicki Bourne
that the Senate:

- a) notes that during the week beginning 6 November 1994, the Chairman of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r, Qiao Shi, is on an official State visit to Australia;
- b) recognises that during the 1989 pro-democracy protests, Mr, Qiao Shi served as head of China's security services;
- c) expresses its concern that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ibet appears to have deteriorated and that the Tibetan people continue to be denied thei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 d) endorses the representations made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nd by members of this Parliamen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ibet;
- e) urg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cognise the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to enter into genuine dialogue, without preconditions, with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a long term solution in Tibet;
- f) calls on all Australian Government Ministers to continue raising issues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situation in Tibet in their discussions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o ensure that they understand the depth of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s feelings about these matters; and
- g) requests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 commitment that it will not deny visas to exiled Tibetan women from any part of the world who wish to attend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Conferences on Women which is due to be held in Beijing in 1995.

3) Australian Senate Resolution 14 November 1994

That the Senate:

- a) calls for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the Gari Fourteen, a group of Buddhist nuns from Gari nunnery who are detained within the Chinese prison system in Tibet.
- b) notes reports that these young nuns and other Tibetan political prisoners are subjected to routine torture, are used as forced labour and have limited access to medical treatment.
- c) acknowledges that whilst it is alleged that 12 of the nuns were arrested for taking part in a pro-independence rally on 14 June 1993, there are no witnesses to a rally that day, and no evidence exists that it is ever occurred; and
- d) calls on the lead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comply with both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4) Australian Senate Resolution 29 June 1995

That the Senate:

- a) notes that the United Nations 4th Conference on Woman is to be held in Beijing in September 1995;
- b) supports the right of all women, including Tibetan women, to take part in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conference to be held at the same time;
- c) is concerned
 - i) at the reports that the NGO forum is to be held at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from the World Conference at a site that cannot accommodate the approximately 20,000 participants expected at the forum.
 - ii) at reports that telecommunication, hotel,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port facilities are inadequate for a conference of this kind and scale, and
 - iii) at reports of strict customs procedures and controls with regard to the importation of written and audio-visual materials by participants of both conferences; and
- d) calls on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Senator Gareth Evans) to continue
 - i)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o the conference secretariat to allow women from Tibet who are accredited to NGOs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and
 - ii) 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adequate arrangements are put in place to enable the NGO conference to proceed with adequate facilities and democratic procedures.

5) Australian Senate Resolution 30 November 1995

That the Senate:

- a) notes that China has announced the selection of a new Panchen Lama in an attempt to overrule the Dalai Lama's choice of five months ago;
- b) expresses:
 - 1) dismay that China's actions represent a further ero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religion;
 - 11) expresses support for the candidate recognised by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s being the only legitimate Panchen Lama; and
- c) urges China to respect the wishes of the Tibetan people by supporting the Panchen Lama as recognised by the Dalai Lama response

6) Australian Senate Resolution 18 September 1996

That the Senate:

- a) recalls the Notice of Motion on Tibet passed by the Senate, on 6 December 1990; and further notes:
 - a) the ongoing human rights abuses of the Tibetan people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religious, political, educational, language and cultural grounds and calls for the cessation of any practices which would deprive the Tibetan people of thei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 b) the Dalai Lama's affirmation of a commitment to non violence and negotiation to solve conflict, as exemplified in His Holiness' receipt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1989;
 - c)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appointment of a rival Panchen Lama (the second most holy position in the Tibetan religious order), in the place of the Tibetan proclaimed reincarnation of the Panchen Lama, Gedhun Choekyi Nyima, is contrary to freedom of religious practice, as enshrined with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other human rights instruments;
 - d) the concerns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 for the safety, welfare and location of Gedhun Choekyi Nyima and his family;
 - e) the Dalai Lama's proposal at Strasbourg in 1989 to undertake dialogue with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refusal to meet with the Dalai Lama;
 - f) reports by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at there are 650 Tibetan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some of whom are as young as twelve, and that the torture of detainees and severe beatings are common.

7) Australian Senate Resolution 5 March 1997

That the Senate:

- (a) notes:
 - (i) the arrest and incarceration of Tibetan Ngawang Choephel, a Fulbright Scholar, who was sentenced to 18 years imprisonmen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allegedly spying while carrying out field research as an ethnomusicologist,
 - (ii) that Ngawang Choephel was denied access to legal representation, and that his family and friends have not been allowed to communicate with him since his arrest,
 - (iii) that Ngawang Choephel's whereabouts remain unknown; and
- (b) calls 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 (i) urgently raise the issue of Ngawang Choephel's arrest and incarceration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 (ii) reiterate Australia's concern about continuing human rights abuses in China, including in Tibet,
 - (iii) reiterate Australia's belief that the distinct Tibetan culture,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ethnic heritage should be protected,
 - (iv) seeks immediate information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Ngawang Choephel's whereabouts and well-being, and
 - (v) register Australia's concern about Ngawang Choephel's sentence.

8) Australian Senate Resolution - 29 May 1997

That the Senate:

1. Notes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on Tibet as outlined by Jeffrey Bader, US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ast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 on 13 May 1997; viz:

"The United States encourages China and the Dalai Lama to hold serious discussions aimed at resolution of differences at an early date, without preconditions ... We have consistently asserted that any questions surrounding Tibet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Chinese authorities in Beijing should be resolved by direct dialogue between the Tibetans, in particular the Dalai Lama, and the Chinese."
2. Urges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o emulate this policy.
3. Calls 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Tibetans, in particular the Dalai Lama to enter into direct dialogue about the future of Tibet.

9) Australian Senate Resolution 24 November 1997

That the Senate

1. Notes the appointment of Mr. Gregory B. Craig as US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 on 31 October 1997 and that he
 - a) will travel to all Tibetan region (not just TAR) as well as visit Tibetan communities in India and Nepal b) will be provided with adequate resources, staff and bureaucratic support for the mission; and c) will have a direct chain of command to the Under Secretary for Political Affairs
2. Welcomes the US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hat
 - a) "a central objective will...be to promote substantive dialogue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Dalai Lama or his representatives"
 - b) The special Coordinator's focus will be to advance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ibet and "to preserve the unique religious,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heritage of Tibetans".
3. Call on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o emulate this constructive move by the USA and to appoint in a similar role and Australian Coordinator for Tibet.

10) Australian Senate Resolution 18 march 2008

That the Senate:

- a) having regard to:
 - i) the 11th Australia-China Human Rights Dialogue held in Beijing on 30 July 2007
 - ii) the United Nations (UN) Olympics Truce, as passed by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on 31 October 2007 (A/RES/62/4),
 - iii) the 49th anniversary of the Tibetan Uprising of March 10 1959,
 - iv)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Article 9, concerning arbitrary arrest and detention, Article 13 on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Article 18 on the rights to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 v)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Austral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21 December 1972 resulting in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developing strongly,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and
 - vi) the Australia-China Strategic Dialogue, established on 7 September 2007, which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 b) regrets that there have been no further rounds of Sino-Tibetan dialogue since February 2006 and that the five rounds of talks between Chinese official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Dalai Lama from 2002 to 2006, led by his Special Envoy Lodi Gyari, brought no substantive results;
- c) calls on the parties to make every efforts to continue the dialogue; and
- d) reiterates its concern over the reports of continuing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Tibet, including torture, arbitrary arrest and detention, repression of religious freedom, 'patriotic re-education' including forcing Tibetan to denounce the Dalai Lama, arbitrary restriction on free movement, rehabilitation through labour camps and coercive resettlement.

11) Australian Senate Resolution, 15th May 2008,

That the Senate:

- a) notes:
 - (i) the continuing human rights concerns in Tibet,
 - (ii) the continuing restrictions on entry to Tibetan areas for journalists, international observers, non-government agencies and foreign diplomats;
- b) welcomes the informal talks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14th Dalai Lama on 4th and 5th of May in Shenzhen, China and the agreement to hold a further round of the China-Tibet dialogue;
- c) encourages both parties to work sincerely towards a peaceful and mutually agreeable resolution of the China-Tibet issue;
- d) welcomes the Prime Minister's forthright statements during his recent trip to China, both in public and in private with the Chinese Premier and President, on the need for constructive dialogue;
- e) appreciates the Prime Minister's commitment to being a 'zhengyou' or 'true friend' to the Chinese leadership and his willingness to raise challenging issues including Tibet;
- f) requests the Government to actively support and monitor progress of the China-Tibet dialogue and offer its support to help bring about a positive outcome

12) Australian Senate Pass Motion on Tibet, October 16, 2008

The Australian Senate unanimously passed a motion tabled by Senator Bob Brown, leader of the Australian Greens,

That the Senate:

- a) notes that the eight round of the Sino-Tibetan dialogue is due to take place in October or November 2008.
- b) recognises the Dalai Lama has proposed a 'middle-way' approach to autonomy for Tibet within China; and
- c) appreciates the offer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host the dialogue and wishes both parties a successful breakthrough and outcome.

附錄七-1

對西藏的全政黨議會團體 (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Tibet) 介紹

資料來源：西藏流亡政府駐澳洲坎培拉處提供

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Tibet, Australia:

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Tibet was formed in September 1993 with kind initiative from Stephen Loosley, an ALP Senator of New South Wales and Senator Vicki Bourne. The first meeting was held in the Parliament House in Canberra electing Senator Stephen Loosley as Chair and Democrat Vicki Bourne as Secretary. Others elected in the Committee were Greens Senator From Western Australia Christabel Chamarette, Mr. Michael Cobb, MP, Mr. Michael Mackeller, MP, and Senator Brian Harradine as Deputy Chairs. They came up with main objective to promote and support the right of Tibetan people to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The group has 18 Senators and 20 MPs as its members.

The group has been revived many times since then due to elections. The current group was re-established in March 2007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Michael Danby, MP from Labor Party (ruling party at present). The members consist from four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of Labor, Liberal, Greens and Democrats. In 2008, the Democrats were replaced by Senator Nick Xenophon. So far there are around 15 members. The group aim to highlight the urgency of preserving the unique Tibetan culture, environment and support initiatives for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Tibet issue. They have been keeping a close watch on events relating to Tibet especially in supporting the middle way approach and human rights in Tibet.

Activities :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group has been very helpful and influential in making recommendations to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on behalf of Tibetan people. They supported the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resettlement of displaced Tibetans in Australia. They arranged to construct Kalachakra sand mandala by four monks from Namgyal Monastery within Parliament House which enchanted many Australian including Prime Minister Paul Keating. Have raised human rights issue in the Senate and moved Australian Labor party's resolution on Tibet in September 1994.

Senator Gareth Evans has been very supportive of Tibet's issue. During his term as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in 1990s, he raised concern about human rights violation in Tibet and the need for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He also raised the issue with Chairman of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r. Qiao Shi during his visit to Australia in November 1994.

The All-Party Parliamentarian Group conducted several ongoing letters to the leaders of PRC and Australian Government concerning Tibet's situation. They have written Hu Jintao, Presiden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demning over China's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the reincarnation of "Living Buddhas" in Tibetan Buddhism. The group urged the President to withdraw this politically motivated decree immediately. They have also requested Chinese Consulate in Australia to allow them to go to Tibet as a fact finding team. They have now and then met with Exile Tibetan Dignitaries during their visit to Australia and assured them of their continued support.

Senator Vicki Bourne and Senator Bob Brown are the back bone of our relation with the members of Parliament in this country and have passed several motions on Tibet in Senate. Unfortunately for Tibetans, Senator Vicki Bourne had to vacate her post in 2002 after losing her seat in election. Senator Bob Brown, the long time supporter of the Dalai Lama and his peaceful struggle for his homeland and also the deputy chair of 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Tibet has tried to win and maintain the attention of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nd public and did everything in his power to promote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ircumstances of Tibetan people. Senator Bob Brown has devoted the greatest amount of time and commitment to Tibet cause.

Following the demonstrations in March 2008 in Lhasa and the increasing unrest and suppressio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nator Bob Brown has been very active in attending demonstrations and supporting events. He addressed the event during the Olympic torch relay on 24th April in Canberra calling attention to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against Tibetans. He even sponsored a plane to skywrite "FREE TIBET" over Parliament House during the torch relay.

附錄七-2

西藏友好團體 (Tibet Friendship Group) 介紹

資料來源：西藏流亡政府駐澳洲坎培拉處提供

Tibet Friendship Group (TFG)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The Tibetan Friendship Group was founded in India in 1960 by English born Mrs Freda Bedi, (M.A. Oxford Univ), who was working for both the Indian Ministry for External Affair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Social Services Planning Commission at the time when Tibetan refugees were flooding into India following the 10 March uprising in Tibet. Prime Minister Nehru asked Mrs Bedi to study the problem and give her recommendations. Mrs Bedi formed the Tibetan Friendship Group with herself as Director and Sri Attar Singh as Treasurer and with its headquarters at 10 Parliament Street, New Delhi. To enlist the help of people interested in the Tibetan refugees she appointed Honorary Secretaries in U.S.A. (Mrs Muriel Lewis), France (Madeleine Lanqevin and Nadia Proisy), South Africa (Rosemary Vosse), Norway (Carita Aarsand), Canada (Maurice Nichol) and Switzerland (Georges Bex).

After working and studying amongst the Tibetan people for many years Mrs Bedi was ordained a Tibetan Buddhist nun with the title Ani Karma Khéchog Palmo (Sister Palmo) and later received the highest ordination ever bestowed on a sister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tradition since the 8th Century (Gelongma K.T. Khéchog Palmo).

Introduction of Tibetan Friendship Group to Australia

In 1968 Mrs Bedi met Mrs Valerie Grogan, who was visiting Sikkim after attending an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Conference in Bangalore India with her husband Peter, the Hon.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Australian Section. Her host in Gangtok was Mr Har Mander Singh, who as the Political Officer of the Kameng Frontier Division, had granted political asylum to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when he crossed into the region (or "into exile") in 1959. Mr Singh arranged for Mrs Grogan to visit Rumtek Monastery to watch a special dance ceremony, where she was seated between His Holiness Gyalwa Karmapa and Mrs Bedi. Mrs Bedi told Mrs Grogan about the Tibetan Friendship Group and invited her to become the Australian Honorary Secretary.

When Mrs Grogan returned to Australia in 1968 she began seeking sponsors and supporters. She was assisted in this by her sister Helen Booth, Glen Bowden, who held three very successful fundraising functions at her home, Patsy Whiteman and later from Elizabeth Hope. Mrs Bedi sent photographs of children needing sponsors and projects needing support. Sydney photographer Mr Rehak, generously made copies of them for distribution. This support and publicity resulted in sponsorships, offers of help and donations.

On 24 September 1969 an Australian Committee was formed with the following office bearers: President Mrs Valerie Grogan, Hon. Secretary Mrs Glen Bowden, Hon. Treasurer Mrs. Helen Booth and Hon. Publicity Officer Mrs Patsy Whiteman. Committee membership, numbers of sponsors and supporters began to grow.

At Mrs Grogan's request, her brother Mr Philip Jenkyn visited Mrs Bedi (Sister Palmo) after attending a Law Conference in New Delhi in 1971. He spent three days in January 1971 at the Mahayana Buddhist Nunnery, which Sister Palmo had founded at Tilokpur. She showed him the newly completed building. He took gifts from the Tibetan Friendship Group to Sister Palmo and the children sponsored by Australians and took photographs of them for their sponsors. He also photographed 5 children needing sponsors and the children sponsored by TFG who were attending the winter holiday camp there.

Philip Jenkyn discussed with Sister Palmo and Sri Attar Singh, the T.F.G. Treasurer,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ed for projects and for medicines, equipment, food, vitamins and clothes (particularly shoes), and the need to preserve the Tibetan culture. On 15th January, he met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who was visiting Sister Palmo.

附錄七-3

澳洲西藏會議 (Australia Tibet Council) 介紹

資料來源：西藏流亡政府駐澳洲坎培拉處提供

Australia Tibet Council

Founded in 1988, Australia Tibet Council (ATC) is Australia's largest Tibet Support Group. ATC campaigns rigorously for the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freedoms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supports the Dalai Lama's Middle Way policy for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Tibet issue.

As of 2008, ATC has three permanent staff, volunteer branches in New South Wales, Victoria and Queensland, a registered support base of over 13,000 people and a financial membership of around 1,500 people.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Tibetan Community of Australia, the Tibet Information Office in Canberra and the Australian 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Tibet, ATC works to highlight the real situation in Tibet, grow the Tibet movement in Australia and build activ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upport for the Middle Way policy.

ATC combines public events, cyber actions, media work and direct political lobbying to achieve these core aims. A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Tibet Support Network (ITSN), ATC also works collaboratively with Tibet Support Groups internationally.

Over the following seven years ATC continued to increase its supporter base and focus on activities aimed at raising awareness of Tibet in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ATC undertook a range of campaigns, lobbying and advocacy work addressing human rights abuses, political prisoners, cultural and religious repression, economic exploitation, and Australia'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ATC published the bi-monthly "ATC News" magazine and a monthly summary of Tibet-related news clippings, "Tibet News Digest". A website was also established. As ATC's membership became increasingly national, volunteer Branches began operating in all the Australian capital cities.

ATC organized a full-page announcement, which appeared in The Australian newspaper on 16 December 1989, congratulating the Dalai Lama on his Nobel Peace prize. The announcement was endorsed by hundreds of influential Australians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1990 saw ATC hosting successful visits by Pema Dechen, the President of the 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 and by the Tibetan Youth Congress Joint Secretary, Dolma Gyari, and President, Lhasang Tsering.

In 1992 the Dalai Lama visited Australia for the first time in ten years. His Holiness, now a Nobel Laureate for his non-violent campaign for the rights of the Tibetan people, attracted massive media attention resulting in a major increase in awareness of the Tibet issue. His visit included a meeting with Prime Minister Paul Keating and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ibet Information Office in Canberra. After much encouragement from ATC, Australian Parliamentarians concerne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Tibet formed the first Australian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Tibet in 1993.

The United Nations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was held in Beijing in 1995. Tibet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collaborated to have a delegation of nine exiled Tibetan women attend the conference, including Dorji Dolma and Kesang Wangmo sponsored from Australia by ATC. The delegation made history by becoming the first Tibetans to hold a protest on Chinese soil.

The next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TC was the opening of the National Office in Sydney after a very successful membership recruitment drive following the 1996 visit of the Dalai Lama. This was a major step in the professionalising of ATC providing a working space for paid staff and volunteers. The improvements in campaigning, communications and supporter management set ATC on the path to becoming the organization that it is today.

Three days before the handover on 30 June 1997 that saw Hong Kong revert to Chinese rule, ATC joined with UK-based Free Tibet Campaign to organize a demonstration in support of Tibetan freedom outside Hong Kong's legislature. ATC's International Liaison Officer, Dorji Dolma, sat cross-legged on the edge of a Tibetan flag, her mouth gagged – a gesture representing China's repression of the Tibetan people.

In June 1998, Martin Scorsese's film, Kundun, was released in Australia and ATC led a campaign that created a high profile for the film before its release. ATC members distributed 40,000 copies of a Tibet Action Kit outside screenings across Australia, resulting in hundreds of new members and an overwhelming number of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about Tibet.

Australia's first Tibetan Freedom Concert in June 1999 saw 8,000 people turn out to show their support for Tibet. ATC provided a Political Tent and a Culture Tent to make sure that those attending for the music also left with information and awareness about the situation in Tibet.

Later in the same year, ATC mobilized supporters for protests across the country to send a strong message to visiting Chinese President, Jiang Zemin, that he was not welcome in Australia. Highlights of the protests included an attempt by Greens Senator Bob Brown and Dorji Dolma to hand deliver a letter to Jiang during an official lunch at Parliament House in Canberra. A boatload of ATC activists also ambushed the Chinese President while he was strolling on the lawns of the Prime Minister's residence on Sydney harbour.

In December 2000, ATC staged the first ever demonstration in Beijing by Western Tibet activists. Vice-President Alex Butler and Executive Officer Paul Bourke unfurled a banner with a photo of the Panchen Lama, Gedhun Choekyi Nyima, in front of the Australian Embassy. The Australian Telecommunications Minister who was in Beijing at the time undertook to raise the Panchen Lama's case with his hosts and the action received wide coverage in Australian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When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visited Australia in October 2004, ATC organized a full-page advertisement in The Australian newspaper, featuring a photo of the Dalai Lama and Hu, calling for substantive dialogue on Tibet's future. The ad was endorsed by hundreds of Australians.

Following ATC's year-long "Hands Off Tibet" campaign Australian mining company Sino Gold announced in January 2004 that it was cancelling its plans to develop a gold mine at Jinkang, in eastern Tibet.

In August 2004, activists from ATC, 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and Free Tibet Campaign travelled to Beijing to brief journalists at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n the situation in Tibet and the Beijing Olympics campaign. Following the briefing, they unfurled a banner reading "No Olympics for China Until Tibet Is Free" at Beijing's Ethnic Minorities Park, part of the 2008 Olympics complex. After being interrogated for more than seven hours the activists were expelled from China.

During 2005, ATC undertook a range of campaigns and advocacy work in the areas of promoting support for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Dalai Lama and Chinese authorities to resolve the Tibet situa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human rights, including political prisoners, religious and cultural repression; as well as continuing its work to prevent the economic exploitation of Tibetan resources. Australian miner, Orchid Capital sought to develop a gold mine in Tibet and ATC undertook detailed research and media work to highlight the inappropriateness of Orchid's plans. Orchid announced in August that it was withdrawing from Tibet.

In 2006, ATC continued to educate the Australian public, business community and politicians about the Dalai Lama's Middle Way Approach. Over 5,000 people signed up online to the "Prayer Flags to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 action, asking him to publicly commit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for meaningful dialogue between the Dalai Lama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 action directing thousands of postcards to Madame Fu, China's Ambassador to Australia, sent a strong message to China about the need for dialogue.

In June 2007 ATC and the Cast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Law co-hosted "The Middle Way: a peaceful approach to resolving conflict" featuring the Dalai Lama as keynote speaker. This event gave the Dalai Lama an opportunity to explain his Middle Way approach and engage in a lively discussion with a challenging panel of invited expert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critical period leading up to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in the latter half of 2007 ATC began integrating its lobbying, fundraising, movement building and all other spheres of activity into a more cohesive and strategic framework.